

〔目〕 田田宮英太郎
柯毅文、胡曉丁 译

乱世奸雄



軍事植文出版社

112

024

军事谊文出版社(3) 996

乱世奸雄

〔日本〕田田官英太郎 著
柯毅文 胡晓丁 译

军事谊文出版社

(京)新登字121号

书名: 乱世奸雄

著者: [日] 田田官英太郎著

译者: 柯毅文 胡晓丁译

出版者: 军事谊文出版社 (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
乙一号) (邮编100011)

发行者: 新华书店北京首都发行所

印刷者: 北京市隆昌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毫米1/32

版次: 1992年9月第1版

印次: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张: 7.75

字数: 174千字

印数: 1—5000册

书号: ISBN 7-80027-251-6/E·89

定价: 4.80元

(本社出版的图书, 因印装质量问题, 可退本社调换)

出版说明

辻政信，一个典型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好战成性，阴险奸诈，残暴专横，行踪诡秘。最后不知去向，落得个尸骨无存的可耻下场。许多人早知其名，只是不详其事。本书作者以翔实的资料，论证了他的一生。特译出，供读者参阅与鉴别。

前 言

就知名度而言，辻政信是超群的。陆军的东条英机、山下奉文、石原莞尔、海军的山本五十六、米内光政等都很有名，但都是职位很高的将军。而辻政信的军衔是大佐（相当上校），不过是一位高级参谋。问题就在这里，当然不光是这一点。

如果在陆军中没有姓辻的这位参谋，日本所走的道路也许大有不同。正因为这样，他存在的重要性才一直流传下来。大将也好，中将也罢，徒有虚名的人物为数不少。

尽管辻政信只是一名校官，可他在转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是令人瞩目的。这一点，可以说，他的实际情况并不亚于上述著名将军。

然而，像他这种褒贬兼有的人物却是极其少有的。在去向不明已有25年的今天，此种情况仍未改变。有人说他是“来自地狱的使者”，而成了众矢之的，也有人称赞他是“作战之神”。还有妄加评论的，说他是“治世干才，乱世奸雄”。且不说这些议论对还是不对，真正要弄清楚的，还是辻政信的真面目。

1979年，在辻的故乡为他建立了“雄伟”的铜像。不知道战争的年轻人在逐年增加，评价也越来越陷入混乱。当此之际，我认为有必要把确实的证言和资料归纳起来。这就是我执笔的主要动机。

说起来，关于辻的传记已为数不少，至于就战场上的

辻，身为作战参谋的辻和下落不明的辻，所作的部分性的记述，就不胜枚举了。另外还有带主观性的辻自己的著作也有18部之多。这些都作为传说构成了辻政信的形象。如何对这些传说作出说明，使之接近实际情况，我为此而煞费苦心。

我最不以为足的是战争的爆发与辻政信究竟有何关系。这种看法也许是评价辻所欠缺的。然而，中日战争、诺门坎事件、太平洋战争等，对连续挑起和发生这种赌日本命运的战争表示极大关注的，却是辻政信。而在此之前发生的士官学校事件以至“二·二六”事件，都与他有着内在的关联。

林銑十郎、植田谦吉、杉山元、东条英机等这些军事首脑如何以主角在发号司令，但撇开这些上层人物，真正扮演黑手角色的，主要还是校级幕僚，而这些黑手之一就是辻政信。

尤其是在诺门坎事件和太平洋战争中，他确实是挑起战争的原动力。随着对战争内幕的追究，证明他确实充当了军国主义和好战分子的急先锋，而且无可辩驳地说明他是战争的挑动者。

在评论辻参谋时，不可忽视品性上的问题。他作为军人，非同一般，这是尽人皆知的。然而，其本性何在？毋宁说是其功利主义。这一点，从其言论中就能看得出来。

从幼年军校、陆军士官学校到陆军大学，他都是优等生，由此而产生的自负心理也许是很大的。在那军国主义传统盛行的时代，功利主义是不言而喻的。再超越限度，就轻易成了贪图功名和权势的俘虏。

轻视人命，勇敢和暴虐不分，以司令官的名义发假电报，以大本营的名义伪造命令、独断专行。到头来，落得个逃亡敌国。像这样不同寻常的参谋还有第二个吗？

军国主义的急先锋，功利主义的俘虏，在这两者纵横交错的关系中，岂不是由他自己露出真面目来了么？！

现今的日本已被列入超级大国的行列。不沉的航空母舰、海上交通线、防卫费突破国民所得的1%，这都成了现今的课题。联想到当初的诺门坎事件，甚至使人看到了正加紧对苏备战的旧军部的阴影。

从这一意义出发，在诺门坎事件中辻参谋的举止尤其令人感兴趣。本书之所以把这方面作为重点之一进行描述，就有暗示当今情势的意思。

另外，第1章在《经济往来》（1977年1月），第12、21章在《现代之眼》（1977年10月、1982年4月）上分别发表过，其他均为新写的稿件。引用文的出处在文中已经注明。

在归纳本书时，蒙旧陆军中辻的前辈、同僚、部下和有关人员作了宝贵的谈话和证言，其数甚多，姓名就不一一列出，特在此致以深忱的谢意。

我还要对很快接受出版此书的芙蓉书房上法快男社长表示感谢，同时对桐野克则编辑长致以谢意。

1986年8月 田田宫英太郎

目 录

前言	(1)
第 1 章 故乡的声音	(1)
第 2 章 士官学校的放火者	(7)
第 3 章 舞台转向关东军	(20)
第 4 章 吃苦头的军司令官	(29)
第 5 章 诺门坎的战死者	(39)
第 6 章 多灾多难的须厂联队长	(49)
第 7 章 战败责任者的搭档	(59)
第 8 章 准备对苏决战	(70)
第 9 章 纠纷不断的东亚联盟	(84)
第 10 章 主张开战的急先锋	(95)
第 11 章 马来亚作战之光和阴暗面	(105)
第 12 章 杀害华侨	(112)
第 13 章 巴丹半岛的伪造命令	(129)
第 14 章 指示攻克莫尔兹比港	(140)
第 15 章 盲目冒进的瓜岛作战	(146)
第 16 章 没有人承担战败的责任	(160)
第 17 章 打入重庆的演技	(171)
第 18 章 缅甸战线的无赖之徒	(180)
第 19 章 投降·逃亡·倾诉	(194)
第 20 章 免除战犯罪	(208)
第 21 章 为何潜入老挝	(219)

第1章 故乡的声音

现任参议院议员辻政信，乘坐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从羽田机场出发，那是1961年4月4日上午9点钟。他向参议院请假40天，为的是去东南亚进行考察。按预定日程，5月中旬就该回国，可是，却从此杳无音讯。

这件事由新闻作出报导是在当年的5月27日。概要如下：

“根根家人的要求，外务省指令驻当地使馆，调查谜一般的辻氏的行踪，可到26日为止的报告，仍然根本不知去向。由于辻氏出发前说过‘想进入老挝探明实情’，所以莫非卷入了动乱之中。安危令人担心。”（《产经新闻》）

其后，许多意测性的报导充斥了各家报纸的社会版面。可是，真相依然如谜一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也有人认为辻曾有过富于惊险的“潜行三千里”的实绩，这次莫非又在演出“潜行”的故伎。

然而，从那以后，25年的岁月过去了。越南、老挝的战火已经平息。日中邦交已经恢复。辻不得不潜伏起来的理由和国际环境，哪里也找不到了。如果辻还活着，继续隐而不露，那是不可思议的。

我在北陆线的小松站下车，是1976年10月底。辻的最小弟弟政良在市里经营一家文具店，我被请到接待室。初次见面，彼此致意之后，话题才涉及到辻的生死。

“我看他还活着，如果死了，总会有所反应和灵感吧，可一点没有。哥哥看起来像是莽撞汉子，其实是很谨慎的。

肯定有所追求，决不会是毫无计划的行动。”

这话说得很自然，并不感到有任何故作坚强之处。作为至亲骨肉之情，有这种想法，或正在祈求，是很正常的，没有必要与之争辩。

确凿的死亡事实，眼下无从到手。

“他临走时只是说，打算5月下旬回国，老母就托附给你了。母亲是第二年1月30日在山中町今立故里去世的，终年90岁。可在两三个月前还这么说，‘那孩子对我实在不孝，打入伍以来，就一直为他担心。战争失败，生死不明，那时的担心更是非同寻常。还以为他出席国会去了，却又下落不明，尽让人揪心！’哥哥也许按他自己的想法在拼命干，但母亲的话也是一片真情。”

政良战时是航空兵中尉，与哥哥在人品上似乎很不相同，只是长相一模一样。他诚实，不故作姿态，给人以好感。

“据说，上小学的时候，周围的人就鼓励他好好学习，做个伟人。当时的目标是要当上郡长。进入士官学校后，与亲友久门（有文，后为大佐）暑假时一起来家里，此人是航空兵的干才，哥哥说，‘你当陆军大臣，我当参谋总长。’彼此燃起了凌云之志。这是听母亲说的。立身处世的大志没有从他脑子里消失过，当上议员之后还经常说，‘国会议员并非只是拼命在选区内修路架桥，其使命在于从大处高处来如何治理国家，有时应该到海外去，再回过头来看看日本。’”

这就触及了辻政信的一个侧面。于是，我决定离开这里，到他故乡去看看。

他的家乡在石川县的南端，辻成长的那个时候，叫江沼郡东谷奥村大字今立，如今已与山中町合并。离北陆线的加

贺温泉站坐车大约需要30分钟，是平坦的柏油路，可直达今立部落。

沿动桥川溪流而行，到达今立，那是下午2时左右，部落里十分宁静。面向道路的拐弯处，在山边的角上，就是辻家的宅院。那是两层楼的住宅，根说是战后按辻的设计新盖的。

占地约150坪^①，一半盖房子，剩下的是空地。原来整个用地盖的是草葺的平房。在部落里算是最宽敞的，曾用来作过真宗^②的道场，还在这里代行佛事。父亲龟吉既以烧炭为业，又有极好的编织手艺。

从给子女起的名字，就能大致看出父亲的心思来。继承家业的长子叫弘，次子叫政信，三子叫理，四子叫政良。应该说命名都是有所考虑的。如果政信也死了，那么，四个兄弟现在就只有小弟政良一人了。

弘继承了烧炭的家业，理原是海军大尉。另外，长女叫春，次女起名良子。

这个部落的大部分人家都以烧炭为主，是一个人口稀少的村落。战后曾有100户人家，现在减到只有30户了，每年都有年轻人离开这里。

现在弘的长子是小学教员，住在附近的镇上，只是不时来家看望一下。

我向路过的一个老人打听，他有些耳聋，大着嗓门对我说：

“是说辻政信啦，那不是在越南当司令官，正在奋勇作

① 1坪=3.3平米

② 日本佛教的一派。

战么！”说话时显得很得意，自以为说的很明白。

从今立往南，翻越的山坡十分险峻，已作为“县民之林”划为旅游景区。修了高级公路，车往前行驶时，看到的景色极美，满山红叶辉映在眼前，令人眩目。种植的杉树和柏木非常之多。车子从郁郁葱葱的山林地带穿过，坐在车里不禁使人想到，辻政信野性的原动力原来出自这么个地方。

公路从连接福井县县界上的富士写岳(海拔942公尺)山脚下绕过，到达山中温泉。辻在两年间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去上学的高等小学，就在这温泉镇上。

金泽对于辻政信，可以说是第二故乡。辻在学完陆军士官学校预科两年的课程后，作为士官侯补生分配属到金泽的步兵第7联队。在这里度过了6个月时光，然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本科，毕业时是1924年。

他在继名古屋的幼年学校之后的士官学校里，也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得到了天皇恩赐的银表。这回作为见习士官担任第7联队的勤务，3个月后授与步兵少尉军衔，接着于1927年10月晋升中尉，第三年进入陆军大学，学习3年就离开了金泽。辻在陆大毕业是1931年，成绩排名第三。第一名是天野正一，第二名是岛村矩康。秩父宫享受特别待遇。

为了实地演习，陆大的学生也来过金泽，一行人住在十间町的浅田屋旅馆里，秩父宫和辻也参加在内。当时，他对来访的新闻记者扬言：“本来自己应居首位，就因为对手是皇子殿下。”

就算这是在说明自信的程度，但自己说与不说，却是了解一个人性格的重要参考。何况如此大言不惭，就足以看出其内心确有这种念头。不容置疑，这无非是在作自我表现。

从辻表露出的性格，可以看到这种强烈的自我表现欲。围绕陆大毕业的排名，早就露出了苗头。

1931年11月，辻获得御赐的军刀从陆大毕业，愉快地回到了金泽的原来部队。其后不久就发生了第一次“上海事变”。最先下达动员令的是第9师团，第2中队长辻中尉和第7联队一起踊跃出动。

派往上海的陆军部队，从2月20日起开始总攻，其中就有辻中尉参加。这对辻来说虽然是初次上阵，可他确实是在英勇奋战。

上海停战协定签订是1932年5月5日，日中两军同时撤出上海。第9师团回到金泽，已经是进入6月份以后了。辻中尉由师团选为介绍实战情况的代表。

从陆海军参战部队中选出军官12人，在东京九段会馆的偕行社和全国各地。从6月27日起的5天内，向军队和教育界方面的人作讲演。

6月21日的《北国新闻》用三行标题加照片，报导了这一决定。特将其内容摘抄如下：

从第9师团管辖下选出作实战讲演的步兵第7联队第1大队第2中队中队长辻政信中尉，在第7联队总攻江湾镇时，作为军人的楷模，被誉为阵中之花，其英勇奋战之表现，实属令阵中将士惊叹之猛将。

辻中尉在江湾镇第一次总攻中左脚中弹，却不肯撤下阵地，在阵中作了处理，仍然奋不顾身地跛足指挥中队进行第二次、第三次总攻……（中略）

在进入大场镇之前，他带伤奋战，挥舞御赐军刀，率先冲入敌阵。在几次战斗中，其英勇和胆量使“鬼中队长”的名声完全得以发挥，获得第6旅

团长原宏行发给的感谢状。

这次的实战讲演，辻中尉将介绍当时英勇作战的实况，相信许多事会使听众为之心惊肉跳，深受感动。

辻在“上海事变”中的英勇表现，传说不少，当时担任大队副官的田边新之中尉（后为大佐）有如下一段回忆：

这是江湾镇附近发生的事。当部队与辻中队长一起向前推进时，在相距50米处突然遭到十九路军的射击。部队立即卧倒，可辻中队长却不失时机地站了起来，发出命令。3个小队一起站起来，排成阅兵式的正规队形，然后再根据命令采取疏散队形。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指挥命令就会联络不上，从而有碍于下一步作战行动。

这是日俄战争中的经验教训，辻只是把它应用于实地。但不可否认，其中有特有的灵活性。

作为第一线中队长，其巧妙的指挥才能，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发挥。这不是自我吹嘘，而是目击者的赞赏，是很可信的。正因为如此，作为“上海事变”的功绩，辻获得了金鸕勋章功五级。要了解辻政信的情况，当然有必要明确这个时期作为模范军官的表现。

辻中尉1932年6月回国，紧接着9月就去参谋本部工作，配属在第一科。作为青年军官的辻，就这样结束了金泽时代。但前后也有9年之久。说金泽是辻政信的第二故乡，是因为有这样一段情由。

第2章 士官学校的放火者

1932年9月，辻中尉调到参谋本部总务部第一科（主管编制、动员），科长是东条英机大佐。俩人在这里开始相识。第二年1933年8月晋升大尉，接着于12月，正式任命为参谋本部人员，转调到第一部第三科（主管要塞）。脱离部队勤务到参谋本部工作，对辻来说，真象是脾肉复生，不胜感叹。

1934年8月1日，他被任命为陆军士官学校本科学员队中队长。这是陆军士官学校副校长东条少将提拔的。陆军大学佩带军刀的参谋军官进入陆军士官学校，这种人事调动是没有前例的，更何况是拒绝派往驻俄国使馆而作的调动。

说起来，培训学员的中队长的工作，由部队经验丰富的陆士出身的少佐级军官承担，要比头脑灵活的陆大出身的人更为合适。所以这种人事安排是不恰当的。正因为如此，才有种种议论。

议论之一就是9月进入陆军士官学校本科（1935年12月由三笠宫创立）的澄宫崇仁殿下的教育问题。对此极为重视的，据说就是辻政信，因为澄宫配属在他担任中队长的第1中队。那么，辻是如何锤炼澄宫的呢？这从剑道（术）教学就可见一斑。

“看起来是打脸，却乘机去打手，这种模仿并不好。从殿下来说，应舍小计而以王道为业。”辻这样提醒澄宫。

何谓“王道”？何谓“小计”？正因为这是有关胜负的

事，所以应该弄个明白。

另一件事是因为受“五·一五”事件等的影响，陆士学员思想上产生了动摇。怎样才能防止这种动摇？学校当局十分苦恼。这时，辻居然拍着胸脯说：“如果是咱家的话……”

就这样，辻在众人关注下进入了陆军士官学校。当然，辻自己似乎也抱有某种希望。3个月后，士官学校终于出现了大骚乱，这被称作“士官学校事件”，也称作“十一月事件”。

在陆军士官学校，有志于国家革新的学员不绝于后。辻拜访了陆大的村中孝次大尉（步兵第26联队副官）、矶部浅一一等主计（野炮第1联队），接受了启蒙思想。学员的领导者是第2中队的武藤与一候补生。

曾在第1中队的佐藤胜郎候补生，不断接受武藤的劝诱，佐藤把这些情况告诉了中队长辻。辻指示佐藤：为了把他们从错误的思想中拯救出来，应该亲自参加到组织当中去。在辻看来，真是“奇货可居”，心里肯定很高兴。

1934年1月23日，荒木贞夫陆相借口有病辞职，其后由林銑一郎大将继任。如果说前者是皇道派的核心人物，那么后者就是统制派的同路人。两派势力从此展开了角逐。

同年3月，人事有了变更，起用永田铁山少将为军务局长。根据林的布局，要改正荒木露骨的派系人事。以永田为中心的统制派幕僚集团已经组成。东条英机、工藤义雄、上桥勇逸、武藤章、影佐祯昭、池田纯久、田中清等都是成员，目的在于为了国防而改革国家。但非法的军事政变被排斥在外。

当年10月1日，由陆军省新闻班发表的小册子《国防的

本义和其强化主张》，就是这个集团的研究成果。小册子开头就指出：“战斗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是在鼓吹军国主义的好战思想。

受北一辉所著《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影响的皇道派青年军官和幕僚，尽管同样主张国家改革，但在思想和方法上却有所不同。

另一方面，在永田等统制派幕僚影响下的尉级军官，也组成了年轻人的研究会，由陆士31期生的片仓衷少佐担任座长，成员有真田穰一郎、河越重定、坂间训一、中山源夫、永井八津次、岛村炬康、久门有文、西浦进、服部卓四郎、荒尾兴功、堀场一雄、加藤道雄、辻政信等。第一次聚会是在1933年11月7日，第二年1月5日，拿出了方案，名为“处理发生非常政治事变的对策要纲”，很快交给了上司。这是一个反革命计划，其方针为：

一、鉴于目前世态，当发生非常政治事变时，军部应以此为契机，为改善国内事态，以坚定的决心来贯彻此目的。

二、军部应坚持其统制，即使作为革新的原动力，也不可投入事变的旋涡之中。

军部自身不卷入事变的旋涡之中，目的在于“图谋组成所希望的后续内阁，通过内阁断然实行革新。”

从这些年轻的中坚幕僚的活动背景来看，令人感到辻破例进入士官学校，其中带有谜一般的色彩，人们甚至怀疑所谓澄官的教育问题，也是一件掩盖这个谜的隐身衣。

这种情况，皇道派并不是没有察觉。构成皇道派大敌的是永田和东条的搭档。把东条安插在士官学校，用心叵测。

何况担任本科科长、干事、校长之职的是皇道派的巨头

真崎甚三郎大将。士官学校是皇道派的铜墙铁壁，眼下是教育总监直辖的学校，其用意就是不让东条之辈插手其中。

在3月的人事更动中，刚任命为干事的东条，于8月被踢到了久留米，任步兵第24旅团长。因此与在8月人事更动中进入士官学校的辻分道扬镳了。辻与特意把他拉来的东条分开，其对真崎的怨恨是可想而知的。

在这种情势下，佐藤候补生带来的情报是多么的重要，这一点辻是知道的。前面提到的给佐藤的指示，实际上就是命令他去刺探皇道派军官的情况，佐藤在辻的话语笼络下，使劲从村中大尉那里挖出情报来。

由于这是辻惯用的手法，终于迫使村中大尉说出了拟定的计划。据宪兵队的报告，计划内容如下：

一、事件的全貌。大致采取与“五·一五”事件相同的手段，袭击元老重臣和警视厅，决心举行政变。

二、实施的时机。最初预定在临时国会召开之前，后来据说又延期到在临时国会期间到通常国会召开之前断然实施。

三、袭击的目标。

第一次 斋藤、牧野、后藤、冈田、铃木、西园寺、警视厅。

第二次 一木、高桥、清浦、伊泽、汤浅、财部、幣原。

预定在第一次袭击目标之后，在首相官邸集合，再去袭击第二次所定目标。

四、认定的首谋者和参加者。

军部方面 村中孝次（陆军大学）、矶部

浅一（第1炮兵联队）、大藏荣一（户山联队）、栗原安秀（第2坦克联队）、佐藤龙雄（第1步兵联队）、村田光行（第1步兵联队）、佐藤操（第1步兵联队）、安藤辉三（第3步兵联队）、饭渊幸男（近卫师第3步兵联队）、间濑惇二（第1步兵联队）。

地方方面 西田税。

五、实施方法。按以下计划分别进行袭击。

部队番号	指挥官	兵力	袭击目标
第1步兵联队	佐藤两人	2个中队	斋藤
第2步兵联队	安藤大藏	2个中队	牧野
近卫师第2步兵联队	村田	1个中队	后藤
近卫师第3步兵联队	饭渊矶部	1个中队	冈田
第1步兵联队	间濑	不详	西园寺
陆士预备队	片冈	不详	铃木
第2坦克联队	栗原	坦克10辆	首相、警视厅

此外，根据中队长审问佐藤候补生的记录，对计划到手的过程作了如下陈述：

问：为什么要去拜访村中大尉？

答：因为听说他是造诣最深的青年军官，我想了解这一真相。

问：从中村大尉那里听到什么？

答：最初并没有轻易说出计划的具体事项，也许没有下定决心。我站起来说：“如果不作回答，今后士官候补生将断绝与青年军官来往。”这时，村中大尉带着悲愤的神态，把佐藤和武藤两人领到另外一个房间，单是口头上说了大体的计划。

这是11月11日的事。我们不知道村中大尉的真正用意何在。于是又于11月18日同佐佐木、次木、荒木3人再去拜访。当时，矶部主计也在座。这次谈的内容与上次相同。

问：所说的计划内容是什么？

答：因为太多，记不详细，只能把记得的事照样直说。

1.首先说要建立军政府。就是说策划建立以真崎、荒木、林大将为主体的军政府。因为方案已经大体有了，所以打算通过这一步断然进行改革。如果三位大将不行，则推举铃木贞一大佐和石原大佐，决心由年轻人来干。

前几天，六、七个步兵学校的军官拜访了真崎、荒木两阁下，畅谈了自己的心情，两阁下均表赞同，其热情反而令人仰慕。但对建立军政府，根本没有私下许诺。

2.实施的时机。在临时国会（11月28日开幕式）前后，因为将出现政治争议，有机可趁，另外也考虑在会议期间。但一定要见机行事，作好随时可以发动的准备。

3.方法（略）

问：听到这话，有何感觉？

答：我认为这也许是为了稳住士官候补生而采取的防止反叛手段。

（据岩渊辰雄著《军阀的系谱》）

初看起来，令人感到话语显得暧昧不清，也许是一个没有现实性的灵机一动的计划。但想起两年前的“五·一五”

事件，如果出现这种政变计划，也并不奇怪。上述回答中最后加重点的部分，说的是“防止反叛手段”，心里也就明白了。

这一情报由佐藤候补生转给了辻政信，又由辻报告了参谋本部的片仓少佐和宪兵司令部的塚本诚大尉。片仓在第二部第四班（主管宣传和谋略）工作，班长是武藤章少佐。塚本是第二科特高副主任，是辻的同期好友。

既然根据佐藤的情报得知有政变计划，为什么不采取正规的善后措施呢？作为中队长的辻，按顺序应该要求直接上级陆士学员队长北野宪造大佐妥善处理。另外，既然传说政变的危险迫在眉睫，那为什么不通知管辖区的东京宪兵队呢？如果说担心皇道派的队长持永浅治少将会把计划束之高阁，那就只能认为其主要目的，与其说是防止政变，不如说在于揭发。

而且片仓少佐专门从事宣传和谋略，塚本大尉也不是第一线的实际工作人员，都不是检举的正规途径。这说明完全是在搞阴谋。

深夜3点，3个军官越过围墙，闯进陆军次官桥本虎之助中将的宿舍，连续提出忠告：“必须利用眼下的时机审查激进军官，以消除不稳言行的根源。”“如果不迅速镇压，难保不会闹出什么事态来。”

起初持慎重态度的次官，终于在所不顾了。由于传达了永田军务局长的指示，东京宪兵队本部通过宪兵司令部开始工作。就在当天拂晓，村中孝次大尉、一等主计矶部浅一、陆士预科区队长片冈太郎中尉，当即被逮捕。

审查工作避开了东京宪兵队，而由检察官和预审官在第1师团军法会议上进行。佐藤、武藤等5名候补生小组，经所

属中队长审查之后，也送交了军法会议。

既然获得情报的手段属于邪门歪道，计划内容当然暧昧不清，到逮捕为止的过程，一直是不正规而又很阴险的。从哪个方面都能看出，其中存在谋略的阴影。

真崎总监在1934年11月23日的日记中这么写道：

酒井（名镐次，少将，陆士干事）10时过后来访，独自报告了新的事实。即证实辻中队长用学员作走狗。他与某宪兵大尉、片仓大尉合谋，伙同宪兵队于夜里3时拜访次官，要求作出严重处分，却没有向校长和干事作任何报告，令人奇怪。眼下正在调查。

酒井称，从此事来看，此次事件为青年军官所为，是否出自辻的阴谋，眼下尚难确定。我有同感。既然与片仓有关，就应了解其企图，所谓蠢毒，指的就是此类事件。如无先见之明，陆军省的蠢物自将落入陷井之中。

（伊藤隆等编《真崎甚三郎日记》）

真崎似乎很快感觉到事件出自一种谋略。辻与片仓等是反真崎的急先锋。何况片仓的亲戚南次郎大将（1934年12月10日任关东军司令官助理）又是真崎的对头。

就本质而言，士官学校事件正如当时的奇怪文件所说的，是可与安政大狱^①相比的重大事件。如果说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少将是大老井伊直弼，那么东条、武藤就是老中间部诠胜，片仓就是井伊的家臣长野主膳，辻就是幕府的马快文

^① 安政5年（1858年），大老井伊直弼处罚反对迎奉德川家茂为将军的公卿、诸侯，把众多志士投狱判刑，史称安政大狱。

吉等角色。

逮捕经4个月之后，第二年4月4日，陆军当局才予以发表。

去年11月中旬，由于在京青年军官和士官候补生心怀不轨。为了严正军纪，在军法会议上对有关人员作了审查。

根据审查结果，原来这些军官和士官候补生是认为我国现状偏离建国理想，宿弊甚多，国家前途值得忧虑，必须迅速进行刷新改善，以显示我国体真貌，并就此进行串联。

为此，就参与非法行动的企图进行了彻底调查，由于确认该事实应有的证据很不充分，决定在军法会议上，对此事件不予起诉。

然而，由于这些青年军官和士官候补生的言行为军纪所不容，故此分别作了相应处理。

3月29日，宣布对村中、矶部、片冈3人免于起诉，但4月3日作了停职处分。这在行政处分中是最重的。如果6个月到1年之内不能复职，就自然转为预备役。另外，5名候补生包括被辻驯服的佐藤在内，都被赶出了士官学校。

阴谋带来了如此残酷的牺牲。可另一方面，辻和片仓又怎么样呢？以指导学员有误为由，辻只是遭到了禁闭30天的处分，被赐到了水户的步兵第2联队。片仓则于事件发生后的第二个月，荣转军务局军事科，根本没有作审查。这种处分完全是本末颠倒。

村中和矶部两人不能保持平静。村中在狱中和出狱后，两次以诬告罪上告辻和片仓；矶部在免于起诉之后，随即以诬告罪上告了辻、片仓和冢本3人。且看村中上告的部分情

况。

我当场考虑了实施计划，向佐藤和武藤两人说明了计划大纲。武藤露出满意的神色，但一言不发。佐藤则对此不满，提出种种追问，确实采取了刨根究底的态度。

此外，当提出购置手枪时，佐藤说应该弄得可作证据的某种物件，还说要利用与铃木贯太郎的某种关系去他家侦察。这种胆识，岂不是想通过我找到受领准备实施指令的口实么！

还有，当说到从现在起准备军刀时，武藤当即借此提出质疑：与现在起准备军刀，是否能赶上实施的时机。企图探明时机。正如上述，这与佐藤作为候补生与我断绝关系的目的相距甚远。可以说是与目的全然不符的行动。显然，这种理由只是不足取的口实。

然而，作为一个士官候补生，敢于采取这种行动去打听实施计划，那是根本不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也是不必要的事。这就没法掩盖是受辻的指使、利用的事实。

此外，获取证据物件，接受准备命令等，实际上也不是以一个士官候补生的头脑，在猛然间能想得出来的，是否根据辻预先灌注的预备知识而采取的行动，值得怀疑。

把佐藤候补生培养成特务的主谋是谁，这已经昭然若揭了。辻大尉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地运用奸佞邪说，从这里不是看得很清楚么！

与此相关的还有如下一部分事实，揭示了辻那种与廉耻

无缘的品性。

请看辻大尉给除佐佐木以外3人的信。此信由佐佐木候补生保存。

……是我希望佐藤候补生在青年军官的煽动下脱离诸位，挺身投入其旋涡之中的；又是我发觉有被诸位作为叛徒而断绝关系，却任其起来行动的。

……这种状况等于把诸位从台上赶下去一样……我当以死来谢诸位，如果诸位的手能使我得以瞑目，则为望外之幸……

3月13日

总之，佐藤候补生是在辻大尉的掌握之中进行活动，以刺探我们的情况，这是十分明显的。

辻大尉在事件发生之后见过末松中尉、明石少尉、荒川候补生、户山学校的高柳大尉等，情况可以从上述几人那里听到。其中，辻对末松中尉说：“如果村中、矶部、片冈要我的脑袋，我就给。”这是辻想证明自己的行动是正义的。他这样做，是因为自己心中感到内疚，为之苦闷。

尽管他一边在说这种话，另一边却又带着军刀和手枪在走，还对同期的学员狂称：“如见到村中和矶部，将来个一刀两断。”尽管给佐佐木等4名士官候补生的信，说要以死谢罪，但这与既不上吊也不自杀一样，其用心是值得怀疑的。

言行如此极不一致，真是少有。这里意外地暴露了辻的根本人性，这从后来的所做所为中将得到验证。

辻的言行完全有可能构成法律上的诬告罪，可是，陆军当局居然没有追究。村中和矶部很气愤，作为最后手段，发

表了“有关整肃军队的意见书”。这是一本小册子，除了有标题的意见书外，还附有给陆相和第一师团军法会议议长的申诉书、对片仓少佐、辻大尉、冢本大尉的诉状和所谓“有关10月事件的记录”等。军部于7月11日予以公布，各方面也广为散发。意见书的要点如下：

关于11月20日事件，军部在司法权和惩罚的运用上，都缺乏公正，还有站在公的地位上进行专权自恣的图谋妄动行为。军内动乱的根源，实际上潜伏在大本营内军部当局之间。我们深信如此断言并不过分。

特此提出忠告：如不挖出3月10日事件的根源，立即对两事件的思想行动进行反思改悔，断然根除玩弄阴谋之徒，皇军眼下的纷乱，终将不可收拾。

这就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大本营见不得人的行径，给各界以很大的冲击。

以此为契机，统制派和皇道派的对立，迎来了决定性的阶段。其征兆就是7月16日断然罢免了皇道派巨头真崎大将教育总监的职务。进而又于8月2日免去了村中和矶部的官职。

皇道派不能容忍，相泽三郎中佐8月12日冲进军务局长室，给永田铁山少将的头以报复的一击。接着就发生了“二·二六”事件。事件的首谋正是村中和矶部两人。

如此看来，士官学校事件并没有停止在只是军部的派阀斗争上。而是在向明治建军以来空前大规模的政变发展。可以说是向士官学校放火，火势越来越大，终于成了走向“二·二六”事件的冲天大火。

反过来说，如果不发生士官学校事件，村中和矶部也不

被赶出去，说不定“二·二六”事件就不会发生。另外，不可忽视的是，使军内斗争错综复杂的统制派幕僚，已经把火煽向国外。从芦沟桥开始的“七·七事变”，就是这样爆发的。

对此，皇道派的人大体都是反对“七·七事变”扩大化的。原因何在？有种种看法，对皇道派有影响的北一辉说。

“不可与中国进行战争，否则国家必亡。不进行战争是生存者的责任。”

因“二·二六”事件被拘留的黑崎贞明中尉，于1935年10月，在东京代代木陆军监狱被无罪释放。由于看守的好意相劝，他去向北一辉致意时，北就提出了这一忠告。

然而，遭到彻底镇压的皇道派，已经没有抵抗力量了。

“七·七事变”益发不可收拾，战火酿成了太平洋战争，扩大到了整个亚洲地区。在这个意义上，不得不使人再次想到马快文吉，辻政信所起的作用该有多大！正因为如此，这个非同寻常的青年军官，与后来的战乱将构成什么关系，是值得探讨的。

第3章 舞台转向关东军

辻政信听到发生了“二·二六”事件，那是在水户的第2联队。他一方面为自己考虑到了而暗自高兴，另一方面又为不明事态发展趋势而惴惴不安，心情自然是很复杂的。水户联队也出动担任东京的警备，但没有让辻参加。

辻由士官学校降到水户联队，是在1935年4月。他的确感到屈辱，一度决心脱下军装，打算去满州寻找新天地。

当时他居住在东京中野区鹭宫，夫人把他的行装箱拿到了住在附近的田边新之大尉家。箱子里装的是西服和礼帽，是准备随时远走高飞的用品。因为夫人对他的打算有所察觉，所以用这一手来阻止他去满州。这一点也可看出辻的狼狽样子。

另外，当时他去久留米拜访了第24旅团长东条英机少将，申述了士官学校事件的实情，倾诉了心中的愤懑。两人的心应该说更加连在一起了。

虽说让辻去水户赴任，但这种安排却是出于第2联队长横山勇大佐的同情。辻总算从失意中重新站起来。“二·二六”事件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由于带有缘份的片仓少佐的斡旋，辻被调到了关东军参谋部工作，那是“二·二六”事件的热潮尚未消退的1936年1月的事。在新的舞台上，辻将作出什么样的表演呢？

辻政信在满州的工作，是在当时新京（长春）关东军司令部第三科，主管后方兵站。辻也感到自己来错了地方，但

还是以生就的那股热情开始了新的工作。

在“二·二六”事件中崛起的青年军官遭到了彻底的镇压，使与之对立的辻高兴不已。在水户联队积压的忧郁也消除了。若论他的表现，真象是“从被告的立场回到了原告的立场”。他加紧熟悉工作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第三科是在九·一八事变中以蛮干闻名的花谷中佐担任主任。他说：“在大学里学到的那点知识，别太骄傲了。相比之下，要懂得实战。满州事变^①与纸上谈兵不同，要好好地学！”花谷这么向辻提出了最初的警告。

辻政信也正好是这种人，从那以后一个月之内，就钻在关东军书库里，把事变当日的记录从头看了一遍。在了解事变全貌的同时，也看出了事变经过和运用战术的几处疑点。他就此去问花谷，回答却根本不着要领。

事变当时，花谷还是少佐，是在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属下，所以没有看到作战的各个方面。提出疑问，没法答复，并非不可思议。可是，对辻来说，本是出于对摆出前辈架子的报复，这一来反而感到不好收场。傲气的花谷答不上来，也只好挠挠头皮，显得怪难为情。由此可见辻好强性格一斑。

新兴满州的母体是满州帝国协和会，其指导思想在于由口、满、汉、蒙、朝五族组成民族协和。然而，每碰到具体问题，见解未必一致。

有人主张以日本人为领导民族，其他民族与之协调，也有人主张各民族在平等的立场上，实行同人式的结合。因为

注^① 即九·一八事变

事关协和会运动的基本思想，所以很有必要统一见解。

辻带着这一使命进京，拜访了堪称满州国诞生之父的石原莞尔大佐。当时，石原是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科长，特意抽出时间，把辻叫到偕行社或自己家里，诚恳地说明了满州国的建设思想。辻后来谈到了自己的感激心情：

说到石原参谋，那是战争之神，心想他莫非是连鬼都抓来吃的人。可实际又怎么样呢？他从心里爱满州人，实实在在地在信奉和推进民族协和精神。

一心只想奋起拿下满州，要把地图涂上与日本相同的颜色，否则就对不起英灵。过去的这种想法该是多么幼稚！如果有洞真想钻进去。感到好象脸上在发烧。

在此之前，虽然接触过许多上司和前辈，但超越级别和职务却是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一见到石原长官，我就肃然起敬。他微睁着眼睛，面带微笑，象把我的心看透了。

由于有见识的前辈的教导，对事物的看法，对中国、满州和东亚的想法，都从权益思想向道义思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同的见识，其力量竟是如此的可怕。

（辻政信著《亚细亚同感》）

其实，辻并不是头一次会见石原。可是，眼下是在满州国工作，是站在探求其指导思想的立场上。正因为如此，石原的每句话，也许都在他心里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在辻的一生中，尊敬石原是从此开始的，甚至以导师相称。

1936年9月18日，第五届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关东军司

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发布了以“满州帝国协和会的基本精神”为题的指示。一、满州帝国政治的特性；二、设立协和会的意义；三、满州国政府与协和会的关系。由这三项构成的指示，文稿就是由辻起草的。这样一来，辻就掌握了满州国指导思想的关键。

此外，他着手建立“建国大学”。这是根据石原少将的指示进行的，关东军也对此表示赞成。板垣参谋长命令辻作出方案。

校舍盖在长春南郊欢喜岭上，教学内容为前期3年学习基础课程，后期3年进行专门性研究，以培养民族协和的领导人。1937年9月开学时，辻并不在校任职。第一批入学者有150人，日本方面75人，满州国50人，剩下的25人为朝鲜、蒙古和白俄系统的人。

还有一件事，是辻安排了张作霖的葬礼。尽管张是1928年6月4日被关东军参谋炸死的军阀巨头，但遗骨就那么安置在沈阳郊外酒林寺而无人吊唁。辻看到这一情景，就由奉天协和会经手举行了盛大的葬礼，把遗骨安葬在张家墓地。

这是1937年5月上旬的事，也就是张被炸死供奉了9年之后。当时满州国的高官韩云楷说：

“辻君，你仅以10万日元办成了需要1亿多日元的事，真狡猾呀……整个满州3千万民众，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才算喜笑颜开了。即使花上几亿日元进行宣传安抚，也不会有今天只花这10万日元的效果。”

战后，我也见到了韩云楷，他是个洞察力很敏锐的人，看透了辻的用心。总之，这说明辻的机智和表演有其独到之处。

历史性的芦沟桥事件，发生在1937年7月7日。主张坚决

打击的扩大派和主张局部解决的不扩大派之间的斗争在继续。扩大派的代表，在大本营有武藤作战科长，在关东军方面有东条参谋长；不扩大派的代表有大本营的石原作战部长和中国驻军的池田纯久作战主任参谋。扩大派乐观地认为：对中国的惩罚，只需数月便可解决问题。

就这样，在既没有陆军内部的统一意见，也没有陆海军的综合战略的状态下，于7月28日在北京（当时的北平）附近发生了“华北事变”。

当年3月，片仓衷少佐就任关东军第三科高级参谋，辻辅佐片仓。辻经常出现在天津驻军司令部，煽动幕僚说：“大本营太软弱，要在现地拖着他们……”最后终于给作战主任池田中佐造成了威胁。

池田如此谈到了当时的情景：

记得是7月20日前后，关东军的辻政信参谋对我说了一件古怪的事：“明天关东军要用于山海关的轰炸机去轰炸芦沟桥附近，我要坐战斗机去。”这种事辻是干得出来的。我吃了一惊，反问道：“你说的是真心话？”“当然是真心话。”

“难得采取了不扩大主义，事情总算有了归结，如果一轰炸，岂不万事皆休么。为什么要这么胡来呢？”“因为华北军的事要从简处理。”“真是帮倒忙！这是为矫正牛角而杀牛的傻事。关东军要轰炸中国，大本营同意了吗？恐怕不会同意吧。别那么干！”

“大本营磨磨蹭蹭的，所以要果断地去干。”他气势汹汹地说。“这种果断法我可不同意。难道怎么也止不住了么？”我又叮问了一下。“一定得

干！”他的强硬态度依然未变。

“要是那样就没有办法了。那就干吧。不过，我们将用华北军的战斗机击落关东军的轰炸机。请明白这一点！回头再发牢骚，我可不管。”“友军互相攻击？”“是的。一切责任由我来负。”我这么一恫吓，他只好说：“既然主任参谋说到了这一步，那就算了吧！”他终于放弃了轰炸的念头，离开了那里。

（池田纯久著《日本的拐角》）

辻即使是暂时的作战参谋，说话也要合乎常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只能说是不讲道理。

他的目的何在？在于鼓动扩大战火。再进一步说，也许是他有好战的怪癖，多管闲事管到了不属关东军管辖的地区。

在大本营，石原莞尔主张不扩大事态，他被持反对论调的武藤章弄得苦不堪言，辻不是不知道。

如果辻忠实于石原所主张的协和精神，就该一心指望事态不要扩大。哪有煽动扩大事态的道理呢。前面谈到对石原的尊敬，不过是出于对石原的一知半解，装模作样罢了。这一点已经暴露无遗。

证明辻有好战怪癖的是，战火扩大不久的7月底，他就任中国驻军的作战参谋。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说这一调动完全出乎意外。可事实并非如此，是辻自己要求不时进京的片仓参谋，由片仓在大本营斡旋，才使愿望得以实现的。他是彻头彻尾的战争贩子。单从这件事就清楚看出他好战成性。说起来，军人如果讨厌战争，害怕战争，那当然不好。可是，那种平地掀起波澜的军人，也使人为难。岂止使人为难，而是这种人极其危险。古语中不是告诫说：“兵者凶器也。”

辻调动的当时，驻华日军给与的任务是：“惩罚平津地方的中国军，保持这一地区的安定。”可是，参谋本部却同意关东军进攻察哈尔省的请求，并决定以一部分驻军去增援关东军。

铃木重康少将指挥的独立第11混战旅，在北京西北方的南口碰上了中国军队的猛烈抵抗，辻参谋的身影就出现在第一线。

随着战线的扩大，8月31日，新编成华北方面军，任命寺内寿一大将为军司令官。在此以前的驻华日军司令部成员，分散到方面军和第1、第2军司令部。辻大尉配属在方面军第一科，成了最年轻的参谋。

下山琢磨大佐却被新任命为第一科高级参谋，这是没有想到的。下山大佐在这以前任满州国军顾问时，就与辻大吵了一架。两人的纠纷当然不可避免。请看当时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冈部直三郎中将的日记：

关于辻参谋暂时配属到第5师团去的事。

为了联络，决定把辻派往第5师团，这是根据下山大佐就调配形式提出的意见，我认为没有那个必要，而且内部未经任何交涉，就单方作出决定，担心会使第5师团产生疑惑。本想不予同意，但既然查明下山已向辻提出了诺言，从树立下山的威信出发，也就同意了。

在此期间，第5师团提出进驻保定平地，说明辻显然是想回避在方面军司令部工作。据他说，其理由是，“在第一科终归难以开展工作，因为有关作战事宜，从不征求任何意见，也无从知晓，使人极为不快。”

这无疑是对辻的误解，以他的性格而言，如果不是一个以自己为中心，把自己的意见付诸实施的环境，那就没法得到满足。换言之，也就是嫌弃作下僚的事务性工作。当然，也应该说下山在领导上也有缺陷。

关于把辻配属到第5师团，我给西村利温大佐（第5师团参谋长）写了私人信，以取得谅解。此信明天将托辻送交西村参谋长。

辻所配属的第5师团，由方面军司令部直辖。师团长是板垣征四郎中将。对辻来说，可以在板垣中将属下而立身战场，也是与他的愿望一致的，更何况从下山大佐那里解放出来。所以，希望有这种调动，不是不可理解的。

然而，围绕这一调动，他和下山大佐之间又发生了一起纠纷。11月11日的《冈部日记》中如此写道：

下山参谋突然提出辞呈，理由为：

1. 辻大尉的调出，没有和他商量，这有失脸面。

2. 作为第一科的高级参谋，实难胜任，特别是对第5师团的作战和把第5师团抽往河北，深感负有责任。

关于第1项，辻自己未能毫无保留地说出对下山的看法，事前不与下山商量，下山当然对此不会表示同意。当然，无论如何，也是要把辻调出去的。

这一点，意在说明其中并没有什么不合适，只是今后如果不及时予以通告，根本不予考虑，那就得承认在这一点上有所失误。

辻不愿回到下山所在的司令部，谋得关东军作战参谋之职后，显得十分积极，在这里看得很清楚。反过来说，被抛弃的似乎是下山。

第4章 吃苦头的军司令官

“诺门坎事件”（外蒙方面也称：“哈拉哈河会战”），从1939年5月11日开战，反复进行了长达4个月。这在军事上和国际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过去只是偶尔在局部地区发生冲突，但决不是单纯的国境纠纷，而是日、苏两军真正的战争。对日军来说，这是现代战争的初次考验。“诺门坎事件”到底因何而起呢？

有一个“满、苏国境纠纷处理纲要”（以下简称“处理纲要”），是1939年4月25日，由关东军司令官公布的，全文由八项组成，其第三项为：

在国境线明确地段，我方不主动侵犯对方，但在严格自制的同时，如认为对方越境，则可在周密的安排准备下，以充分的兵力奇袭歼灭之。

为达到上述目的，可以暂时进入苏联领土，或把苏兵诱入满州领土内滞留。

第四项为：

在国境线明确地区，防卫司令官应自主认定国境线，并明示第一线部队，在防止惹起不必要的纠纷的同时，也应使第一线部队的任务易于完成。而在上述地区应采取不必要的行动时，或有行动必要时，应有严格的警戒和周到的部署。万一发生冲突，无论兵力多寡和国境如何，务期必胜。

（重点为引用者所加）

三、四两项文章都很冗长，但紧要之处在于加了重点的部分。

这表明已向武断主义急剧倾斜，甚至带有露骨的挑衅。国境线上象通过了电压很高的电流。而“处理纲要”的起草人就是辻政信少佐。

辻政信所著《诺门坎》一书中写道：“关东军从‘九·一八’以来，反对中央的统制，断然在满州作战，这种风气成了其后多年的传统，带有不怕中央，不怕苏联的倾向。”“处理纲要”可以说是这种精神的具体化。

“处理纲要”下达半个月之后，终于通过“诺门坎事件”喷出火来。真可谓立竿见影。

请看当时关东军司令部的阵容。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第一次“上海事变”时是第9师团长、是在任3年的老资格。参谋长矶谷兼介中将，曾作为第10师团长出动华北，任第7联队长，当时就重视作为部下的辻中尉。参谋长矢野音三郎少将，原为海拉尔国境守备队司令官，在第7联队时，就担任过刚从陆士预科毕业的辻候补生的教官。第一科高级参谋寺田雅雄大佐，从参谋本部编制动员科调来，原在第9师靖江第36联队任职。作战主任服部卓四郎中佐，原来和寺田大佐一起在编制动员科。村泽一雄中佐与服部是同期生，七·七事变时，具有蒙古边疆方面的实战经验。岛贯武治少佐也来自参谋本部作战科，与辻是同期好友。还有航空主任三好康之中佐，是地道的航空军官。

辻少佐初次在关东军司令部任职（第三科，后改为第四科）是1936年4月。如前所述，他曾一时调任驻华北军参谋，新任作战科长是在1937年11月。由于继植木大将之后的老资

格，尽管只是一名少佐，作为幕僚却有较长的阅历。不仅如此，司令官和参谋长都是他的老上级，与副司令官和高级参谋关系也很深。而且在参谋本部时，与作战主任同在一个科，有很深的交情。正因为如此，在作战科，他自然有很大的发言权。

辻自己也颇有感慨地说：“通观前后，象当时关东军司令部那种上下一体、滴水不入的人际关系，是不曾有过的。”这话是可以理解的。

这是1939年5月11日的事。外蒙古军数十骑出现在诺门坎西南方15公里附近，满州国警备队当即出动，追到了哈拉哈河左岸。可是，这一地区属于满州还是属于外蒙？一直是个问题。

关东军提出的国境线在哈拉哈河，外蒙古方面却把哈拉哈河当作自己的领地，提出国境线应在哈拉哈河东约13公里处。这一主张在满州国外交部委托的矢野仁一、稻叶岩吉等东洋史学者收集的旧书中有明确记载，而且1937年满州国外交部在现地进行的国境调查，也得到了确认。（北川四郎著《诺门坎》）。

据说，担任这次调查的北川四郎把报告书打印了约30份，不仅送给了关东军司令部，还通过司令部送给了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但被忽视了。

因此，即使外蒙古方面认为侵犯了国境，关东军也不予承认。对国境的看法双方存在分歧。

头一仗的第二天11月12日，增加了兵力的外蒙古军数百骑，出现在哈拉哈河右岸，这回甚至与满州警备队进行了交战。担任这方面防卫的海拉尔第23师团，充满了不容置疑的紧张气氛。这是因为“处理纲要”刚刚下达。

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决心击退外蒙古军队，并非不可思议。他随急派东八百藏中佐率领的骑兵联队和步兵两个中队去洛罗高地附近，赶走了外蒙古军队，把“处理纲要”第四项所说的“无论兵力多寡和国境如何务期必胜”的指示付诸实施。

真是铠袖一挥，就把外蒙古军队赶到哈拉哈河左岸。部队撤回海拉尔是在16日夜里。没想到包括苏军在内的外蒙古军队，紧接着大举向哈拉哈河右岸挺进。刚刚构筑阵地，苏军飞机就来袭击，战争带有报复性。

山县支队（队长山县武光大佐）和东搜索队指挥步兵1个大队，联队炮中队和满州骑兵部队，出动进行抵抗。在哈拉哈河和霍尔斯赖河汇合处附近，东搜索队于5月28日开了火。但遭到苏军坦克和迫击炮致命的还击，搜索队被全歼。

山县支队主力向前开进，与以七三三高地为依托的苏军展开激战，由于兵力不足而不得不撤退。辻参谋通过这几次战斗，亮出了姿态，显示了威力。到此为止，作战是根据第23师团长的提议进行的。这被称作“第一次诺门坎事件”。

然而，苏军的行动如何呢？6月5日，朱可夫中将（后为元帅）到达外蒙古的塔木斯克，进入第57特别狙击军团司令部，他是奉人民国防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的特别命令而来，当即进行了实情调查。

回到指挥所与兵团司令部协商后，我们给人民国防委员发电，简单地报告了苏联和蒙古军队必须固守哈拉哈河右岸地带，同时准备从纵深进行反击的行动计划。

第二天收到了莫斯科的答复，人民国防委员会

完全同意我们的情况判断和行动方案。

（格·卡·朱可夫著《朱可夫元帅回忆录》）

据朱可夫的判断，苏军的战略目标是确保哈拉哈河右岸的桥头堡。不久，朱可夫被任命为第57军团长，指挥所前移到靠近哈拉哈河左岸的哈玛尔达巴山。

6月19日，小松原师团长给关东军司令部发电，要旨为“诺门坎方面的敌军在不断增加兵力，敌人在强有力的坦克协同下，终于赶走了当地的满州军。”并附有出于防卫上的责任，打算主动予以惩罚的意见。

关东军当即召开作战会议，寺田高级参谋发表意见说：“在处理支那事变时，最具有重大影响的，是如何对待英国。正当这一问题走上正轨时，与苏联发生纠纷，使大本营的气氛受到这个方面的牵制，从而使英国问题有不得善终之虞。解决诺门坎问题是否选在把英国问题处理到一定程度的时机，不知意下如何？”

这里所说的“处理对英关系”，是指日军于14日实施的关闭天津英租界的问题。寺田高级参谋观察内外情势，意在促进日本自重。而辻政信参谋却与其针锋相对，他说：

“推动日英会谈的有效方法，毋宁说在于不说只干的威力。如果在诺门坎对敌人公开的挑战坐视不顾，必将发生第二、第三次诺门坎事件，甚至有可能发生全面冲突。”

所谓“敌人的公开挑战”，其经过和实情如何，都没有人问及。当时战争的规模，本是通过外交途径可以解决的，但积极主动的惩罚论被采纳了，从大局着眼的自重论却被简单地看成了胆怯者的遁辞。

在这种气氛中，作战主任服部卓四郎中佐赞同辻的意见，作战科全体参谋都表示服从，而且进一步推动了矶谷参

谋长和植田军司令官。

在关东军参谋部，有与辻少佐关系极好的第四科科长片仓衷中佐。但辻少佐在进入作战科之后，也就不听片仓中佐的忠告了。

然而，作战科长寺田大佐、作战主任服部中佐都没有实践经验。即使一般的参谋工作，在实践经验方面也远不如辻少佐。辻之所以在作战科内掌握了主导权，与这种经历的不同，有着微妙的关系。

因此，关东军司令部直接出面指导作战。所谓第二次诺门坎事件，指的就是其后的作战。部队刚一出动，大本营就收到了作战报告。但在大本营里也分为自重论和积极论。自重论的先锋是陆军省军事科长岩畔豪雄大佐。他说：

“处理这种毫无价值的问题，也使用战略单位的师团，事态这样不断扩大，究竟想干什么？参谋本部正在要求扩充庞大的军备，居然同意这种消耗，这是怎么回事呢？”对此，稻田作战科长答道：

“万不得已时，只要决心放弃兴安岭以西也就行了。说不定要准备让第23师团突击一下。尽管如此，也要有限度。至多把一个师团交由关东军自行裁定。”

据当时军事科高级科员西浦进中佐回忆：

当时稻田大佐有个毛病，遇事总要直接与大臣联系，然后作出决定。这回也是直接报告大臣才进行交战的。稻田大佐的报告称：为了对付骑兵队的报复，必要时派出第23师团的主力，给苏军以打击。报告之后，岩畔军事科长正要发言，板垣大臣说：“好啦！”完全同意稻田大佐的意见。既然大臣同意了，也就只好如此。就这样开始了诺门坎的

战斗。

（西浦进著《昭和战争史的证言》）

这就是掌握参谋本部核心的稻田大佐的言行，口气很大，却又没有主见。而在九·一八事变中以独断专行称著的板垣参谋，如今已是陆军首领，就更难妥善解决了。

第2飞行集团6月27日袭击了外蒙的飞行基地塔木斯克。据上报的战果：击落小型飞机100架、击毁40架。然而，这次袭击是超越参谋本部动手的。辻政信这么说：

连忙用电话呼叫东京，由寺田参谋直接向作战科长报告战果，东京大声怒斥：“混帐，什么战果！”听起来声音很大。手拿话筒的寺田参谋手在发抖，脸上鼓起了青筋。

这是不顾性命取得的大战果，而且清楚地表明是我方采取的报复行动。对此，参谋本部竟是这样无视第一线部队的心理，蹂躏其感情，这叫什么参谋本部！

当然，事前没有与大本营联系，也可以说是故意隐而不报，发动了袭击。这一点作为幕僚的工作的确欠妥，心里也暗自感到内疚。

此时，如果对方说：“啊，祝贺你们。不过，往后要注意联系……”那么，我们也会发出谢罪的电报。

（辻政信著《诺门坎》）

这不禁令人想起了“见树不见林”的比喻。稻田作战科长作了如下回忆：

如此考虑到了关东军的立场，既然说好不要那么性急，也知道大本营不同意，更何况是抢先动

手。对这种不顾道义的谋权行为，我打心里生气。居然在新京扬扬得意地发表了进攻取得的大战果。参谋次长仓促去皇宫上奏，带着沉痛的表情退了下来。

天皇声斥道：“随意轰炸外蒙境内，这叫干什么！这责任由谁来负！”次长只好说：“眼下战斗正在进行，等告一段落之后，将使其明确责任。”

从张鼓峰事件以来，就确立了统帅的体系，从来没有挨过陛下的声斥。我对体系的确立，是最为操心的，寺田不会不知道我的想法。是本人冲昏了头脑？还是上了年轻人的当？究竟为什么那样想到满州呢？

我认为采取宽松的手段是根本抑制不住的，于是用直通电话叫出了新京的寺田第一科长，大声训斥了一顿。

（稻田正纯著《与苏联远东军的对峙》）

对外蒙古的空战应该根据勒令进行，从统帅原则来看，正邪之别是很明显的。然而，这种非法的下克上的风气和独断专行起源于何处？尽管有人认为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传统，但究竟原因何在？

轰炸外蒙的企图，由于不时进京的高级参谋片仓中佐通过军事科长岩畔大佐透露给了参谋本部。参谋本部很惊慌。24日，在发出敦催停止轰炸的次长电的同时，通知将派作战科高级专员有末次中佐乘飞机前往。尽管知道这一情况，辻少佐一伙人却仍然擅自决定于6月27日晨反复空袭外蒙古。

狼狈不堪的参谋次长，于同日下午给关东军参谋长拍发了如下的电报：

对外蒙境内的轰炸一事，今天才知道。根据过去与我部取得谅解的你军处理方针，其主旨有根本性不同，事先又未取得联系，诚实遗憾。自不待言，对于这一问题，影响极大，其性质不是你所能决定的。根据作为我部仍应坚决严守从来主张的方针，切望考虑打消上述企图。以上依命。

对此，28日，关东军回电如下：

作为处理国境事件的根本方针，我军坚持之点在于扼杀对方蠢动。同时在其不法行动初起时，给以痛击摧毁，使其慑服，以不断加强北方之防务，并对此次根本解决支那事变作出贡献。只是在对现状的看法和采取的手段上与贵部的见解有所差异，也许正因为如此，希望将北边此事交与本军，请放宽心。以上依命。

（重点为引用者所加）

所谓“依命”，就是“根据命令”的意思。这里的意思是按植田军司令官的意图，矶谷参谋长授命拍发电报。这就看不出对进攻外蒙的越权行为有所反省，原因何在？

何况所谓“北边此事”之类的话，并非容许其骄傲不逊。电文中看不出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哪一方是上级。为何出现这种不可理解的事？

奇怪的是关东军司令官和参谋长都不知发了回电。不仅如此，通知停止空袭外蒙的参谋次长的电报，实际上也未予理睬。这些事后来才知道是由辻少佐起草，违反规定让电讯班发出的。

据战后看了电报批准表的井本熊男大佐称，在科长、参谋长、军司令官栏内盖有辻的印章，代理和签字。可实际上并

没有可以代理军司令官、参谋长的规定。辻少佐的放肆，自不必说，也说明统帅权的紊乱。

这是属于陆军刑法规定的揽权之罪。井本大佐对我的提问是这么回答的：

从根本的统帅原则来说，关东军司令官的电文是违反统帅权正道的，是违抗作为上级最高司令部大本营意图的行为。司令官本该当即罢免。如果是苏军，也许会当即处以死刑。希特勒的德军也是如此。

其后，既然知道是辻参谋任意发出的电报，辻参谋也应当即免职，而且军队不得再用。这个电报的事例，我认为在搞乱统帅系统这一点上，在日本陆军存在期间，是空前绝后的唯一事例。

然而，这却是陆军统帅权处于正常状态下的真事。遗憾的是，正如日本陆军不能果断进行统帅一样，当时已经堕落到了这个地步。可以说辻参谋也犯了这个弊病。

作为关东军司令官，还得吃尽一名少佐的苦头。辻少佐的无轨行为愈演愈烈，实在令人吃惊。

第5章 诺门坎的战死者

继空袭塔木斯克之后，又进行了地面作战，限制关东军行动的6月29日大陆令第320号称：

“关于满州国所属领土，在与邻国的主张有分歧的地区和不便使用兵力的地区，以兵力进行防卫时，不得依情况行事。”

这说明对关东军的独断专行感到棘手的大本营，没有采取果断措施，而只是想进行限制。根据这一大陆令，本无需勉强进行作战。可是，关东军却不改变击退敌军的方针。作战计划是由辻少佐拟定的。

第23师团主力从塔基湖方向渡河，进入哈拉哈河左岸，向哈拉哈河和霍尔斯顿河汇合处出击，进而阻断右岸苏蒙军的退路。另一方面，安冈支队（安冈正臣中将指挥的机甲兵团）南进到哈拉哈右岸，从正面歼灭苏蒙军。企图通过两岸夹击，使苏蒙军成为瓮中之鳖。

渡河作战预定在7月2日夜里进行。以步兵3个联队和野炮1个大队为基干的第23师团的主力，占领了左岸的巴因查干高地，开始前进。然而，很快遭到了强有力的反击。敌人派出坦克和装甲车各150辆，另外还有炮兵、狙击兵和骑兵协同作战。

面对这种情况，渡河部队却没有一辆坦克，火炮也只有42门，真是“螳臂挡车”。部队反而有被苏军以巴因查干高地为中心进行包围的危险。与师团同行的矢野、服部、辻三

位参谋碰头商议，最后不得不指示部队撤退。这是3日下午3时左右的事。那么，为何要进行渡河作战呢？说起来，这是一个极不周密的作战计划。

另外，右岸的坦克、装甲车和步兵两个大队为基干的安冈支队的进攻，也未能接近苏蒙军的纵深阵地。哈拉哈河两岸的作战，以彻底惨败而告终。

关东军焦急地想摆脱劣势，随即由步兵改为以炮兵为主体的作战。从内地动员了野战重炮兵第3旅团、独立野战重炮兵第7连队，企图摧毁以左岸台地为依托的敌炮兵阵地。

总攻击于7月23日开始。可是，特意安排的大炮战也未取得战果。战线空虚，处于胶着状态。自以为了不起的关东军，从25日以后，也只好采取持久防御的态势。

这时，保有优势的苏蒙军实行了统帅一元化。7月5日，在赤塔新设了远东方面集团军司令部，任命M·P·斯特恩为司令官。

朱可夫指挥的特别狙击第57军团改编为第1集团军，编入斯特恩麾下，司令官仍由朱可夫担任。这就可以看出苏军对哈拉哈河会战的决心。

对此，日本方面于8月4日组成了第6军司令部，由获洲立兵中将任司令官。第6军下属第23师团和第8国境守备队等部队，兵力并没有特别加强，只打算根据上级军部的意图来收拾局面。

这里也表明野马似的关东军与打算结束事态的大本营的意见存在分歧。可以说是不彻底的大本营统帅关系。这一点，与苏蒙军的行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苏蒙军从空中和地面发动大举进攻是8月20日早晨。动用了600门大炮和250架轰炸机和战斗机。对预定在24日发起总攻的第6军来说，真是突然袭击。在行动上被敌人抢了先，新任命的幕僚只好仓促持刀应战。

“哈拉哈河会战”的现场总指挥官朱可夫中将的作战计划，是想以中路集团军和南北两路集团军的兵力，包围和歼灭在国境线内的日军。

中路集团军从诺门坎方向正面突破，23日北路集团军占领了普伊高地，南路集团军也攻下了霍尔斯顿河南岸的阵地，包围作战取得了成功。

对此，第6军进行了殊死的反击。苏蒙军的狙击兵和火炮占有数倍的优势，而第6军连坦克都没有。那是一副以白刃战对付坦克的凄惨情景。

关东军在苏蒙军的优势面前惊慌失措，于25日把驻齐齐哈尔的第7师团主力加强给第6军。接着，第二天又决定紧急增派掖河的第2师团和佳木斯的第4师团。

朱可夫说：

“我军的坦克装甲车和机械化部队打垮了敌方的部队，于8月26日日落前完成了对日本整个第6军的包围。接着从当天起把敌军分割开来，开始对包围的敌军进行扫荡。因为是沙地、深沟和沙丘，战斗十分困难。日军的部队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兵。”

（格·卡·朱可夫著《朱可夫元帅回忆录》）

就这样挨到8月31日早晨，日军从苏蒙军提出的国境内，不留一兵一卒全部撤退。

8月30日，大本营下达了结束攻击的大陆令第343号，关东军对其中委婉的指示不服。为此，9月3日，紧接着又发出

了停止攻击的大陆令第349号，内容如下：

一、鉴于情势，大本营打算今后自动了结诺门坎方面的国境事件。

二、关东军司令官应停止在诺门坎方面的攻势作战。为此，应如可以防止发生战争一样，在哈拉哈河右岸的争议地区之外，先将兵力布署在间隔适当的位置上。

尽管如此，关东军仍以收拾战死者为名，要求作战，但最终没有容许。植田军司令官下令停止作战，已经是9月6日以后的事了。

另一方面，9月9日，东乡驻苏大使提出在诺门坎停战，与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于16日凌晨达成了停战协定。

正好9月1日，德军进攻波兰，3日英法对德宣战，欧洲的战争阴云使苏联感到焦急不安，也许是理所当然的。协定生效后的第二天，17日一大早，苏军开始进驻波兰，也就明显看出了这一点。苏联之所以不顾战胜者的立场，意外地以柔软的态度达成妥协，就是因为自己家里有这种情况。

国界划定会议从12月7日起，在赤塔和哈尔滨举行了16次。就在妥协之前，苏蒙方面撤回了代表团。这是为什么呢？这件事经历了近40年，令人惊奇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当时，国界划定会议的满州国代表外交部政务司长龟山一二，于1978年9月5日在岐阜县关市自己家里说出了如下的话。提问的是出席同一会议的辅佐官北川四郎。

——会议失败的原因，据军人说是苏联方面违约。请再稍许说详细一点。

龟山：没有的事。那是辻政信给搅的。

——啊！

龟山：正如你也知道的，诺门坎地区是苏军占

领的，而哈伦阿尔查西南地区是日军确保的有利地盘。占领地谁也不归还。最后双方彼此承认这一事实，才算谈妥了，只待签字。没想到让利用白俄罗斯人给破坏了。理由是自己的部下、前辈、晚辈许多都战死了，因此，要圆满解决很困难，他们打算再干一场。

——对，这和当时三品参谋说的相同。

龟山：是这样。

——对不起，作为全权代表都给予了什么权限？

龟山：只是说要达成协议。

——哈尔滨与新京之间是用电话联系的吗？

龟山：不，只用电报。因为植田军司令官兼任驻满大使，作为大使的植田军司令官，事先与外务大臣谈好了。

——原来如此，这就明白了。在前一天的碰头会议上，三品少佐说：“你不是补佐官吗，我是全权代表。”这就可以作出碰头会的结论喽！

龟山：让不能直接违抗军司令官的命令，所以才利用白俄罗斯人的。有个波克达洛夫少将（苏联代表），还有个叫什么名字的……

——切莫沙伦（外蒙代表）

龟山：是他，是他。让利用白俄人要杀死那两个人。他们可真的要杀人啊，只要一签字就杀。两个人跑掉了。让这家伙真叫厉害！

——可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龟山：波克达洛夫来向我辞行，说“今天马上就走”。我很生气，说那不是把明天的签字搅乱了

么。他说：要是那样，就会被杀掉。随即说出了白俄人威胁他的事。

如果被杀，那就不好办了。所以我不能说即使被杀也要签字。因为相比之下，人被杀要比谈判决裂严重得多。

——是吗。赤塔会议结束时，有人说“成功了回去将会被杀”，这话是真的喽！这回听你说的事可以写出来吗？

龟山：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因为是真事嘛。

（五味川纯平著《诺门坎》）

这又是惊人的越轨行为的例证，不禁使人怀疑关东军司令官究竟是谁。

结果，划定国界的交涉移到了莫斯科，由东乡大使和莫洛托夫人民委员之间于1940年6月9日在图上划定。就是在诺门坎地区划定了苏蒙方面一贯主张的一条线，在东南部的汗达卡雅地区，苏蒙方面作了一点让步。

争吵不休的国境问题，最终依然如故。而众多兵员的牺牲，却永远无法挽回。

据第6军军医部发表的统计：出动人员58925人。战死7720人，负伤8664人，病号2363人，生死不明1021人，共计损失19768人。其中除去生死不明者，还有18747人。部队的主力，小松原中将率领的第23师团，损失率（死伤病）实际达到了73%。

然而，对这个公布的数字还有如下不同的看法。不妨引用历史学家洞富雄教授的记述：

在此之前，我推测关东军司令部为了掩盖战败

的真相，少报了日方资料表明的诺门坎事件的战死者人数。前不久终于确认了这一事实。

去年10月2日，在靖国神社举行了诺门坎事件战死者慰灵祭，第二天（10月3日）的《朝日新闻》晨刊报导：战死者为18000余人。这也许是靖国神社或厚生省今年才发表的牺牲者的实际数字。长期以来一直在欺骗国民。

（洞富雄著《近代战史之谜》）

晨刊登载的报导占了整个下半页，开头写道：

“1938年在苏蒙国境上发生的诺门坎事件的战死者18000余人的慰灵祭，2日上午10时起，在东京九段靖国神社举行。”仅就这一报导，就知道战死者为18000余人，并不包括伤员和病号。

然而，就在事件发生之后不久的1939年10月3日地方长官会议上，陆军当局所作的说明是：“今年5月诺门坎事件发生以来，到停战为止，我军的损失为死伤和病号加在一起约有18000人。”

这就是说，事件发生后不久的1939年发表的数字，与战后1966年发表的数字大体相符。但内容却有着“死伤加病号”和“战死者”的重大差异。如果相信“战死者为18000余人”的报导，产生怀疑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还会产生“长期以来一直在欺骗国民”的愤慨。

在这一指责之后，家永三郎也指责说：“日军8月下旬陷入重围，以至遭受了仅战死者就达18000余人（日本政府把这个战死者数字一直隐瞒到1966年）的重大损失。”

（家永三郎著《太平洋战争》）

还有五味川纯平也同样作了谴责：

“第二天的新闻报导说其战死者数为18000余人，而从事件发生后军部发表的数字来看，死者的人数增加了1万。热衷于把战败的事实从国民的眼前掩盖过去的军部，是有必要把数字缩小的，但靖国神社就没有必要夸大数字。”

（五味川纯平著《诺门坎》）

我也带着同样的疑问，向靖国神社的调查科作了打听，回答说：《朝日新闻》的报导不是神社发表的数字。接着，又从诺门坎会议事务局的阿部武彦那里得到了答复，说“1966年报纸发表的伤亡总数有误。”他的答复是以第6军军医部发表的数字为依据的。

只是单方说报导有误，尚不能就此了事。重要的是新闻报导。我又就报导的可靠性致函《朝日新闻》社会部长。答复说不知当时的记者是谁，也弄不清取材于何处。

这一来，就没法确认正确与否了，只好依靠推测。不过，疑问原产生于靖国神社的报导，这一点是明确的。既然来源不明，认为数字可疑是理所当然的。

正如前面看到的，双方的概数是“约18000人”和“18000余人”，是很相似的数字。只要陆军当局发表的数字不正式更正，就不得不考虑其后发表的数字有误。

这就是说会导致一种推论，认为靖国神社的报导可能是把“死者”与“死伤和病号”搞混淆了的误报。

如果是那样，前面提到的对陆军的指责，也是出于对新闻报导的单纯相信。

那么，为什么数字的错误未能被敏锐的评论者识破呢？第一是因为有《朝日新闻》的报导，把它看作是可信的。第二是眼睛向着苏方发表的数字。洞教授介绍的《祖国大历史》一书中的报导是：

“仅7月~8月，日、满军的战死者就有18868人，负伤者25900人，共计损失44768人；整个作战期间的损失为战死者25000人，负伤者27000~30000人，总共达到52000~55000人。”（引自《近代战史之谜》）他还说：

“把日、满军的战死者计算为18868人，从计算的详细这一点来看，可以推测大概是根据日方的资料记述的。”

可是，这恰恰与靖国神社报导的概数相符。

第三是事件的开始、进展都异乎寻常，是由陆军秘密处理的。因此，意测揣摩甚多，以至对当局发表的数字产生了怀疑。结果造成了倾向于偶而作出报导的靖国神社的消息，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苏蒙方面的伤亡如何呢？

据1961年出版的《苏联祖国大战史1941—1945年》第1卷（日译本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统计，“苏联、蒙古军的战死者和伤员共9824人”。即使再加上病号，也要比日军当初发表的伤亡要少得多。

可是，1980年发行的《苏联军事事典》第8卷，却出现了18500余人的数字。尽管发行的时间相隔19年，数字的距离也太大了。这里也有值得怀疑的余地。

“这种修正完全是根据新的数据作出的，不能认为有别的意图。”通晓苏联的学者持有这种见解。可究竟怎么样呢？

第二次大战中，苏联国民的战死者估计达到2000万人，可这个数字的出处一直无从知晓。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为了求得西方的让步，作为交易材料加以利用的。苏联发表的数字也许一下难以使人相信。

这且不说，反正诺门坎的伤亡者经过多少年之后公布的数字增多了，看来似乎更有其真实性。关于日苏两军的兵员伤亡，好歹没有大的差距。

第6章 多灾多难的须见联队长

下文引自辻政信所著《诺门坎》一书。

到达哈纳高地须见联队本部时，太阳还很高，可联队长正在吃晚饭，奇怪的是他还喝着啤酒。在这激战之地居然有啤酒，这是怎么回事？而且当着不吃不喝正在战斗的士兵的而……不快之感立即变成了愤怒之情。

“安达大队怎么样了？”我问。

“嗯……安达那家伙随意冒进，才落得这个样子的，没有办法呀……打算今晚派尖兵去联络一下。”

下属一个勇敢的大队长孤立在敌人包围之中。据说情况危急，这个时候，联队长却带着一张冷冰冰的脸在喝啤酒。这象是陆军大学出来的秀才吗？

“为什么不打出军旗全力救援安达大队呢！作为军官能见死不救吗？”

站在一旁的第2、第3大队长，还有联队副官，终于忘掉了级别和地位，小声地表示对联队长不满。联队长已经把军旗后撤到了将军庙。居然把与联队共存亡、作为三千官兵之魂而授与的军旗，后撤到数里后方的将军庙，这是干什么！

联队长吃完了饭，似乎内心确实受到了谴责。他把重兵器留在阵地上，以步兵全力进行夜袭，终

于从重围中救出了安达大队，抬着安达少佐以下约100名伤亡人员，半夜过后开始渡河。

这是辻严厉指责须见联队长的文章。那么，是不是可以不折不扣地接受下来呢？1955年8月7日的《周刊读卖》刊登了须见新一郎大佐的“笔记”：

辻氏用他那种语调狠狠地把我说了一顿。在第一次战斗中，安达大队脱离了我的指挥，归入小松原兵团长的直接指挥之下。我并没有悠闲地在喝啤酒。

战斗中每天都出现口渴的患者，更需要水。记得7月4日下午，在联队担任书记的中野军曹拿来了装有哈拉哈河水的啤酒瓶，劝我吃饭，我用嘴对着啤酒瓶喝了一口，接着就放在沙地上。

这段文章的原文在战时1944年7月15日发行的须见大佐回忆录《实战点滴》中也有所记述：

“还活着的书记中野军曹代替传令兵三上，拿来了面包和装有哈拉哈河水的啤酒瓶，劝我吃饭。我没有说什么，把饭吃了下去。眼下有什么可说……碰巧孤身活了过来，唯有默默无言地尽力指挥部队。”

三个大队长当中有两人战死，这种孤寂的思想在这里表达出来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辻的文章就应该说是狂言的罗列。根据当时紧迫的战况和大佐不会喝酒，一般都知道那不是啤酒，而是哈拉哈河的水。

辻参谋有时说酒装在水壶里。即是如此，也只能当作斜着眼睛看人的一种胡猜。看了《诺门坎》一书的当时勤务兵外崎善太郎，作为活证人也说：“什么啤酒，全是无稽之谈。”他于1960年3月发出了抗议信。不过，须见大佐的笔

记里有中野军曹的名字，却没有外崎勤务兵的名字。于是，我给青森县五所川原市还活着的外崎写了信。下面是他的答复：

中野军曹是联队的书记，他命令我到哈拉哈河去打水。途中拾了个空啤酒瓶，装上河里的水，转身拿到中野军曹的战壕里。我们两个把干面包和啤酒瓶的水拿到联队长的战壕里去，放好了才回来。

因为3日以前的勤务兵（三上伍勤上等兵）战死了，从4日起，我当了勤务兵。这一事实我想只有中野军曹知道。不过，中野军曹8月27日傍晚在七八〇高地离我约5米的地方牺牲了。

为什么会有空瓶呢？因为要作成装上汽油投向敌坦克的火罍瓶。汽水瓶更合适，不过也用啤酒瓶。

这一来，须见联队长和外崎勤务兵的关系也就很清楚了。

辻政信对抗议信作了答复，于1960年4月19日送到了外崎手中，用钢笔写了4张便笺。全文如下：

来信拜读了。想到老上级须见君的那种情怀，真令人感动。我在著书中写到了啤酒的事，须见君看了，如今仍在生气。去年底举行诺门坎慰灵祭时，当着大家的面把我骂了一顿。

我并不想辩解，当时安达大队陷入重围，联队长理应把他们救出来，可是，看上去象是置之不顾的样子。因此，我与当时在联队本部的其他大队长谈了谈，听他们说，联队长没有那个打算，尽管身在前线，却还喝着啤酒，表示非常愤慨。

当时喝的不是啤酒，这是从你的来信中才知道的。可当时大队长对联队长处理安达大队的做法很生气，这是事实。

须见君退役使人感到象是我造成的，这是误解。特务机关长时代的许多事情，在大本营里都当成了问题。今天已经没有必要再把20年前的事闹大了。

在慰灵祭的席上，我把喝啤酒的事删去了。军旗的事，军司令部也发了火。以上就是我对你郑重来信的答复。

拜读来信，看到当时担任勤务兵的你，对须见君如此慕恋，使我想到必须改正自己过去的看法。这不是什么个人感情问题。请恕不恭，顺致问候，此复。

当时的辻政信已是参议院议员，尽管过去是战犯，仍然一副高姿态，对旧军人耍威风。从回信的内容也能看出这一点。

“如果你是尊重事实、承认错误的军人，至少要向须见联队长本人坦率地表示谢罪。”外崎这么希望。然而，他却与此相反，到最后也没有谢罪。

既然出现了外崎这个活证人，那就重新表示谢罪，也是很正常的。答复只是说“喝啤酒的事已经删去了”。可删去与谢罪应该是两码事。

不仅如此，复信还涉及没有问到的“退役”问题，把特务机关长时代的事也端了出来。

须见中佐担任满州国黑河特务机关长，是1935年12月，接着于第二年1936年8月，担任绥芬河特务机关长，第三年

1937年8月，晋升步兵大佐，担任麻布联队区司令官。

复信中说“许多事情在大本营里都当成了问题”，这种说法好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如果是这样，那么，从不担任机关长之后到待命的1939年12月止，这两年4个月又是怎么过来的呢？

这只能说辻使用了拿手的顶替和逃避责任的手法。后面还要谈到，从在战场上两个人的接触和《诺门坎》一书的内容来看，说“退役”是由辻参谋策动的，也并非不可想象。

再说军旗问题。在《诺门坎》一书中是这么指责须见联队长的：“军旗已经后撤到了将军庙。居然把与联队共存亡、作为三千官兵之魂而授与的军旗，任意撤到数里后方的将军庙，这是干什么！”

那么，究竟是不是象辻参谋指责的那样，把军旗后撤了呢？

第7师团长园部和一郎中将让幕僚带着7月10日写的亲笔信，交给在普伊高地附近比尔开尔湖畔的须见联队长，亲笔信写了8张便笺，其三分之二部分的要点为：

3日、4日会战前，曾派出了杉野尾参谋，感到奇怪的是，杉野尾参谋回来说，须见部队与从阿尔山方向前进的梶川大队合并，组成了安冈支队，似乎有渡过哈拉哈河给敌人以威胁的意图。听后感到这是一件大事。如果接受这项任务，那么，渡河部队必将落得被全歼的命运。可是，既然是任务，就必须执行。在这种情况下，要一步一步探着往前走，决不可中断与后方的联系。

敬告吾兄：关于军旗，总之希望不要渡过河去，并无他意。唯此诚如父母思念儿子之心，请予

凉察。

他能预见到渡河作战多么危险，这就非同一般。事实上，情况正如预见的那样，出击半天之后，就不得不后撤。

就军旗而言，所谓“希望不要渡过河去”，那是预见到是一场莽撞的作战，是满怀深情的忠告。这是写在亲笔信上的，而且在渡河前，赶紧派幕僚送往战场，口头也传达了这个意思。

须见本属于驻齐齐哈尔的第7师团，师团长的忠告里就带有这个意思。既然连全歼都预想到了，哪有理由胆敢把军旗拿到战场上去呢？至于愤怒，对作为这场失败的战争的拟案人辻参谋来说，只能说是发泄私愤的藉口。

然而，这种看法包括了园部中将的忠告，都是以军旗实际移到了将军庙为前提的。那么，军旗到底移到了将军庙没有呢？下面出示的证言，说明辻参谋的指责存在疑点。

当时步兵第26联队第2机枪中队长，后来是联队副官的寺岛义雄大尉，现在山形县南阳市。1974年11月对须见裕（联队长的长子，原陆军大尉）的来信，写了如下回信。回信最后说“以上是证言”，还签了字盖了章，要点如下：

一、须见联队长指挥第3大队（菊地大队）前去救援第1大队（安达大队），临出发时，对战况作了周密的考虑，军旗交付国分中队（第10中队）保护，把渡河点（工兵架桥）移到了哈拉哈河右岸。

二、左岸的攻击部队（小林兵团）转进到了哈拉哈河右岸，须见部队变成了尾部后，军旗与部队一起行动。

说把军旗移到了将军庙是不对的。当时我由师

团直辖，就在将军庙，能证明这根本不是事实。

说军旗从起初就放在将军庙，也是不对的，我在将军庙目送部队主力出发。这种事毫无根据。

只需看看这一证言，就知道在救出安达大队的夜袭中，军旗只不过稍稍移到了哈拉哈河右岸的渡河地点。只能说是适应情况的一种妥善措施。虽说不是完全按园部中将的忠告行事，但可以说灵活地贯彻了其精神。辻参谋断定军旗后撤到了将军庙，根本不能认为是事实。

还有，《战斗详报》里也是这么记载须见联队长的：“在为救出被困的安达大队而进行的夜袭中，第10中队作为军旗中队留在现有的阵地上。”这也完全证实了寺岛大尉的证言。

那么，辻参谋断言的根据何在呢？《诺门坎》一书是战后1950年8月初次出版的回顾性战记。从事件发生以来，已经过去10多年了，不能说记忆肯定是准确无误的。

尤其是对话，那是随意说出来的，也许应该看作是一种推测。与寺岛大尉的证言有矛盾，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不管怎么说，令人强烈地感到辻参谋的断言与园部的书信有关。须见联队长自己承认书信的内容在战场上是极度保密的。但事件发生之后，就不能说肯定还是如此。

1944年7月出版的《实战点滴》，其中没有涉及军旗的部分，但书信的前半部已经发表。那么，涉及军旗的部分，是不是作为情报口传下来了呢。

要知道辻参谋是善于打听别人的秘密的，也有可能是通过好友服部参谋得知的。更何况对方是在啤酒一事上十分生气的须见联队长，很有可能作为绝好的攻击材料拿出来。也就是把从园部书信中摘取的情报，错误地当成了事实，写在

回忆文章里。能说这种情报不会有错吗？

防卫厅公开发表的战史《关东军(1)》里也这么记载着：

业已查明，在左岸的战斗中，须见联队长考虑到万一，所以把军旗后撤到了后方的将军庙。辻大佐在其著作中对此作了批评。然而，关于联队军旗后撤的问题，是有其背景的。

这就是说，该联队原属第7师团，师团长园部和一郎中将在须见部队出动后不久，即派出幕僚，根据对作战要十分慎重的主旨，说明了必要时军旗可以后撤的想法。（重点为引用者所加）

这里没有写明“业已查明”的根据。尽管出现了辻大佐的著作和园部中将的说明，但举出将军庙这个地名来的，只有辻大佐的著作。这也说明上面的引用文是以《诺门坎》一书的记述为根据的。

这一来，辻参谋的误传和意测就开始独自传播开了，甚至连公开的战史都受到了影响。说明误传多么可怕！不正确的战记变成了影响历史事实的经典。

再说，须见联队长尽管通过夜袭救出了安达大队，辻参谋却把动机写成了“似乎内心里确实受到了谴责”。可是，在啤酒一事上，在联队军旗问题上，正如前面看到的，却不认为联队长“内心受到了谴责”。

不管怎么说，在救出处于被包围中的安达大队（第1大队，安达千贺雄少佐）这件事上，即使谁也不说，作为联队长，肯定也是迫切期待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在4日的夜袭中，才亲自挺身前去营救。

“作为部队长的我，在命令菊地少佐进行夜袭的同时，想到眼下已失去了许多有力的干部。如果万一该少佐也牺牲

了……于是亲自跟随夜袭部队……可是，可恨的敌手榴弹，终于使我负了致命的重伤。”（《实战点滴》）

联队长对菊地少佐的担心应该是对的。

面对坦克和火炮进行步兵夜袭战，那是极其惨烈的，战死大队长以下143人，伤278人，共计达到421人之多。让说“死伤安达少佐以下约100人”，即使是估计，也太少了。渡河作战失败，造成这么大牺牲，不管怎么说，首先应归咎于作战计划的失败。

在夜袭战中，须见联队长历尽艰辛，得以生还，可遭到了辻参谋的种种责骂，这该如何理解呢？这只能看作是把责任转嫁给他人的一种恫吓。在联队长一级当中，只有一人生还，反而一下子被撤职了。是谁策划的？这并不难想象。

须见大佐自己在战后也说：“自己处在那种乱纷纷的战斗中，又碰上辻这么一个恶棍，所以当场就被撤职了。”

（堀江芳孝著《辻政信》）这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说明辻感情的好恶多么强烈，把合不来的上级当成了瞄准的目标。

须见大佐好歹得以生还。可部队长一级的人几乎都暴尸在战场上。另外有两个部队长在小松原师团长的逼迫下，用手枪自杀了。一个是搜索支队长井置荣一中佐，理由是8月24日擅自撤离普伊高地，另一个是第8国境守备队长长谷部理睿大佐，被指贡为同月26日擅自撤离罗洛高地。

可是，两人都是在绝望的状态下，认为与其坐着等死，不如再图后策，才撤退的。然而，不管理由和情况如何，都没有当一回事。因此，这是掺杂着感情的一种私刑。特别是井置中佐，辻参谋的中伤是致命的一击。《关东军秘密作战日记》中这么写着：“26日傍晚，辻参谋从战场上回来报告情况，说到今天为止，新京最为焦虑的是是否能保住普伊高

地和是否能确保霍尔斯特河南边的阵地。据辻报告，普伊高地的兵力有800人，只付出了300人的伤亡，就撤出了阵地，而且在搜索队长井置中佐给师团长的报告中，对放弃阵地没有谢罪的词句……”

然而，井置搜索支队的作战，使苏蒙方面都感到棘手，这一情况连苏联的战记都有记载。问题在于辻参谋对普伊高地的实情了解到了什么程度。原第23师团作战参谋扇广大佐这么说：

“事实是只有269人逃脱出来，占总兵力的约四分之一。这种错误的早报，使关东军和大本营都在指责井置大佐。事实上，水、粮食、弹药都没有，又怎么战斗呢。”（扇广著《诺门坎事件·井置大佐自杀》）

可以说是误解和坏感情把誓死作战的部队长逼上了死路。

从须见联队长和井置支队长的例子，也可以看到辻参谋在进行超越参谋职权的活动。那是一种宪兵行为。这种作战参谋在整个陆军中也许是空前绝后的。完全是仿效苏联红军中政治委员的专横。

第7章 战败责任者的搭档

在阵地和医院自杀的部队长还有3人。步兵第64联队长山县武光大佐和野炮第13联队长伊势高秀大佐合谋撤出巴尔沙卡高地。可是，因处在敌人包围之中而自杀。

步兵第72联队长酒井美喜雄大佐右手负伤，送回后方，在齐齐哈尔部队医院自杀。可能是因为想到部下浴血奋战，责任感使自己苦恼不堪才这样做的。

战死的部队长还有步兵第71联队长森田彻大佐、他战死后代理部队长东宗治中佐、穆稜重炮兵联队长染谷义雄中佐、坦克第3联队长吉丸清武大佐。师团参谋长大内孜大佐也战死了。此外，负重伤的部队长有3人。从如此众多部队长级的牺牲，也就清楚看出这是一场多么难以挽救的誓死战斗。

在战斗中牺牲和自杀，就算是战场上常有的事，可是，出现被迫自杀的部队长，也许是个例外。再看看一旦成了俘虏，又是怎样的下场吧。停战时，东部宪兵队司令官大谷敬二郎大佐写道：

由于身负重伤，被敌人俘虏了。伤好之后，逃回来被枪杀的例子有没有呢？至少我没有听到过。

1939年，在与苏联的诺门坎国境纠纷中，落入敌手的日本俘虏，在签订停战协定之后放回来。事实上，他们就没有被军法处决的。但有这种传闻：人所周知的辻政信参谋却逼迫人家自杀……

（大谷敬二郎著《俘虏》）

大谷还说，俘虏即使交付军法会议，也不会被处决。当然，这只是原则，真相不明。他只是含混地说：“有这种传闻”。那么传闻到底真实到什么程度呢？须见大佐对晚辈这么说：

“辻政信把手榴弹带进了军官所住的医院，口称为雪武士之耻，强迫自杀。他置自己判断有误和所拟作战计划的拙劣于不顾，却强迫陷入无力抵抗，特别是因重伤以至不省人事而被俘的人自杀，这是常人所不为的。真是残酷的家伙，不是人！”（堀江芳孝著《辻政信》）

这是在诺门坎作战的部队长亲自的证言。下面是当时属于新京宪兵队公主岭分队的宪兵上等兵林次郎的证言：

收容所房间很大，看起来比较舒适，但整天提心吊胆，不知往后会怎么样……大家都是一副惴惴不安的表情。入口处站着两人一组的宪兵，不让说一句私下话。

大约过了半个月之后，关东军在这里组成了以军官为审判长的特设军法会议，主要是私下里把军官交付审判。从上午10时到下午4时左右会议结束。据当场的宪兵说：审判官在审判结束后交给军官手枪，没有说什么就走了。

其后，发出命令，连宪兵也不准靠近军官房间。不久，就听到了开枪的声音。那是自杀。

（三田真弘著《诺门坎的死战》）

眼前浮现出一副多次凄惨、使人背脊发凉的情景。

日苏两军第一次交换俘虏，是在9月27日，送回88人。接着于第二年1940年4月27日，第二次送回116人。那是在满州里车站两边的马兹艾夫斯卡雅车站的广场上。交接的俘虏

从那里抬回来，送进了吉林附近的新京陆军医院。据说医院里没有工作人员，跟空房子一样。

只要是有关俘虏的事，当时就是在宪兵内部，也不准给相关者以外的人说。因此，也许外边人就只能听到流言蜚语了。

下面是有俘虏生活体验的人的证言。提供证言的是当时第71联队第1机枪中队的上等兵中山仁志，他是在负重伤动弹不得的时候，被苏军用担架带走的。后来，在第二次交换俘虏时才送回来。

有个新京陆军医院分院，“我们将在那里接受藤本少将(名铁熊，第6军参谋长)的审查。因为“陛下特别交待，不处罚你们。但要说实话。”接着，就从说明被俘的情况开始，对我们进行审查。

判决为：“无功，严格禁闭20天。但不降级，也不写进军队记录。”其后，在分院禁闭了20天，每天盘腿而坐，朗颂“军人勅谕”。作业什么的，全都不干。可这里是地狱，自杀者很多。军官可能全都自杀了。从原部队来的人，把手枪扔下来就走了。(中略)

死了人，在分院内怎么也得喧闹一阵，这才知道“又有人自杀了”。曹长以下倒是得救了。尽管是军官，既然没有投降，为什么要强迫自杀？看来，陆军太残酷了！

并不是想当俘虏才当了俘虏的，所以应该有个对待的方法。(中略)20天禁闭完了之后，关东军宪兵司令官进行了精神教育，内容为：

“当了俘虏的事要保密，对亲兄弟也不讲。不

准与当过俘虏的人通信，在路上碰见人也不要致意问好。如有违反，就以军机保密法论处。”

（御田重宝著《诺门坎战争》）

尽管引用很长，但其中有不能置若罔闻的内容。另外，出院的士兵俘虏，都被送往在苏蒙边境构筑碉堡的秘密部队。

就这样，俘虏生活的体验者，看守俘虏的宪兵，战场上的部队长等，都从不同角度提供了证言。但因为如此，内容也就不尽一致。比如，自杀有的说用手榴弹，也有的说用手枪。而交给手枪的有审判官，也有从原部队来见面的人。说法都不一样。

不管怎么说，唯有一件共同的事是不变的，那是什么呢？就是自杀者都是关东军有关人员强迫的，也就是说并没有通过陆军刑法，而是巧妙地策划出来的。

勇敢战斗之后当了俘虏的人，要问罪加以迫害，这在陆军刑法的哪一条上也找不到。关东军对俘虏的非人性，显得多么阴险和残忍！

《战阵训》中称：“生不受俘虏之辱”。这是1941年1月8日由陆军大臣东条英机颁布的，在诺门坎事件的当时，并没有这一说法。

那么，以自杀之名进行处决，根据何在？这种超法规的指令，曾在哪里有过？

日俄战争时，对俘虏是宽大的。对俘虏问题的重视，是在第一次上海事变时空闲升少佐的自杀之后。当时倍加赞扬，特别是其部下辻政信中尉，利用讲演会等场合大加宣扬。

接着，在诺门坎事件中，如前所述，只是在内部秘密处

决。这里不能不看到俘虏问题与辻参谋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然而，处决是不是只限于俘虏和第一线部队长呢？令人吃惊的是魔爪伸向了没有任何罪责的下级士官。作家伊藤桂一在《静静的诺门坎》一书的“前言”中写道：

关东军暗中指示下属部队，不要让从诺门坎送还的士官回到国内。因此，第7师团从诺门坎回来的士官们，全都转属到了关东军的各个部队。小野寺（哲也）就转调到了师团的病马厂。1940年秋，在军医部长的关照下，才回到国内。（中略）后来受命去联队区司令部工作，回到了旭川，在那里的的工作是作征兵检查，为这一工作去利尻方面出差时，有个一木支队的编制，原本命令他充当这个编制的一员，但从利尻回来的日程很紧，所以没有去成。（一木支队后来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玉碎了）

其后，又要他加入去阿图岛的山崎部队的编制，但那时因为有征兵检查任务，人在远方，没有赶上出发，才被放过了。（山崎部队后来在阿图岛玉碎）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对知道诺门坎实情的下级士官，关东军一直没有放松监视，一有什么事，就打算把此类人员送往远方的险地。连对获金鵝勋章的有功人员，也要附上这种“处分”。

这种“处分”不附带任何名义。也许是为了拼命掩盖战败的实情，才露出最后一手来的。

第6军司令官荻洲立兵中将威胁性地对额田助理科长说：“有违反军纪的幕僚，最厉害的是辻政信参谋，随便到第一线

去指挥部队，这算什么？要撤他的职！”（額田坦著《陆军省人事局长的回忆》）

另外，小松原师团长也说：“辻政信参谋到师团司令部来，一个劲地要求越境进攻。说师团长如不能独断行事，他就以关东军司令部的名义发出军的命令。这一来，我终于火了，才决定进行越境进攻的。”（泽田茂著《参谋次长泽田茂回忆录》）

这是指哈拉哈河渡河作战。两位中将都指名批评了辻参谋，也许实在忍无可忍！

再把话题回到前年7月去，当时，在参谋本部俄国科主管苏军军备的主任野野山秀美中佐，在张鼓峰事件中被紧急派往前线，他说：

听参谋（第19师团）笹井重夫君说，事件发生不久，辻参谋就从新京飞来，把他带到现场，他就鼓动说：“喂，把那座山拿下来，关东军在必要时会支援你们的！”

第19师团违反上级的意图，擅自进攻张鼓峰，是受辻参谋的唆使才有那股劲的，所以接着不久，驻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大将就命令辻参谋退出管区之外。

我认为辻是个名誉欲和私心很强的人，一有什么事，就立即赶往现场，装作象上级有命令一样，独断专行。专门制造事端。

（土居明夫，传发行会编《一个军人的忧国生涯》）

他是个臭名昭著的参谋，已经在张鼓峰事件中被证实了。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也许对自己的责任有所醒悟，泽田参谋次长在《回忆录》中这么写道：

关于部队长和幕僚的责任区分，植田军司令官有信给我，说全部责任在军司令官，幕僚负不负责，取决于指挥官如何统制幕僚。这是将来军纪上的大问题。幕僚没有责任，应由军司令官植田负全责。

此种态度极好，其所言亦属真实。尽管如此，此次事件出自军司令官的意图，如若根据军司令官的积极指挥，或此理论得以认可，情况反而更为复杂，将不允许全然不追究幕僚的责任，从而将得出下级幕僚应行降职，军司令官和军参谋长应负重大责任的结论。

（重点为引用者所加）

从以上事实来看，植田大将所说的责任感之类的话，只能说毫无意义。不仅如此，军司令官等于自己宣布不过是个傀儡。那么，所谓负“全责”指的是什么呢？

如果只是考虑“编入预备役”，这种“全责”又是多么简单。在战场上，官兵的一举手一投足，都会立即关联到死亡。眼下已经出现了众多的伤亡，还有追究责任致死的部队长。

如果“全责”意味着自裁，也未尝不可，可只是退出现役生存下去，也未免可笑。还有，泽田次长回忆录里加了重点的部分，真是意味深长，充分暗示了幕僚那种独断专行的姿态。

然而，经过反省负起责任来的幕僚却没有一个，都是竭力加以回避，把责任转嫁给他人。强迫部队长和被俘军官自杀，对士官实行监视，都属于这种表现。

这里想说说在诺门坎战场上的一次奇遇。这是在苏蒙军渡河地点的正面、二〇八高地附近发生的事。进入9月后不久，第1师团向那里开进并展开，在第1联队右侧并排布阵的是第3独立守备队第15大队（大队长为坂本弥平太大佐）。

这个大队的中队长为黑崎贞明大尉，碰巧出来指导第6军进行反击的，就是辻政信参谋。辻参谋与黑崎意外相逢在一起。这是在兵马倥偬的第一线的奇遇。为什么有此奇遇？谁也不知道。

这要追溯到4年前的1935年。在士官学校事件中受牵连的村中孝次大尉、矶部浅一一等主计，以“关于肃军的意见书”为由被撤职。这是8月2日，当时在抚顺的满州独立守备步兵第6大队黑崎中尉，对此表示愤慨。村中大尉是作为非同寻常的前辈结合进来的，他是相邻区队的区队长，是接受了革新运动启蒙教育的人。

黑崎中尉眼下也是满州革新军官的核心人物。他认为“如果村中、矶部被免职，那么，元凶辻政信也应免职。”这种愤懑难以自制。不久，水户第2联队的辻大尉出现在满州，混在约10人的行列里。黑崎中尉认为不能错过这一机会。

“制造事端的本人如果恣意横行，那么，革新军官就只有牺牲。等不久这伙人掌握了军队的要害，日本的革新就不好办了。”他越想越不是滋味，终于下决心要与辻互刺而死。

抚顺一流的酒楼“近江亭”的夜晚，歌声笑语，好不热闹。一位青年军官堂堂正正地出现在大门口。他除了佩有军刀之外，手里还握着白鞘短剑，在要求带路的举止中，含有

非同寻常的意味。这青年军官就是燃烧着悲壮意志的黑崎中尉。

正在这时，走廊里又出现了久门有文大尉，他是要上厕所才经过这里的。黑崎很快把他按倒在地。可惜一较力，久门大尉占住了明显的优势。

当时，久门大尉是军务局科员，是辻的好友，这次同行去满州。

“在这里刺死辻，那是根本不起作用的。你如果想到日本的未来，就要比辻活得更好！”

大尉这么教训黑崎。自不待言，这件事很快传到了辻的耳朵里。从此以后，辻参谋和黑崎中尉就卷入了充满敌意的旋涡之中。

没想到两人在诺门坎第一线碰上了。在那一瞬间，双方都感到紧张得透不过气来。辻在先说了话：“黑崎大尉，你干得顶不错嘛，我要求求你哟！”说话时面带笑容，并走过来握手。

“他真是太客气啦，要是平时，也许连鼻子都不会哼哼一下。我一时不知所措，看着我们的士兵，也感到很奇怪。”

战后，黑崎大尉这么谈起了当时的心情。对方是有名的辻少佐，是威风十足的关东军派遣参谋。

“真是个好演员呀！”这种感慨从黑崎大尉心里闪过，与此同时，他想到了“这里是战场，不是报仇的地方。”随即说了声“照办！”表示还礼。

“真是个好演员呀！”这句话岂不是完全说中了辻的本性么。他有旺盛的自卫本能，根据对手不同，会巧妙地摇身一变。战场上的这一出戏，辻高超的演技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逃避战败的责任时，作为演员，他又显露了高超的演技。然而，不管他的武打多么绝妙，演戏终归只能是演戏。

9月到10月，陆军人事有所变动，但关东军方面，只是植田司令官和矶谷参谋长改为预备役。副参谋长以下的所有参谋没有受到任何处分，最多不过是降职而已。

在参谋本部，除了闲院官总长之外，次长中岛铁藏中将、第一部长桥本群中将都成了预备役。可是，掌握帷幄大权的作战科长稻田正纯大佐，却于10月调往参谋本部工作，第二年1940年8月转任满州阿城重炮联队长，作战科的有末次大佐和高月保、荒尾兴功、谷川一男三位中佐，也没有受到任何处分。

了解大本营情况的林三郎大佐说：

赏罚在陆军内部并不是公正的。积极论者犯了错误，人事当局会予以宽容，即使处罚，大都也是敷衍了事。

另一方面，自重论者却往往被当作胆怯者，如果犯了错误，多数要严厉追究责任。这种陆军人事行政，结果是不断助长那种平地掀起波澜的冒险性。

当时在大本营工作的人一致的看法是：在大本营作战科工作的这帮诺门坎事件的责任者，后来成了竭力主张在太平洋开战的人。

（林三郎著《太平洋战争陆战概要史》）

其中出现的“诺门坎事件的责任者”，不用说就是关东军作战科的服部卓四郎主任参谋，还有辻政信参谋。服部和辻这一搭当，主宰着作战科，这是不可掩盖的事实。

在诺门坎事件中负有责任的服部中佐，于1939年4月回

到步兵学校工作，1940年6月又调到教育总监部，当年10月返回参谋本部，就任作战班长之职。1941年7月提升为作战科长，参与太平洋战争开战的 core 班子。

本来要“撤职”的辻少佐，既没有处分，也没有改为预备役，只是于1939年9月调往驻华中汉口的第11军司令部工作。据说其背后有板垣、东条等陆军大人物在撑腰。

板垣在平沼骐一郎内阁倒台时，辞去陆军大臣，1939年9月12日，担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东条任航空总监。

第8章 准备对苏决战

从克里姆林宫派来的朱可夫中将到达外蒙古的达木斯克，是日军第一次作战以失败告终之后的6月5日。中将在那里看到了什么呢？

一切情况说明，这一事件并不是国境纠纷，而是日本不放弃对苏联远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侵略目的，必须进一步预料到近期内日军将有更大规模的行动。

从整个情况来看，结论是：光凭我方第57特别兵团保留在蒙古共和国内的兵力，是不可能阻止日军的冒险行动的，如果日方突然从其他地区或其他方面采取积极行动，那就更难阻止了。

（格·卡·朱可夫著《朱可夫元帅回忆录》）

他究竟是不是一位有预见之明的指挥官？这里先要弄清日军的企图。

首先要指出的是“处理纲要”，这是事件发生前4月25日在兵团长会议上发布的。有一位兵团长当即感到不安。当时在座的第4师团长泽田茂中将，记述了第3军司令官多田骏中将提出的质疑和得到的回答。

多田中将说：“如果按指示行事，也是会产生料想不到的结果，希望能稍许给些考虑的余地。”

对此，植田司令官反复说：“这种担心对你们来说是不必要的。这将由我植田来处理，因此，第一线的

各位不必多虑，希望果断地把入侵者击退！”

关东军司令官的这一训示和由此产生的关东军司令部的气氛，就酿成了诺门坎事件。

（《参谋次长泽田茂回忆录》）

在军司令官这种压制性的答复中，能感觉出某种异常的含义来。是出自充满信心所作的答复？还是有幕僚在鼓动？这是个谜。

反正在参谋部里，第四科的高级参谋片仓中佐的批评是很严厉的。他指责那是在搞乱中央的统制，而且带有挑衅性。辻政信过去是片仓中佐的下属，因此，通晓满州的国内建设。片仓中佐希望辻成为控制作战第一主义的政策通。

当辻从华北派遣军回到关东军时，片仓中佐推荐他到作战科。但事与愿违，现在他成了积极主张对苏开战的急先锋。如果是为了满州和苏蒙边境的宁静，那就应该倾听片仓中佐的批评。可是，在作战科却有不满足于宁静的急进派。他们想伺机挑起国境纠纷，让苏蒙方面大吃一惊。前面提到的“自主确定国界线”，“不管国界如何，务期必胜”，就能看出其企图。

也就是说，使人难办的是他们要挑起国境纠纷，而且冲突一起，就命令以兵力歼灭敌人。如果这样不会引起纠纷，反倒不可思议。因此，与其说是“纠纷处理纲要”，不如说是“纠纷挑起纲要”，也许这样更容易理解。

关东军在发布如此可怕的“处理纲要”的同时，也报告了参谋本部。可大本营对此不但没有作出表示，反而任其自流。这不能不说是参谋本部作战科严重的玩忽职守。既然对“处理纲要”采取了默认的态度，那么纠纷发生之后再干涉关东军的作战，也就没有权威了。

由此看来，朱可夫中将指出的“不是国境纠纷”、“是不放弃侵略的目的”，这两点十分准确地抓住了关东军的企图。

这两点是盾的两面，唯有这个盾才意味着日苏之间的战争。如果酿成日苏战争，那就是日本在进行比当时陷入中日战争更大的冒险。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尽管时机有缓急之别，但因为日本陆军的假想敌国是苏联，所以对苏作战是经常关心的大事。请看当时作战科长稻田纯正大佐的回忆：

从第一年（1939年）之初开始，大本营就根据新的构想不断在考虑满州的军备。在此以前的作战计划是，首先以主力在东部滨海洲寻求决战，接着涉及北方，然后根据后来的情况再向西发展。只是这样一个很有局限性的想法。

为什么不能从开始起就向西作战呢？如果从呼伦贝尔一口气扑向贝加尔湖，去寻求决战，没有自我生存能力的滨海州的苏军就会崩溃。当然，这就要开拓交通网，作为部队实施机械化的绝对条件，而且有必要对军备作划时代的充实。

而且必须把投向中国的力量，一时尽快转向北方。3月的人事变动，从参谋本部把主管编制的寺田大佐、服部中佐和主管作战的岛贯少佐，调往关东军第一科，就是为了把东京所作的研究在现地进行具体化。

（《知性》附件5）

这就把大本营处在中日战争和对苏作战夹缝里焦急不安的样子暴露出来了。

对苏作战新计划的研究，是根据参谋本部作战科的提议，从1938年底开始的，基准定在1942年底完成军备计划，称作“8号作战计划”。作战方针由下述甲乙两个方案组成。

甲案：日本陆军在开战后迅速对乌苏里和黑龙江的苏军同时进行正面进攻作战，将其歼灭，然后再歼灭大兴安岭方面之敌。

乙案：日本陆军在开战的同时，以主力歼灭察哈尔方面的苏军主力。

可是，根据1938~39年的情势，乌苏里江沿岸地区，苏联领地的防御阵地很坚固，几乎没有进攻作战的余地。因此，以海拉尔为起点，从呼伦贝尔平原向贝加尔湖前进的乙案成了新的课题。

关东军方面接受参谋本部的质询，独自进行了研究。因为与这一行动有关联，关东军就叫嚣着要对苏开战。这与“处理纲要”的发布是并行的。

片仓中佐知道后，十分惊讶。如果对苏作战，那就根本谈不上巩固满洲国的根基了。于是，要求立即召开幕僚会议。在军司令官、参谋长、副参谋长的主持下，各个科的高级参谋集中起来，把“以1942年为期，开始对苏作战的议案提到了日程上”。

首先由寺田高级参谋说明了主旨。对此，片仓中佐进行了反驳：

类如决定开战与否的问题，不是前方军司令官可以随便决定的，这是大本营的事，严格地说，属于宪法上的外交大权。

如今中日战争已将近两年，仍然难以解决。对

于加强军备和国力以应付万一，我没有异议，但其中用词很不恰当。关东军的使命在于充实满州国的国力，促进建设是第一位的，同时要担任北方的防卫。

自己制造事端，去刺激苏联，采取这种态度并非得计。对于军参谋长带着这种空洞而草率的方案进京，我表示反对。

从会议的气氛来说，这种发言是充满了勇气的。第二科矶村武亮、第三科矶矢伍郎等几位高级参谋，赞同片仓中佐的主张，但极关紧要的副参谋长矢野少将却默不作声。难得的意见被埋没了。

然而，片仓中佐却遭到了阴险的报复。1939年7月他进京时，板垣对他说：“你将调往华中任联队长。”关东军作战科的策动成功了，中佐落得个被赶出满州的下场，国境宁静论者下台了。

在此之前的5月26日上午，关东军参谋长矶谷偕作战科的寺田、服部两参谋进京。可在诺门坎，原先在哈拉哈左岸被击退的苏蒙军又重新返回来，开始构筑阵地。28日，第23师团麾下的山县支队出动了。就在这个微妙的时候，矶谷参谋长一行出现在东京。他们紧急请求“下午3时起，直接向参谋总长陈述意见”，报告“8号作战计划”的研究结果，并要求实施。

第二天27日，矶谷参谋长向闲院宫总长作了说明，详细情况由寺田和服部两参谋向稻田作战科长作了报告。这就批准了西部正面作战的乙案，并就具体准备进行了研究。在此之前，参谋本部也倾向于乙案，并与陆军省一起作了研究。明确了以下必要事项：

一、在西边要新敷设三条铁路。

二、准备汽车约20万辆。

三、把大量的作战资材储备在呼伦贝尔方面。

然而，从当时的国力来看，要满足这些条件十分困难，这种看法占上风。对关东军在西部正面作战，也解释说没有异议，但地形和补给方面存在问题，如不敷设新的铁路，就没有实际效果。可关东军对这种解释不能同意，始终坚持应该实施乙案。最后参谋长从中调解说：“进一步慎重审议之后，再作指示，这才收场。”

上述“处理纲要”、“要求对苏开战”和“8号作战计划”，全都证明关东军对苏作战的想法多么强烈。这种积极性来自何方？必须看到因为有人带着先入为主的观点，认为“苏联软弱”。

这种先入观是因为留希科夫的情报起了作用。1938年6月，也就是张鼓峰事件之前，苏联大将G·S·留希科夫越过满州国境来日本亡命。根据他的供述：

他经过详细分析得出的主要论点是：在红军中普遍存在不满，在西伯利亚有强有力的反对派。因此，远东的苏联军事机构，在日本的进攻面前将会崩溃。

加以留希科夫清楚西伯利亚和乌克兰红军部队的配置，又透露了正在使用的有关军事密码的情报。这种技术情报非常详细，特别是部署在西伯利亚的红军部队的情况更为详细。

各个师团（留希科夫说有25个师团）的位置、编成、装备都作了详细的说明。

（迪金、斯托利合著《佐尔格追踪》日译本）

日本军部掌握了这一情报十分高兴，在张鼓峰挑衅，在诺门坎进攻，都是因为重视留希科夫的情报。然而两次都以落空告终。是留希科夫的情报没有可靠性吗？

当时阿巴斯通讯社东京分社社长罗伯特·基兰说出了这个期间的消息：

然而，对日本来说，不幸的是这个期间，佐尔格从德国大使馆得到了苏联逃亡者提供的情报。佐尔格有充分的时间把情报送到莫斯科去，使苏联加强兵力，在张鼓峰、继而第二年在诺门坎更有时间击退日本的进攻……

对日本北进论者来说，根本没有把前一年在张鼓峰受到的打击作为良药，这一次似乎又试图去夺取红军的战略据点。

然而，苏联方面反而没有忘记前一年的教训，在那10个月期间，更多地加强了诺门坎地区的兵力。在留希科夫逃亡之后，佐尔格送去的警告，对苏方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罗伯特·基兰著《佐尔格时代》日本译）

仅此就可看出，留希科夫的情报并非扯谎，毋宁说佐尔格的报告给苏联带来了唤起非同寻常的警惕性的效果。

佐尔格的谍报活动，以诺门坎事件为契机，积极开展起来，1939年6月上旬，把有关日本军事力量的下述情报送到了莫斯科。

中国的战争长期化，给整个日本带来了紧张，它不能在没有德国的支援下与苏联作战，日本的军事力量有必要从根本上重新编组和重整军备。

据德国军用车辆运输部的情报，这种重新编组

预定需要一年半到两年时间。这就是说，日本要作好大规模战争的准备，最快也要在1941年。

(C·哥廖科夫、B·巴尼佐夫斯基合著《改变佐尔格世界的人》日译本)

这一观测的准确性，从上面说到的“8号作战计划”的研究，就能轻易看出来。而重要的部分在于佐尔格的结论，即：尽管日本在哈拉哈河地区进攻，但没有与苏联进行大规模的准备。

这从当时大本营的动向也能得到证实。不管第一线的关东军如何反击，只要仔细观察其根本，就能看出确实没有偏离方针。这个情报出自何处，看看下述记载也就明白了。

1939年6月初，尾崎秀实担任南满铁调查部顾问，在东京分社工作，这对从南满获取情报来说，是一个十分恰当的地位。从而他再次（上次是张鼓峰事件）有可能把政府不希望与苏联正式进行战争的确实证据，提供给佐尔格。

(迪金、斯托利舍著《佐尔格追踪》日译本)

5月28日，山县支队在诺门坎开火后，就陷入了苦战之中。苏蒙军以坦克和炮兵发起的进攻，声势浩大。以步兵为主的日军主力和从侧面进攻的骑兵联队全线崩溃了。31日，只好离开战场。

然而，事态不容许有一天迟疑。6月19日，一份说明苏蒙军的兵力在增强、还进行轰炸的电报，送到了关东军司令部，参谋部立即召开作战会议。会上，辻参谋的积极论抑制了寺田作战科长的自重论。就这样，作战计划拟订出来了，可矶谷参谋长看后，迟疑难定，不得不重新考虑。既然要动员1个师团的兵力，就有必要取得大本营的同意。

可是，服部中佐等一伙参谋认为，如果事前提出请求，势必遭到拒绝。他们表示反对，说如果等出差的矢野副参谋长回来，就会失去战机。参谋长只好勉强同意。接着，提请植田司令官裁决。辻参谋谈到了当时的情况：

老将军的额头上出现了很深的皱纹，他根据地图默默地听着作战参谋业已立案的计划。过去，司令官总是边听说明边点头的，可今天不知为何，他带着深沉的表情不作表示。

我对他的心事作了种种猜测。作完了说明，当用手帕擦去流下的汗时，老将军终于心事重重地慢慢开了口。他同意关东军为遂行自己的任务，再给诺门坎附近的敌人一击。但是诺门坎是小松原师团长负责的正面，在那个防区内发生的事交由其他师团长去解决，就是对小松原不信任。如果自己是小松原，是会切腹自杀的！他老泪纵横，作出了裁决。

（辻政信著《诺门坎》）

从这里可以看出军司令官那种被作战参谋逼着干的悲痛心情——屈服于下克上行为的表情，也显示了对小松原师团长的同情。他这样做，似乎是想保住自己的权威。

可是，如果从作战的常理来说，本不该起用小松原率领的第23师团，因为这个师团前一年夏天刚刚编成，训练和装备都不充分。相比之下，最初准备动用精锐的第7师团的方案，要恰当得多。

这里有一个证实这一消息的有趣证言。当时，日驻苏使馆武官土居明夫大佐，6月上旬从莫斯科出发前往新京，据说，他通过车窗看到苏联正向东运兵，包括重炮80门在内，

约有两个机械化师。

到达新京是6月中旬，他向植田司令官以下人员谈了自己的见闻，以下是遗稿中的一节：

这回苏军在坚定的决心下，以优良装备的师团，要一鼓作气决一雌雄，与单纯的国境纠纷有所不同。关东军以主力与之对抗的同时，根据情况，有必要从日本增兵。如果没有这种指望，那么，结论就只有引兵后退，求得妥协。

后来，作战主任“T参谋”把我叫到另一个房间，带着威胁的口气说：“象今天这样的软弱话，将危及土居君的生命，青年军官甚至会愤怒地杀掉你。我们无论如何要把苏联的坦克抓到新京来，举行庆祝胜利的阅兵式。”

在去东京的飞机上，正好与参谋本部第四部长富永恭次少将同座，我问：“植田司令官同意出动部队在诺门坎作战吗？”富永说：“尽管心里好象不同意，既然幕僚们已经立案，来要求批准，只好同意了。”我认为这种下克上的风气可是不得了

……

（《一个军人的忧国生涯》）

文中的“T参谋”，不用说，就是辻政信参谋。不管是对土居大佐威胁性的言行，还是富永少将的回答，都能轻易看出，积极主动的惩罚论，出自辻参谋。

两岸作战以悲惨的失败告终。接着，面对苏蒙军的8月攻势，同样是惨不忍睹。连续打败仗，原因何在？是指挥的低劣，斗志的低下，还是作战的失败。

当时，作为第5师团炮兵联队长派往诺门坎的堀毛一磨

大佐说：

从战略方面来看，在保证战线兵团使用足够的钢铁这一点上，苏军在诺门坎是很成功的。这意味着在国内已经建立了从铁矿石到生铁，进而到大炮、炮弹以至坦克的国防工业。而且完全组织好了向战场提供补给的运输线。

经过外蒙平原秘密进行补给和运输，从组织奇袭性的强大火力攻击和坦克的机动这一点上，必须坦率地承认其战略战术的优越性。

（《知性》附件5）

如果说苏蒙军在战略战术上具有优越性，那么，被动挨打的就是关东军的战略战术。而这里提到的“经过外蒙平原秘密进行补给和运输”，又是关东军的大失算。

陆军兵站线最长限度为200~250公里，这是当时日军的常识。关东军的情况是到诺门坎战场，从海拉尔起为180公里，从哈伦阿尔查起为80公里。苏军从补给站波尔扎向战场运输却有700公里，这是很不容易的。在两岸作战中，关东军认为，苏蒙军要使用1个师团以上的兵力，那是不可能的。可辻参谋说，实际上却动用了3个师团。

希望这一仗一举歼灭越境的外蒙军，实际上未能达到目的。必须重新调整态势，以备敌人再犯。

其原因在于错误地判断了敌情。判断敌人的兵力与我大致相等，实际大我一倍，特别是以数量自豪的坦克和威力很大的重炮，十分遗憾，都出乎意料。

（辻政信著《诺门坎》）

连自负不落人后的辻参谋都不得不说这种话。这种判断

上的美梦，贯穿着整个诺门坎作战。孙子兵法（谋攻篇）云：

“不知彼知己，每战必殆。”

在诺门坎事件中，关东军到底想得到什么呢？朱可夫中将回答加里宁（最高部长会议主席）的提问时说：

直接目的在于占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哈拉哈河对岸（右岸），进而在哈拉哈河岸建设要塞化的境界。

日本方面以东支铁路以西到我方察哈尔国境为战略目标，计划建设第二条铁路。为的是对此进行掩护。

（格·卡·朱可夫著《朱可夫元帅回忆录》）

这和前面看到的“8号作战计划”乙案是一脉相通的，也是情报活动没法推测的。

这使人联想到，8月27、28日，稻田作战科长收到的关东军寺田作战科长写来的亲启信，信中说：

“因为苏军前来进攻，反过来利用这一机会，集中4个师团给予回击。其间，10月份严寒，不能进行大规模作战，冬季作充分准备，来年春天全军动员，决心对苏一战！”

所谓“对苏一战”，那是重大的决心。面对连续败北，给作战参谋留下的路，也许只有越过局部战争和有限战争的框框，冒险一决胜负。尽管如此，这么大的决心决不是寺田科长一个人的主张。

是不是掌握参谋部主导权的辻参谋的打算呢？但经过协商就向外透露，那是难以想象的。那莫非是影子似的军司令官的决心？可真正的军司令官植田大将等，已经被摆在很远的位子上在进行观望。

关东军象是要渡过鲁比肯^①。大本营十分吃惊，无论如何要决心阻止新的作战行动，中岛参谋次长两次出现在新京进行指导。

即使如此，关东军仍然顽强拒绝停战。这是为什么？这不单是面子问题，这种执拗没有一定的战略目标是不可想象的。正如前面朱可夫中将回答的那样。

最后再引一段辻参谋的述怀：

诺门坎的悲剧就这样闭幕了。回想起来，是以微弱的力量错误地辅佐了统帅，挫伤了名将的武德，数千官兵的尸体暴露在空旷的沙漠里。想到这些，真是肝肠寸断。

悔恨的眼泪使我不惜捐弃残生，从心里誓死向在天下的英灵谢罪。看来，这是一场接受挑战的战争，是受束缚的战争。

（辻政信著《诺门坎》）

就前一段文章而言，且不说其用心，倒是看出了想说什么。可后一段加了重点的部分，却是表达暧昧，意思不清，所谓“誓死谢罪”，这种说法真是妙不可言，真心是想说“誓死复仇”。

他还感叹说：“接受挑战……受束缚。”“接受挑战”，也许是指来自苏联，而“受束缚”，则是指来自参谋本部的牵制和停止作战行动的命令。也就是在强辩，说坏人是别人，不是自己。这一来，前一段文章中的自责之意，也就一扫而光了。

注① 鲁比肯河又称菲乌米奇诺河，在意大利北部，公元前49年1月10日，恺撒率部过河与庞培·马格努斯决战。故以此比喻下定重大决心。

这并不是没有证明，《诺门坎》一书的卷末是这样结尾的：“感到战争已经失败的人是失败了。”态度为之一变。这也许是说，就辻参谋而言，并不认为在诺门坎失败了。

如果大本营不加制止，他还打算再打一两仗，以决胜负。然而，这将带来什么样的结果，那是可想而知的。

为了满足自己的功名欲和权力欲，官兵的牺牲，国力的消耗，都可以置之不顾。进而满州国的命运、日本的命运也消失在远方——这种看法是不是想过头了呢？

第9章 纠纷不断的东亚联盟

1939年9月15日辻政信去汉口第11军司令部工作，军司令官是冈村宁次中将，参谋长是青木重成少将。了不得的辻参谋此时也成了秃尾巴公鸡，狼狈不堪了。对这天的心情，《亚细亚同感》一书，有如下的描述：

司令部迎接战败者的气氛是预料到了的。军司令官身穿浴衣，手里拿着《讲谈俱乐部》，听取了那个声名狼藉的少佐的报告（中略）。

如果是以前以参谋本部的人员或陆军省科员的身份来访，这位将军也许会身着带勋章的军服，热情地给予接待的。可眼下却把这个满身伤痕的少佐看成了一种麻烦，根本看不出有寄予稍许同情和好感的表示。

眼下与悬挂着参谋饰带、威风凛凛的时代完全不同，在这里只不过是司令部工作的一名少佐罢了。然而，就在到任的当天，他露出了奔赴战场的一手，很快把对司令官的不满掩饰过去。对当时的情景，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政务科的堀场一雄中佐的秘密记录里，有如下记载：

辻中佐（原文如此）承担着诸门坎的责任，不愿意在第11军司令部工作。不时担任青木参谋长交给的整顿军风纪的工作。辻中佐发挥其本领，深夜把汽车停在街头，检查茶馆酒楼，为了使汉口不感到有威胁。

安藤参谋来求我收下辻中佐，尽管总军参谋部有难色，但我深知应该爱护好汉。板垣总参谋长在山西作战时，就知道辻参谋过去作战的情况。于是，我向总参谋长建议，收下辻中佐，让他在思想部门工作。

（堀场一雄著《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

所谓“为了使汉口不感到威胁”，似乎是在说大话。可连汽车司机都听他的话，一起去查看军队干部夜间的不执行行为。为此，甚至有被逼得自杀的高级军官。第11军要求辻少佐做这种事，肯定是万不得已的。

然而，堀场中佐的好意斡旋有了结果，1940年2月10日，发出了要辻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工作”的任命。因为在汉口工作半年太失意了，所以这次调动显得特别高兴。

由于一心只想离开，第二天11日就到南京总司令部上任，在第四科工作。第四科负责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思想工作。又在敬仰的板垣中将的手下，对辻来说，这是内心的愿望。这次调动，内情就象前面说的那样，完全是侥幸成功。

如果从讽刺的角度来看，所谓“为了使汉口不感到威胁”，也许是谋求工作调动面进行的佯动作战。

堀场中佐和辻政信是名古屋幼年学校的学生。他比辻高两年，曾在日本驻中国和苏联使馆工作，是视野开阔，具有学究风度的军人。辻得到了这位好前辈的照顾。堀场写道：“让辻君住在我宿舍里，连夜一边安慰一边说心里话，特别告诉他在大局上应有限度，不该越过哈拉哈河一线，使他感慨无量。”从这里可以看出堀场中佐忠愚的程度。

不久，围绕与重庆进行和平谈判的活动开始了。与此同时，以汪兆铭为首的新中华民国政府也于3月30日成立。4月

1日，阿部信行大将作为特命全权大使，与新政府进行条约谈判。

随着这一时机，以松平、小山贵族院和参议院两议长为首的各界代表约30人，作为国民使节，于4月下旬从国内前来，4月26日，在南京国民政府大礼堂出席庆祝还都典礼，并致祝词。

在此之前，4月23日晚，在总司令部招待了各界代表，由西尾总司令官致欢迎词。就在这个招待会上，给辻少佐一个机会，让他以“实战所感”为题作讲演。在司令部四楼礼堂，总司令官等首脑全都出席，这是辻引以自豪的。当然，这也是因为有堀场中佐的关照。

辻说：“我流着眼泪谈到了士兵作战的真正姿态。死去的几十万英灵，都附在我身上，让我这么做讲演。”给他的时间是20分钟，据说讲了两个钟头，由此可见其绕舌的盛势。

这次讲演，内容归纳成了以“告派遣军将士”为题的26页46开的小册子。其重要部分为：

东亚新秩序，也就是东亚的重建，如上所述，在于以日满支三国的善邻结合为核心，向整个东亚地区发展（中略）；希望东亚各国民族各有安住之所，近邻和睦，相互协力，发挥各自的天分，以求兴隆，从而重新开创东洋的道义文化（中略）。东亚新秩序中的国家相互关系，最终在于希望向结成联盟的方向发展。

……

站在遂行圣战第一线的派遣军将士，如在行为上有愧于天地之事，则为冒犯圣心，反而给中国

人留下永久的仇恨。违背人心就会失去圣战的意义。

奸淫掳掠，无故接受中国人的饯别宴请，乘人力车不给钱，借口讨伐，烧毁没有敌意的民房，杀伤良民，夺其财物，如有此类事情，无论怎样宣传安抚，不但不能受到中国的信赖，反而只有遭到怨恨。即使有超群的武功，也难保全圣战的果实。

就这样把处理事变的观念和将士应有的思想准备，以板垣总参谋长的名义予以公布。对此，辻说：

板垣总参谋长命令我起草，赶紧连夜写好，第二天作了研究，最后得到军司令官批准，决定于天长节一起分发。（中略）

动员了南京和上海的全部印刷厂和新闻社，在一周之内印了100万份，正好赶上天长节，用飞机在第一线分发。

当时，中国派遣军第二科高级参谋冈田芳政少佐（后为大佐）对我的提问作了下述答复：

今井武夫大佐兼任第二、第四科长，辻不与科长商量，自己拿到板垣总参谋长那里去。对科长来说，这是以上压下。既然总参谋长盖了章，即使感到愤慨也没有办法。章是横盖着的，我也照样横着盖。

上面写着“已经军司令官批准”。其实，所谓西尾寿造大将的批准之类的话，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小册子是以板垣的名义发布的，为什么不用司令官的名义呢？真是笑话！

因为毫无章法，科长也生气了，连声说“放

下，放下！”辻连特意给予照顾的堀场中佐说的话都不听。对这位因诺门坎事件，而处身在禁锢之中，连正式参谋也不是的人，真叫人惊讶不已！

还写着“一周之内印了100万份”，这也是扯谎。我看最多不过5万份。这是自我陶醉的宣传，所以不会有实际效果。

说什么司令官批准，什么印了100万份，尽管这是胡写，但不明事实的读者却被感动了。然而，辻竟不顾还有几个活着的证人，居然如此公开扯谎，真不知他是什么样的神经！

对过去的士官学校事件，嘴里说的和实际情况互相矛盾，使人感到厌恶。只能说他那种不同寻常的人性，不时又在这里表露出来。

然而，从小册子的部分内容就能看出，那是概念式的说教，没有什么新东西。唯一使人注意的是其中强调了东亚联盟运动。那么，所谓东亚联盟运动是什么呢？

从满州国建国以来，作为板垣和石原的智囊的宫崎正义这么说：

东亚联盟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东亚民族的觉醒，完成东亚的统一。在王道文化的基础上，建设有世界普遍性的大东洋社会，以显示东洋的真正面目。而当前的重要课题，是从妨碍东亚统一的重压下解放东亚。

联盟的范围，是在以我等的实力，能够阻止英美苏法的政治压力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在现有状态下，包括日本、满州和最近有待参加的中国这

三个国家。

（宫崎正义著《东亚联盟论》）

这与前面看到的“告派遣军将士”的小册子，与其说内容异曲同工，还不如说这就是小册子的原型。结成联盟的根本条件在于“国防的统一，经济的一体化，政治的独立。”对东亚联盟最热心的，不用说是板垣总参谋长。可在参谋部，辻参谋却率先上窜下跳。在南京有大民会，在汉口有保持辛亥革命传统的共和党，这些团体过去发起的兴亚建国运动，很快服从了东亚联盟运动。

另外，在广东有特务机关长矢崎勘十少将的指导，以广东省教育厅长林汝珩为核心，联盟运动开展得十分活跃。只是华北还存在问题。

石原莞尔系统的新闻界人士田村真作，与新民会中央指导部长缪斌携起手来，在北京成立了中国东亚联盟协会。华文机关杂志《东亚联盟》于民国29年（1940年）6月10日创刊。创刊号为葡版^①126页，载有缪斌的特约稿《新民精神的三民主义》、张君衡的《中国民族运动与东亚联盟》等文章。

然而，华北方面军主张华北有特殊性，不采取行动。辻参谋秉承板垣总参谋长的旨意，前去说服。他说：

“尽管司令官多田中将内心有所共鸣，但无法控制其幕僚，参谋长笠原幸雄中将以下人员对总军的方针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好不容易使新民会默认了东亚联盟运动才算了事。”

（辻政信著《亚细亚同感》）

注① 为杂志的开本，纵23公分，横15公分。

在此期间，接替阿部内阁的米田内阁也以短命告终。1940年7月22日，第二次近卫内阁登台，陆军大臣也由田俊六大将交给了东条英机中将。新陆相登台后，那副走向中日战争的姿态，特别引人注目。

东条对派遣军直接与重庆政府进行和平工作（称之为桐工作）感到不快。进面对负责“桐工作”思想工作的东亚联盟运动也持否定态度。“桐工作”和东亚联盟运动都通过板垣总参谋长来推进，这当然存在问题。

石原与板垣从满州事变以来，就是意气相投的搭档。而与东条的关系，却是水火不容。这就影响到东条对板垣的看法。辻参谋也说：

“为使当地的运动与日本相协调，我进京去，说服以军务科为主的参谋本部的有关人员。但他们只是对主张表示同意，而对具体的人却有所迟疑。这是因为必须明白，既然石原是运动的始祖，板垣是推动力，对此产生共鸣的人，势必得罪东条陆相。”

辻政信明知中央的情势如此，却仍然敢于不息地推动这一运动。

1939年11月，在日本国内率先创立了“东亚联盟协会”，核心人物是石原莞尔系统的宫崎正义、和田劲、木村武雄等，还发行了机关杂志《东亚联盟》。然而，板垣中将辞去陆相去南京后，国内的运动也就只剩下微温了。

另一方面，汪兆铭主席寄与东亚联盟的期待是很真诚的。特别对日华立场平等、废除内部指导，抱有极大的热情。因为他想通过东亚联盟论来消除令人不快的南京傀儡政权论。

民国28年（1939年）10月10日，在中山陵举行纪念辛亥

革命双十节庆祝会，汪主席演说的着眼点就是东亚联盟运动。从而在第二年2月1日，在国民党党部成立了以汪兆铭为会长的“东亚联盟中国总会”。

辻参谋对这种活动十分敏感，为策划与满州国发表共同宣言，带着板垣总参谋长的书信飞往新京，得到了梅津关东军司令官的认可。辻参谋说，这一企图是想通过中国与满州的共同宣言，先手战胜东条陆相。

张景惠国务总理以协和会长的名义，作好了向国内外宣布成立东亚联盟应有的准备。如果由中满两国的元首向日本呼吁，日本政府势必表示某种祝贺。正在高兴地等着那一天时，梅津军司令官于宣布的前一天打来电报：“根据东京方面的意向，想对照一下有关东亚联盟的宣言。”这是因为中满联合宣言的计划，事先由关东军透露给了东京，东条十分生气，军务局急派主管人员去威胁梅津将军。这时的军司令官已经是这般模样了。

（辻政信著《亚细亚同感》）

说东亚联盟是共产主义，这是东条陆相在内阁会议上表示反对的理由。另外，兴亚院政务部长铃木贞一中将也认为：“这是有晦冥皇国主权之虞的国家联盟理论”，同样表示反对。结果在日本国内没有得到承认。但中国与满州以默许形式暂时达成妥协。

1940年8月，辻参谋只是因为定期晋级才升为中佐。作为一名中佐，即使要发泄私愤，也未免太大胆了。在诺门坎事件中摆布军司令官和大本营的旧习，在这里又活灵活现了。

尽管东亚联盟的思想得到满州国、中国，甚至日本的提

倡，但接受这种思想的人也未必一致。色彩的不同，表露得十分明显。汪兆铭标榜“大亚洲主义即东亚联盟”。而所谓大亚洲主义，显然是指孙文的大亚细亚主义和三民主义。

依石原莞尔看来，“民族协和即是东亚联盟”，企图组成满州国五族协和的色彩很浓。进而，板垣征四郎竟主张“八紘一宇即是东亚联盟”。所谓“八紘一宇”，就是指皇道，这意味着想以日本天皇为中心。

因为三者可以作出三种解释，所以其接受者也就各有不同的看法。正因为如此，尽管想用前言不接后语的共同宣言，登上横跨东亚的政治舞台，但并非易事。如果冒然强行，势必造成首脑间的相互倾轧。当时，堀场中佐是怎么看这一幕的呢？

在中国，东亚联盟运动的兴起，由于板垣总参谋长的存在和辻中佐的努力，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关于日满支相互呼应，一齐开展东亚联盟运动，其中有辻中佐的策划。东条陆相注视着这一运动，怀疑为政治运动，并保持高度的警惕。

板垣总参谋长与石原将军同是东亚联盟的发起人。对联盟抱有热情。辻中佐又从中推动。我担心如果事态恶化，会引起板垣与东条的正面冲突，进而酿成大本营与总参谋长的全面对立，有碍处理中日战争。

通过对辻中佐的控制，缓解板垣总参谋长的情绪，使大本营从对中国当地的干涉中撤出来，才没有给中国方面带来不良影响。这次东亚联盟问题的纠纷，大都是辻中佐的积极策动造成的。

（堀场一雄著《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

在第四科，堀场中佐亲切地谈到了辻中佐的言行。他是处在支持东亚联盟运动的立场上持有这种看法的。

当年12月25日，辻中佐突然被任命为台湾军研究部（又称台湾第82部队）的部员，调往台北。这是冷不防的人事变动，肯定是因为得罪了东条陆相，才被发配的。

“从各地网罗来的官兵、下级士官、勤杂人员、打字员总共才30个人。从当官以来，已有18年，在这种小部队工作还是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正如辻政信嘲笑自己那样，这当然是一种降职。台湾军参谋长上村干男少将兼任部队长，从台湾步兵第1联队派来担任部员的林义秀大佐是真正的负责人。

这时，日美关系已经更加险恶了。12月6日，大本营指示准备担任南方作战的兵团，实施热带作战和登陆作战的训练。台湾军研究部也在收集热带作战的基本资料，部队人数虽然不少，但直属参谋本部作战科的指导。何况在诺门坎事件时就与辻气息相投的服部卓四郎中佐，于1940年10月再次在参谋本部作战科（作战班长）活跃起来。这种情势充分看出武断派正在抬头。这就很难想象辻中佐的新工作岗位会与此无关。

根据参谋本部的统一指挥，辻政信时而参加以台湾为基地举行登陆作战的参谋演习，时而以研究部为主体，由宇品的运输部协助，在南中国海举行部队演习。当然研究部的主要任务是收集热带地区部队的编组、装备和作战等资料，上报大本营。

后来有一本很厚的手册，分发给派往南方的官兵，题为《读此必胜》，其资料和解说就是汇集了研究部长达半年的

成果。用的是大本营陆军部的名义，卷头是这么写的：

编写这本手册的目的，在于向全体作战官兵贯彻南方作战的目的和特点。其重点如下：

1. 集武力战、思想战和经济战的内容于一体；
2. 省略了作战要领，只编入热带作战的特点；
3. 从《热带作战参考》中摘出了士兵直接需要注意的事项；
4. 在既热又狭小的船上，短时间内就可轻松读完；
5. 文字十分浅易，士兵均可充分理解。

小标题分为18条，如“南方作战地区是什么地方”、“在船上干什么”、“登陆作战”、“热带的行军”、“在热带地区宿营”、“为了汽车兵”、“爱护武器”等等。说明和注意事项写得无微不至。

这些主要是由辻中佐编写的，据说印了40万册。与上次在南京写的《告派遣军将士》一起，在推行战争中起了指南作用。实际上就是辻中佐的作用。

第10章 主张开战的急先锋

世界情势难以推测，苏德终于开战了，那是1941年6月22日。而辻中佐收到“任参谋部部员”的电报任命是在两天之后的24日。对那个意味深长的命令，辻本人也这么说：

我被东条中将训斥得那么厉害，为什么还要叫到东京去呢？也许不是对南就是对北要进行战争准备吧。

由于在关东军作了几年对苏作战准备的研究，又有诺门坎的实际体验，在北方有事时就有用处。还有，虽说只有半年，但热衷于专心研究南方，这在国军向南运动时，会起到领路的作用。

（辻政信著《新加坡》）

辻政信在参谋本部作战科（兵站班长）任职，是7月14日。这时，服部中佐已经坐到了科长的交椅上。参谋本部的中枢作战科，跟往日的关东军作战科一样，又由服部和辻这一搭档把持了。

服部也好，辻也好，从因诺门坎事件降职以来，不到两年，很快又活跃起来。所谓“即使受处分，大多也是有名无实”，指的就是这回事。这就是说，只要是积极论者，那就不必对行动作出反省，甚至在所犯的过失上变本加利，反复恶性循环，也是不足为奇的。

那么，为什么这种不讲道理的人事安排会通得过呢？

当时，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长是田中新—少将，下属的作

战科长土居明夫大佐（后为中将）被突然调出，7月1日，担任了关东军的副参谋长。这当然不是定期的人事更动。接任其职的是作战班长服部卓四郎中佐。因为是重要的工作岗位，所以对这种更迭有种种臆测。

土居中将是1976年5月10日死的，后来发现了他临终前写下的笔记：

柴田芳三庶务科长提醒我说：有人阴谋把我赶出去。我于1941年3、4月间命令高濑启次（少佐，作战科参谋）提出作为作战科对苏德开战的意见，还命令栲比正夫（中佐，兵站班长）作出通过日满一体经济支援作战的计划，但都没有完成。

我认为也许是服部在反对我。根据科内的气氛，我也切身感到有人在排斥自己。在此大事之秋，在田中部长返回满州后，我向部长提出：“不是我走就是服部走。”田中部长留下了对直属前出部队有影响力的服部，把我赶了出来。

一度挽留我，但我躲在自己家里不出勤。我走后，服部立即补充了辻，形成了清一色的南方作战派，正研究从中国派遣军到台湾军的南方作战计划。从而决定了日本的方向。

（土居明夫著《一个军人的忧国生涯》）

服部班长为什么厌恶土居科长呢？土居还作了更明确的回忆，录在对儿子谈话的磁带里。

我任作战科长时，服部来说，想把辻政信招到作战科来。我说，“绝对不行。你和辻搞到一起，又会干象诺门坎那样的事。不行！”

然而，服部等人却在活动，要把我赶出去。服

部和辻气息相通，不但不承担诺门坎事件的责任，反而要把指出其责任的我赶走。我自己提出到第一线去，于是到了牡丹江。这一来，服部立即招来辻，两人组成搭档，研究南方作战。

与我们这些在外国的人不同，他们在参谋本部、陆军省、中国派遣军、关东军都扎下了根，彼此气息相通，制造出一种整体气氛。我没法冲破这堵墙。

(同上)

这就是说，土居科长被赶出来，是服部为了把辻拉进来而做的工作。而作战部长田中少将与服部同是仙台地方幼年学校毕业，是前辈，又都是武断派，从使用方便来说，部长选用服部是可以理解。

就这样内定更换土居科长之后，很快就给辻中佐发出了任命电报。这就可以看出，服部和辻搭档的复活，是进行了非同寻常的工作的。

随着苏德开战，于7月2日举行了御前会议，其重要性在于强化侵入南方的态势，并明确了不惜与英美一战的决心。另一方面也在暗中准备对苏使用武力。

结果，7月7日，准备对苏作战动员85万人的奏章，得到了天皇的批准。7月23日，大本营向第25军和中国方面舰队发出了进驻越南南部的命令。决定日本命运的旋涡确实在南北两方激烈转动起来。而跳进这个旋涡之中的就是辻中佐。

辻以参谋本部作战科长兵站班长之职而重新活跃起来。他一改手法，成了南进论者。关东军时代那种强硬的对苏决战论调，象破鞋似的给扔掉了。

也许是在诺门坎体验到苏军的强大吧，知道苏

联决不是轻易可以打败的。即使希特勒指挥巧妙，要胜利也许需要4、5年。

正当在诺门坎进行战争的时候，希特勒背叛了日本，缔结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如今又冷不防撕毁了条约，一点国际信义也没有。日本赌国运与苏联作战，有什么必要考虑希特勒呢？即使战胜了，夺取了贝加尔湖以东地区，这对亚洲和日本来说，又有多大好处呢？

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统治着亚洲10亿民众的是英国。其症结就是新加坡。消除这个症结，就可解放亚洲被压迫的民众，也会给解决中日战争带来好的影响。

（辻政信著《新加坡》）

辻政信把以往的想法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顽固地主张南进论。尽管其背景有国际情势的变化，从辻的情况来说，令人强烈感到他是在变节改调，随时随地改变主张。

那么，服部科长的看法如何呢？

对于北方，如果德军的作战有所进展，苏联处于摇摆状态，那就开始北进。这是在等待所谓“柿熟状态”。

对于南方，应寻求时机，果断采取攻势。这就是“良机南进，柿熟北攻”的方针。

（高山信武著《服部卓四郎和辻政信》）

这种主张从辻中佐的下述辩解中轻易就能看出来。

科长从开阔的角度在考虑问题。科长和我们都在诺门坎事件中熟知苏军的实力。在目前的情况下，关东军开始北攻，要在今年内达到目的，毕竟

是难以想象的。

我们花了几个月时间就南方作战作了专门研究，南方地区资源无穷，如果掌握了这一地区，日本就可确立不败的态势，英美并不足畏。

（同上）

科长的本意在于比起“柿熟北攻”来，不如“优先南进”。服部和辻的搭档构成的南进论，驾驭了作战科。部长田中上了当，最后在参谋本部也通过了。

1941年2月，通过新任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开始进行的日美谈判，根本没有着落。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的前一天，国务卿赫尔才把美国的正式提案交给了野村大使。内容为对武力南进、三国条约和中国驻军三条重要议案，都极不赞成。

这引起了日本的反感，随即于7月25日，断然使用武力，进驻印度支那南部。美国当天即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资产，并于8月1日发令全面禁止石油输出。

这一举动使近卫首相焦急不安，作为最后手段，想到了与美国大总统举行首脑会谈。8月4日，他向东条陆相、及川海相表明了这一想法。海军方面当天表示赞成，可陆军方面只用文书消极地作了同意的答复。

然而，美国对首脑会谈的劲头不大。9月6日，近卫首相甚至亲自向美驻日大使格尔表达了意愿，并于当天召开了重大的御前会议，讨论“帝国国策遂行纲要”。

纲要开头写道：“帝国为了贯彻自存自卫，下决心不惜对美（英、荷）一战，大致以10月下旬为期，作好战争准备。”

结果首脑会谈告吹，第三次近卫内阁垮台。10月18日，

东条内阁出现了。在此期间，持南进论的辻中佐有什么活动呢？这里有一份惊人资料，可看出其强硬论到了何种程度。

1974年5月25日，对评论家大森实的采访，右翼分子和军队的顾问儿玉誉士夫作了如下回答：

这是某一天的事，辻政信突然来了，说：“喂！有件大事求你。”我说：“什么事？”“近卫要去会晤罗斯福，情报不会有错，其条件是如果只是从中国撤军，还可以理解。可说是连满州也要撤兵。真是干蠢事！据说是根据这个条件到美国去的。”

过了一会儿，我说：“那好吧。”“那么，你接受啦。”“接受。”当谈到接受什么时，说如果近卫走，就到横须贺去。

他说把六乡的铁桥，连桥给我掀了。那是必经之路。跟你说吧，我是采取通电方法来干的。只要把它往上一插（做了个插上插销的手势）就行了。这是跟我的朋友副机关长吉田商量的了。

吉田彦太郎这个人已经死了。

“喂，这么干究竟要几个人呀？”“如果没有14、5个人，怕是干不了。”他说起话来吱吱唔唔的，既不是无用之人，也不象右翼成员，而是老实人。是在上海的小组成员。

于是，我说：“好吧！”这一来辻君就匆匆地把炸弹，最有效的定期炸弹拿来了。是从哪里拿来的呢？对啦，是去参谋本部拿的，在八科的房间里。

是八科，就那么拿来了。据说那是威力很大的东西，拿来了4颗，1颗正好有那只箱子（柑桔箱

子)的一半那么大。

他说：“这东西要注意使用。”随即把整个用法都说了一遍。问明之后，我就留下了。就在这么作准备的期间，近卫总也不只走。

结果，我只好就那么放着。在赤坂有辻嘉六的事务所，就藏在那里二楼的壁框里，锁得很严实。后来，你说怎么着，1945年4月24日赤坂遭空袭的时候被炸飞啦！

(大森实著《毁坏的齿轮》)

近卫把日美首脑会谈的构想告诉陆相和海相，是在8月4日。因此用定时炸弹暗杀近卫的阴谋，可能定在8月到9月实施。

这一行动实际上是具有影响力的，这从战后的“海军特别座谈会”也可得到证实。这里引用一下当时及川古志郎海相和丰田贞次郎外相的发言。

及川 近卫说不成功就不回来。

丰田 近卫公与我商谈时说，有吉田（善吾）和土肥原（贤二）两大将，还有两个部长随行，不管会谈进展顺利与否，都决心告别日本。如果乘船之前两个人被干掉了，那就完蛋了。如果去了，就准备一定完成，撤军等等都到那边再定，然后打算呈请圣裁。也反复考虑过如果回来，肯定要遭暗杀。所以连乘船都不放心。

及川 乘船的事决定由海军承担。

(新名文夫编《海军战争讨论会议记录》)

尽管如此，那种为了贯彻自己的想法而不择手段的恶劣行为，只能令人吃惊。那么在这种言行里，又有什么背景关

系呢？

9月15日，田中指出政府对首脑会谈的态度：“情势未必如统帅考虑的那样。希望从国防的见地出发，说明日美妥协后日本会变得不能容忍，以促使政府反省。”

当时，作战科长服部卓四郎也催促军务科说：“作为陆相，眼下应竭力做到每天单独入内参见，上奏（对美）开战的必要性。”事实上，田中和服部眼下已成了参谋本部主战论的核心人物。杉山也把在御前会议上向天皇提出的保证，只限在当时，在让部下贯彻时，反而不断对他们施加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明知御前会议议案另页第一注“依据中日间新规定的驻军”的说法，美国是不会完全接受的，这毋宁说是破坏日美谈判的难题，成为今后陆军主战论者的唯一“黑色官印”和“天皇旗”。

（朝日新闻社编《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七卷）

田中和服部的活动相当频繁。这不仅与他们一脉相通，甚至可以说是其原动力。

其后，于1941年11月1日在皇宫召开的历史性“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上，杉山参谋总长、冢田参谋次长齐唱强硬论调，令人印象犹新。杉山说：

“主张放弃调整外交，为正式进行作战作准备。也就是决心开战，把11月下旬到12月初的日期定在12月上旬。外交应以使战争易于实施为目的。”

（保科善四郎著《大东亚战争秘史》）

列席这次会议的海军省军备局长保科善四郎少将，对当

时情况作了如下描述：

当时的国内空气是，以舆论界为首，支持陆军的强硬态度。海军则总是慢慢吞吞，不表示明确的态度。指责的声浪很高。我们也承受着来自局内外近乎威胁的压力。

在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上，贺屋藏相、东乡外相这些人，竭力希望回避战争，他们陈述了前面提到的意见，甚至保留作出重大决定。可是，最终在陆军强硬的推动下被排斥了。

（同上）

太平洋战争的主角应该是海军，可实际上陆军成了推动力。海军大臣嶋田繁太郎大将也这么对保科说：

作为海军，并不想打日美战争，可是，到了这个阶段，海军如果反对，国内肯定要发生内乱。那么一来，就会鸡飞蛋打了。如果能打两年，其间就有达成协议的办法，因此，为了避免发生陆海军反目的最坏事态，才不得不同意的。

（同上）

另外，与嶋田海相并列的永野军令部总长的意向，也与此同出一辙。当时的军令部第一部第一科科长富冈定俊大佐，在1968年2月对海上自卫队干部学校学生作讲演时说：

战后，我对永野军令部总长说，总长是为了留下正确的历史才不得不决定开战的。我问他真正的理由何在？永野回答说：

“事情已经被强拉到了那一步，如果不开战而屈服，就意味着日本要发生内乱。陆军会搞政变，海军里也有勇敢者。总的说，是为了自存自卫才不

得已开战的。那时如果陆海军互相打起来，陆军也许会胜。当时国民也有一种不负责任的勇猛。陆海军互相打起来，酿成了战争，那就真的会给历史留下一场可耻的战争。还是要一致开战。为了自存自卫，我同意了。”

我对决定屈服美国，放弃满州的事态作过猜测，我获得了陆军要搞政变，把天皇拥立在满州的计划。

（史料调查会编《太平洋战争和富冈定俊》）

这是多么可怕的内情。可这么一来，海军就没法对外了。而且不能忽视服部和辻这一搭档盘踞在陆军主战派的中枢。

对于这种事的辻政信，还有如下十分恰当的指责。指责者是停战时的陆军少将闲院纯仁（原闲院宫春仁王）。

要举出例子来，心里有些不安。可如果大着胆子说话，那就要指出与我同期的俊才辻政信。自不待言，所谓辻参谋，那就是以勇猛驰名的现参议院议员辻政信。

他从大尉的时候起，就已经是在一定程度上拽着整个陆军跑的杰出人物。有一次，我对他说：

“你所谓的圣心，不是陛下的圣心，而是辻的圣心。”他就是带着辻的圣心一直在推动着陆军。

他决不是那种胆大妄为的不忠之臣。但自我意识过剩，使他违反真心，产生出与真意相反的结果。实际上他并没有发觉这一点。在陆军的俊才中，这种人为数不少，这对陆军、对国家来说，都是很不幸的。

（闲院纯仁著《日本史上的秘录》）

第11章 马来亚作战之 光和阴暗面

太平洋战争中高奏凯歌的大事，是陆军的马来亚作战和海军进攻珍珠港。初战的胜利都有值得认真检查和要吸取的教训。

从那以后，虽然不断趁势扩大了战果，但也只是胜负场面的展开。在这个意义上，马来亚作战的胜利，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攻克马来亚的第25军，一班阵容是，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将，参谋长铃木宗作中将，副参谋长真奈木敬信少将，高级参谋里有池谷半二郎大佐，作战主任参谋辻政信中佐，情报主任参谋杉田一次中佐。

前面提到辻中佐曾在“台湾军研究部”呆过。那是台湾军司令部里新设的研究部队。林义秀大佐（台湾步兵第一联队长）被调来当了负责人。下属有24名军官，主要进行热带地区运输的研究。

用半年的时间研究对英美作战，并向大本营提出研究成果后，辻中佐得以重用，被调往参谋本部。其他军官全都配属在驻中南半岛的军队里，使南进作战逐步具体化。在辻的南进论中，就存在“台湾研究部”环境上的影响，这是不可忽视的。

这也是他被任命为作战主任参谋的原因之一。辻自己也大肆吹嘘说：“在陆军里，到最紧要的地方去的人，是要严

选的。”可是，只要关系到迁，其任命就必然存在问题。

有人认为，如果不进行南进作战，这位辻参谋就只能在“台湾军研究部”，说不定已经被革职了，因为不管是诺门坎事件中的越轨行动也好，在汉口和南京的非法行为也好，都使陆军内部大蹙眉头。

正因为如此，人事局长富永恭次少将也很头痛，特意请来铃木参谋长，央求说：“我想使用一下试试，就这一次，如果出了问题，一定处理！”这才得到同意的。就是说，这是附有条件的任命。

攻克马来亚和新加坡的作战是由陆海军协同进行的，胜利主要在于对方败在闪击战上。换句话说，是以奇袭和突进为作战的根本。

山下奉文当年夏天访问了德国，德国元帅赫尔曼·格林说：“要攻下新加坡，用五个师的兵力，也许要花一年半的时间。”这种说法不能认为夸大其词。

面对紧张的世界情势，英国于1938年在半岛北岸建成了巨大的海军基地，总共投入巨资61300万英镑，是一个堪称“东方直布罗陀”的坚固要塞。

然而，从马来半岛东北海岸的宋卡、北大年、哥打巴鲁三个地点登陆的三个师，以破竹之势南下，只用了70天就攻陷了新加坡的坚固阵地。这次堪称世纪作战的行动，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不仅作战令人吃惊，也意味着殖民帝国英国在亚洲的统治降下了帷幕。

“那天夜里，古老的殖民帝国的动脉被切开了——长达几个世纪的统治和法律开始喷出血来。这道伤口也许是根本无法堵塞的。”

这是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利萨的话。

与此相反，迎来开心日子的第25军司令官山下中将和他的幕僚们，其中包括作战主任参谋辻政信中佐，其得意扬扬之情，是可以想像的。辻在战后总结的回忆录《新加坡》一书中，就有所流露。

自不待言，马来亚和新加坡的作战是根据参谋本部的计划，并得到海军的协助，才引向成功的。并不象他在书中自我吹嘘的那样，把胜利简单地归之于某个作战主任个人的演出。何况从付出了3500人的贵重性命来看，也不是轻松的胜利。英军的失败，毋宁说原因不在于殖民军在战斗意志上没法与日军抗衡。当然，在前线驰骋的辻的成绩，谁也仿效不了，这也是事实。

在马来亚的快速进攻中，有一件事使辻不能有所犹豫，而且使他十分愤慨。对于怒涛般不断向南挺进的第5师团的部队来说，马来半岛中部坚固的坎帕尔阵地的抵抗是非同寻常的。

经常与这支部队同行并进行指导的，就是军参谋辻政信。尖兵中队长为之增强了斗志，继续勇敢向前，可是，在前面构筑了阵地的英军的炮击一个劲地在加强。后来才知道，30多门排炮在一齐开火。

对这种抵抗束手无策的尖兵中队长，自然要找辻参谋，可不见踪影了。原来勇敢暴躁的辻参谋也不知所措，早撤到后方去了。

撤往后方的辻参谋，去第5师团司令部征求松井太久郎师团长和幕僚们的意见。他们认为应该把在西海岸的舟艇机动队渡边联队（由步兵第11联队长渡边纲彦大佐指挥）调回陆地作战，补充师团主力兵力的不足，以对付面前的敌人。

辻参谋自己对坎帕尔的排炮攻击感到害怕，可是，军司令部发来了既定计划不容变更的命令。这一来，不仅意见不同，而且使他在师团长和幕僚面前丢尽了脸面。

怒从心起的辻参谋，又驱车去设在后方太平的军司令部，到达时已是深夜两点了。全体幕僚立即聚集在参谋长室，听取辻参谋的意见。

然而，在座的幕僚中没有一个人支持辻参谋的意见。他们不同意改变从海上强行机动深入敌人后方的计划。辻难以忍受，竟提出希望免去作战主任的职务。

最后，由山下军司令官裁定，计划不容改变。据说，憋气的辻政信，其后三天没有工作。而使辻十分恼火的坎帕尔阵地，在幕僚会议的第二天1月2日，就被攻陷了。

“从这件小事也可以看出，从最初起就坚持己见，这在同僚和上级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反作用。”

辻参谋象负了伤的狼一样，如此作出了反省，可是……

“辻中佐从第一线回来陈述己见，据说引起了种种议论。此人仍然刚愎自用，只是略有小才，是那种稍受人爱的小人，不足以成国家之大器。使用上应予以注意。”

山下军司令官在1月3日的日记里是这么写的。可以说他确实比人多了一只眼睛。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凄惨地陷落了。那天傍晚，在布基迪马的福特汽车组装工厂一间狭小房子里，举行了日英两军主将的会见。那种戏剧性也许是少有的。

山下在他的日记里这么写道：

“我的部队是3万人，与对方的比率是1：3。我知道，如果长期在新加坡作战，我方将会失败。之所以要求对方立

即投降，原因就在于此。我担心的是如果英军发觉我方数量的劣势和物资的匮乏，就会把我们拖进悲惨的苦战之中。”

要对方立即投降，那是因为正如山下所说的，处在成功还是失败的边沿上，需要虚张声势。对此，他还写道：

“我的译员英语很差。当然，他不知道我的担心。而且他又不太懂得军语。急于知道结论的我，越来越焦急不安。我对翻译说，答应还是不答应，只要给我问清这一点。”

这里所说的翻译，是从同盟通讯社派来的报导班的菱刈隆文。虽说他是在伦敦学的英语，但对这种场合使用的军语却不在行。山下很生气，大声叫道：

“你的翻译我根本听不懂。只要给我问清答应还是不答应。”

在旁边的真奈木少将当即命令：“撤掉菱刈，让杉田中佐参谋代替。”这才使翻译上了轨道。杉田参谋因研究军事常驻美国，英语说得很流利。翻译更换后，很快就交涉妥了。

“翻译只是大声把这话对英军司令官反复作了说明。结果事情就这么很快解决了。帕希巴尔同意我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

这也可以说是通过蹩脚的翻译侥幸取得的成功。

英军投降后，新加坡的治安维持采取了什么方针呢？辻中佐说：

胜利了要防止骄傲，这是我军在占领地实行政策的第一步。由第5师团选出少数警备部队，在河村旅团长的指挥下，负责维持市内治安，以严肃军纪，保护良民。

警备队以外的人，即使是军官，也不准任意进

入新加坡市内。

（辻政信著《新加坡》）

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

占领后的第五天，2月19日，以大日本军司令官的名义在街上重要的地方贴出布告：“昭南岛（占领的第二天新加坡改名昭南岛）居住的华侨，18岁以上到50岁的男子，应于2月21日中午以前到下述地点集合。”

集结地点指定了市内的五个场所。还附加写明违反者严惩。就这样，20多万男子被赶到了集体审查的地方。

新加坡的屠杀就是这样发生的。可战后审判时，提的数字是6千人。对此，华侨方面认为是4万人。

不是把人排在海岸上用机枪扫射，就是用舢板带到海里去枪杀，残暴到了极点。那么，发出这一命令的是谁呢？当时担任昭南警备司令部的代办，消息灵通的活证人篠崎怎么说：

“据事后所闻，在司令部里也有持反对意见的。但作战参谋压制住了。”

“河村将军作为陆军的秀才，战前历任陆军省军务长，后来是第9旅团长，在马来亚作战中，是率先攻下吉坡和新加坡的。因此，任命他作为昭南警备司令官，负责领军治安工作。”

“他对整肃华侨感到气不顺，去25军司令部问明是何图。参谋长铃木中将说，既然得到司令官的认可，那就只好行。就这样被说服了。司令部派出作战参谋林以督战的形式时前去，书写了整肃实施要领，向第2野战宪兵队作了传达。”

“称作整肃作战的立案人，是辻政信作战主任参谋。他在停战后从曼谷失踪了，潜行三千里，去向不明。作战参谋

因飞机失事死亡。

这都是从《新加坡占领秘录》中摘记出来的。对照起，作战主任参谋辻政信中佐的嘴脸，就完全显现出来了。或许有另一种道理，认为尽管实际是按辻的提案实施的，但是山下军司令官准许的，立案人可以不负责。

当然，整肃命令是把整肃的规模和实施方案交给了当事人。但具体如何执行，是给辻参谋留有許多余地的。

事实上，在昭南市长大达茂雄就冲上海岸的华侨尸体和英军的倾诉发出通知之前，军司令部首脑几乎不知处刑的实际情况。当时，军的副参谋长兼军政部长真奈木中将愤慨地

“这就象是犄角杀牛一样，这一来反而搞乱了军纪和治山下是说了要检举共产党，但没有想到杀了那么多人。全是辻在独断独行，也许是在现场指示宪兵队长干的。”

对于辻的残暴性，真奈木中将说了这么一件事。

这是司令部进入新山前的事。早晨刚睁开眼睛，看到近的橡胶林里绑着两个英军俘虏，两只手反绑在后面。不用，俘虏就那么一整夜受尽了蚊虫叮咬的折磨。

让卫兵去问明情况，据说是英军的旅团长和副官。副官东京麹町上过日本小学，日本话说得很好。还查明是根据参谋的命令绑起来的。

给他俩吃了早饭，两人高兴得流出了眼泪。这时，辻参谋经过那里。

“副参谋长，你如果打了败仗，也会是这样的。”他说了句令人不愉快的话。

“少废话。”副参谋长回敬了一句。

正因为这么残忍，才干出杀害华侨的事来。

第12章 杀害华侨

面对沿新加坡海岸北上的尼古拉斯路，在绿草坪上有一座帕克兰纪念碑。隔着道路，北边是莱佛士饭店，西南可窥圣安德鲁斯大教堂位于市中心的一角。在帕克兰的中央，一座高耸入云的白塔，特别引人注目。

塔高120公尺，即使与市内的高层建筑相比，也算得在数的高度。塔尖由4根水泥柱组成，上面涂的白色油漆放不太强烈的光线。4根柱子中央，有一个身子高的石台，上面放着青铜壶，是仿照中国周朝时代的名器作的，里面收着遗骨。

巨大的基石用的是壮丽的大理石，正面横刻着“日本领时代死难人民纪念碑”几个金字。

在华侨小学和中学的社会教科书里，记载着屠杀华侨事件的历史经过，特别是中学的教科书，写着牺牲者为4万人，还谈到了强制华侨捐款5000万美元的事。称作“死难人民”的华侨，他们是怎么被杀害的呢？英军投降后的第五天，1942年2月19日，新加坡的街角上，贴出了以“大日本军司令官”的名义发出的布告。其主旨如下：

“在昭南岛居住的华侨，18岁以上到50岁的男子，于2月21日中午以前，到下述地点集合。”还写着“违者应予严惩”。集合地点有如下五处：

- 一、从阿拉伯街到布沙街广场；
- 二、利巴巴里路南端广场；

三、卡兰路和格兰路交叉口上的橡胶园；

四、丹戎潘加警察所附近；

以上为市内，下面为郊外。

五、帕亚雷巴路和章宜路的交叉点。

白纸黑字写了报纸整个一版那么大。虽说是贴在墙上，但一般市民却看不懂日文，加以光凭少数几张告示，也很难让大家都知道。乘坐卡车的日本兵摇着铃，用麦克风来回呼叫，或者直接把人抓来。

然而，新加坡是印度总督管理的英国海外殖民地，由于被日军占领，于2月16日改名为“昭南岛”。人口成倍增加，达到100多万，因为从马来半岛拥进来许多难民。其中华侨80万，四分之一的壮年男子就是告示所指的对象。另外，根据贴出告示前一天发布的军内审问实施命令，也把妇女小孩包括在内，由于执行的错误，宪兵甚至用枪把妇女小孩都逼走了。

当时在现场的中国人知识分子陈基翁，对那种凄惨的情景作了如下描述：

士兵的枪上了刺刀，挨门挨户搜，不是敲门，就是踢开门冲进去，命令中国人无论男女小孩，全都到外面去。这种搜查中国人的工作，从中午一直搞到黄昏。

民众按衣冠不整的粗鲁士兵的指令，从这条街转到那条街，因为各条街上的军官任意发出各自的命令。民众从各个地方汇集到交叉点上，那里立即就陷入混乱之中。这是因为那帮子日本军官拿不定主意，究竟把民众集中到哪里为好。

有的地区由士兵负责，命令民众携带3天到4天

的粮食和衣服。有的地区根本就没有下达这种命令。他们说话语尾很高，既难懂又令人讨厌。哪个地区的秩序都很乱。吓得发抖的群众、妇女、小孩，都在火一样的阳光烤晒下，脸色通红，浑身是汗，腹中饥饿，嗓子冒烟。可是，还要他们时而往东时而往西，刚说蹲下，又说站起来，不是命令走就是命令跑。根本不知是何道理。

一个军官刚发出一道命令，又一个军官随后赶来，发出不同的命令。群众就这样乱成了堆，象野狗牛马一样，被赶得团团转。

最后，军官们决定的集合地点是一个大空地。可是，根本没有考虑到人起码需要水、树荫和休息。有的地区，男女小孩几万人，完全跟家畜一样，被集中在一起。

（陈基翁著《为武士道哭泣》）

在那里，实际是模仿纳粹逮捕犹太人的做法。这说明人的权威和生命的可贵得不到承认，他们不谋而合地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集中在各个地区的华侨达到了多大的数目，难以准确掌握。如果一个地区以2万人计算，五个地区就有10万人。宪兵用林立的刺刀包围了这批数目庞大的人。辅助宪兵有两个大队，共1200人，是从广岛第5师团抽出来的。本来是步兵，特用来协助正规宪兵。

指导这批宪兵的是200名正规宪兵。仅就人数对比而言，使用上显然就不合理。其实际情况是什么，这里不妨再引用陈基翁的讲述：

在情况好的兵营里，倒是不会过于踢打、虐待，

也不强迫看不必要的柔道。那里的官兵并不那么凶残，容许在酒店喝上一杯，早晨可以刷牙、戴帽子，阳光厉害的时候可以打伞，过于疲劳时可以坐在或蹲在地上。

妇女和小孩在阳光照射太强时，可以在树荫和建筑物旁边，夜里也可以在与集结营地相邻的人家睡觉，还可以抽烟，吃东西。

然而在情况不好的兵营里，那就不堪忍受了。谈到这里的空气，真是充满了报复和侮辱，连地上都不让坐——让他们保持坐不象坐、蹲不象蹲的姿势，如果发牢骚，说腿肚子麻木了，或者说血流不畅、四肢僵硬了，就会立即用粗木棒劈头盖脸打来。

有的兵营，命令人们趴在地上爬。另外，说喉咙干了，把舌头伸出来要水喝的人，被叫出来之后，立即让他们练柔道，以示惩罚。

审查持续了五天，在那里被打上标记的人，用卡车相继运到戈顿海岸和逢哥尔海角进行枪杀。他们被蒙着眼睛坐在沙滩上挖出的大坑前面，从背后用机枪一排排扫倒下去。

或者让他们排成一列向岸边走去，就那么盲目乱扫。那里是尸首成堆、血流成河的地狱。不仅在海岸边，在小山上的椰林里，也反复进行扫射。

此外，布拉干马齐岛（现改名圣多沙岛）的印度籍灯塔看守人，在法庭上作证说：“从灯塔向海上望去，只见拖来了好几只舢板，上面装着许多手被反绑着的人，开到岛西南海面时，坐在拖船上的

日本兵把机枪对准舢板上的人射击。尸体被扔进附近的海上，海面上眼看着染红了，人们被反绑着手，没法游水，被海浪淹没了。真是悲惨残忍到了极点！”

（篠崎护著《新加坡占领秘录》）

我曾听实际担当指挥这一工作的某宪兵谈到自己的感慨：

“几艘机帆船连在一起，把人带到布拉干马齐岛海面去，名义上是上岛去。可他们本能地显得很害怕。所以用船运送，费了很大的劲。用的是没有敌意的印尼人驾船。

“一艘船上装载近百名华侨，尽管用绳子串连起来，但我们人数太少，寡不敌众。虽然我们有武器，但也有一齐扑过来的危险，真是焦急不安！”

“来到离岸很远的洋面上，眼看就要送他们去西天，当即命令他们跳海，他们知道跳进海里必死无疑，可如果不跳，也要挨刺刀，同样是死，无可奈何，只好跳进海里，串在一起沉了下去。

“我们那时没有用机枪扫射，所以海水倒是没有变色。尽管十分残酷，但这是命令，不得不这么做。”

这种牺牲者究竟有多少呢？

在审判战犯时，检察官认为是6000人，对此，华侨方面提出为4万人。相差很大。从这里也能看出这不是确定的数字。审判者和被审判者都没有掌握准确的数据。因为在打败仗的同时，资料根据军的命令烧毁了。

成了被告的河村警备司令官和大石宪兵队长等人说，处置数为5000人左右。另外，西村近卫师团长说处置了1000人。这样，正好是6000人。检察官的看法就是从这里得出来

的。

可是，这个数字是有问题的。近卫师团担任岛东部的警备，不可能独自处置那么多华侨。处置是在戈顿海岸和逢哥尔海角进行的，这里有时也属近卫师团警戒，所以师团长有可能勇敢地负起这一责任。

说数字不准确，不光是因为这一点，在军参谋的严厉鞭策下，各个部队作出的浮夸报告，比实际数字多得多。横田队的分队长大西宪兵少佐（事件发生当时为中尉）在受审时这么说：

“为了鼓励整肃，军参谋亲自来到审问所，在其鼓动下，各个分队作出的报告，都比实际数夸大了许多。这一事实，我在受审判时全都说出来了。战后才知道，宪兵队以外的部队也这么干过。据我推测，在昭南警备司令部管辖下，整肃的华侨大致有1000人左右，至多为2000人。所谓6000人，是把近卫师团和第5师团整肃的人加在一起，而且只能认为是夸大的数字。”

“尽管有两个大队的步兵担任辅助宪兵，由于有伤亡，缺员很多，没有人手来处置那么多人。华侨方面所说的4万人，据知道当时情况的人说，数字也许是虚构的。

身临其境的少佐说至少有2000人，战犯审判时成了6000人，都是千位数的。

作为日军大屠杀事件加以报导的，还有南京事件和菲律宾事件。关于南京事件，据东京审判的记录为：

“这一犯罪暴行的发生，是从1937年12月13日占领这个城市开始，一直到1938年2月初为止，在6、7周时间内，几千妇女被强奸，十多万人被杀害，无数财产被抢劫烧毁。”

关于以马尼拉为中心的菲律宾屠杀事件，菲律宾检察官代表洛佩斯有所陈述。据他说，牺牲者有在菲律宾的美军23,039人，菲军27,258人，美国市民595人，菲律宾市民91,184人，共计达到142,076人。这是整个战争期间，除了直接战斗死亡以外的牺牲人数。

两个事件都牺牲了十万人以上，是在太平洋战争中应该特别书写的大屠杀。仅从数字来看，新加坡的华侨大屠杀是没法相比的。

而且那是武装的士兵，也可以说是暴徒。不仅是士兵，连士官和军官都参加了。尽管如此，那终归不是根据命令而采取的部队行动。在这个意义上，南京事件和菲律宾事件的情况是相同的。

然而，新加坡的华侨大屠杀，与上述事件的意义大不相同，那是根据军司令官的命令进行的扫荡作战。

为了接受昭南警备司令官的任命，河村三郎少将前往设在莱佛士大学（现为新加坡大学）的军司令部报到，那是2月18日早晨。他把当时的情景记述在从樟宜监狱写给留守处的信里。

山下将军以严肃的态度对我说：“军里有其他新作战任务，必须迅速调用更多的兵力。可是，敌性华侨潜伏在各个地方，企图妨碍我方的作战。如不先发制人，彻底根除，作为南方基地的马来亚，治安就没有希望。警备司令官应该加快实施市内扫荡作战，把这些敌性华侨清洗掉，以解除我军作战的后顾之忧。具体做法要听从军参谋长的指示。”

接着，接受了铃木参谋长就具体实施方案所作的详细指示。指示包括扫荡的日期，敌性华侨的范

围，集合地点，审查要领，处置方法等，特别是经审查之后断定为有敌性的华侨，应立即严惩。

我对立即严惩一语的确大为吃惊。铃木参谋长把我的质问遮掩过去，解释说：“这件事也许有种种意见和议论，可是军司令官这么决定了，本质上就是扫荡作战，希望按命令执行。”

（河村三郎著《走上十三级台阶》）

所谓立即严惩，就是当即处以死刑的意思，可能有十多万华侨青壮年成了扫荡作战的对象。审问时间只有几天，这该如何审查呢？在炮烟弹雨已经过去的当时，这种不提交军法会议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封建时代那种“格杀勿论”。

进行扫荡作战的第一个原因在于兵力调动。因为要把第18师团调往缅甸，近卫师团派往苏门答腊，第5师团派往南方，新加坡的兵力就薄弱了。为了填补守备上的空白，才采取这种治安对策的。

可是，师团调动，从马来亚作战之初起就决定了，并不是一时作出的计划。因此，突然大规模审查华侨，令人感到很不自然。

第二个原因是华侨怀有敌意。马来亚人、印度人、欧亚混血人都不管，只把华侨当作眼中钉。这与中日战争以来的排日、抗日运动逐年高涨形成了对照。这种敌意毫无道理，只能说是一种偏见。

他们的祖国不是日本，而是以日本为敌的中国。这是问题的要害。要削弱华侨的敌意，就必须采取特殊的军事和政治手段。这么看来，所谓扫荡作战，不外是傲慢自持采取的恐怖政策。使恐怖政策进一步显示出威力的，就是例行的“严惩”。这种例行做法可以追溯到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关东

军参谋长发出的通牒里就这么写道：

“逮捕的不法分子应立即严惩。严惩就是使用兵器。”

从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措施，可解释越来越扩大，到了中日战争，就无限制地普遍化了。接着进入了太平洋战争，即使在新占领地，也实行日军特有的“严惩”。

新加坡华侨大屠杀，是借扫荡作战之名，进行毒辣的“严惩”的典型，也可以说是集“严惩”之大成。

在宪兵队的上茵队里呆过的田金勇大尉（当时是曹长）记下的《歌日志》中有如下一节。这是开始审问的前天夜里发生的事。

“起来！”“宪兵不在吗？”我被这可怕的大声叫喊吵醒了。睡在旁边的仓持曹长好象也醒了。从天花板上吊下来的蚊帐，一端在抖动，在没有灯盖的电灯光下，一个军官拔出军刀，大步横过宽阔的房间，向这边走来。

定睛一看，原来是朝枝参谋。参谋纓带从肩上垂在胸前，晃动着放出金光，看得十分清楚。这是晚上10点。怎么回事呢？我赶紧从床上滑到了地板上。

“不服从军里方针的家伙，即使是宪兵也要给宰了！”

他大声骂着靠过来。可不知这是要干什么。他看了看站在床前的我，突然改变方向，皮鞋发出嘎嘎的响声，快步从另一个门向外走去。

连宪兵都要加以威胁，足见恐怖政策毫无章法。

田金宪兵大尉在日记中谈到他的感想：

我有时因为有事，晚上就睡在宪兵本部。二楼宽阔的房间里，有十几个士官在床上休息。皮鞋声和骂声从楼梯上传来，我惊醒了，连忙穿上衣服裤子，站在蚊帐外边。光我一个人。

声音到了离我6、7米处，才知道是朝枝参谋。与此同时，对方也知道是我，也许感到意外。如果把吊蚊帐的绳子割断一根，即使宪兵，也会吓得缩成一团的，我估计他是来威胁人的，所以抢先分腿站好在那里。

在朝鲜咸兴的第74联队，我是新兵，他是少尉教官，一副傲慢不逊的态度。我们两人在分开8年之后，又在想不到的地方碰上了。

不知他中途想到了什么，没有说话，转身朝来的方向往回走，是提着明晃晃的军刀走的。说起来，不拔军刀能处理事情，才算武士道的本事。

这也说明恐怖政策是多么残暴，我想他们心里是清楚的。不问明犯罪事实，就说要杀害没有抵抗力的人民，这种事即使有命令，也不是轻易办得到的。第一线的宪兵比司令官和幕僚更切身体会到这种难处和痛苦。他们对残暴的恐怖政策有意见，那是理所当然的！

一不顺心，动不动就用明晃晃的军刀相威胁，这叫干什么！不客气地说，就算是参谋，也该知道我们身上同样流着武士道的血。

那么不可一世的日军，仍然不得不迎来战败的一天。座落在新加坡繁华街上的维多利亚纪念堂，如今仍跟过去一

样，可在1947年3月10日到4月2日，就在这里审判战犯。

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大将（当时为中将）、参谋长铃木宗作中将（当时为少将）两人都不在了。山下作为菲律宾的战犯，如绞架上的露水一样消失了，铃木作为第35军司令官死在莱特岛。

一度慷慨激昂的参谋、作战主任辻政信大佐（当时为中佐）连踪影都没有了。他从曼谷很快逃到了中国大陆。同是作战参谋的朝枝繁春中佐（当时为少佐）从关东军带到苏联扣押，情报参谋林忠彦少佐于1942年因飞机失事死亡。

这里怪有意思的是，副参谋长真奈木敬信中将（当时为少将）、高级参谋池谷半二郎少将（当时为大佐）、情报主任杉田一次大佐（当时为中佐）和作战主任下属的国武辉人中佐（当时为少佐）等司令部的幕僚，都没有被起诉。

是没有参与屠杀计划，还是因为持反对态度呢？即使如此，只要有军司令官的命令，形式上也应该追究责任。

不仅如此，辅助宪兵和其指挥官、宪兵士官等都不追究，尽管在苏联以外地区的人，都分别受到了审查。

如此看来，与清洗规模之大和内容之深相比，法庭都显得十分空洞。只有西林近卫师团、河村警备司令官在被告席上露面，还有大石宪兵队长等5名宪兵军官并列站在一起。

英军当初要求麦克阿瑟司令官引渡山下、铃木、辻和朝枝等人。出面交涉的是英军司令部的情报参谋瓦尔特卫校。这位卫校曾经作为从马来亚派驻印度的三军参谋（当时为少校），在山下与帕希巴尔会见时担任过日语翻译。

山下尝到了投降的耻辱之后，作为俘虏，被迫参加泰缅铁路的建设。因此，在检举日本战犯时，成了报复之鬼。在马尼拉法庭上，我趁休息时间访问了山下大将。给他留了这

么几句话：

“马尼拉法庭如果宣布你无罪，英军打算立刻把你接受过来，在新加坡召开军法会议时，把你处死。请作好这种思想准备。完了。”

在新加坡审判时，判处死刑的只有河村警备司令官和大石宪兵队长两人。如果山下活着站在这个法庭上，将无需瓦尔特的证词就会判处死刑，这是肯定无疑的。

在第一线指挥审问华侨的宪兵军官，除西村外，其余5人（包括分开审判的水野铨治少佐）都免除死刑，从过去的事例来看，这不能说是料想不到的审判（后来西村师团长宣判为死刑，是在马努斯岛由澳军有关的审判员判处的）。

总共处决了6000人，却只有两人判死刑。华侨的遗属和有关团体对此不服，为要求所有被起诉的人都判处死刑，向中国总领事馆示威，因为太出乎意料了。

那么，为什么会引出这种结果来呢？

所谓新加坡三大战犯审判案，就是“昭南宪兵队拷问事件”、“泰緬铁路虐待俘虏事件”，再加上“华侨大屠杀事件”。前两大事件很快就判处完了，只留下了后者。可以说是最后的审判。

“在英军之间，最近已经对审判战犯感到厌烦了。心里燃烧起对日军的愤怒和报复是起初的时候，随着岁月的流逝，热度也就冷下来了。检举、追究，事实上都变得缓和了。”

通晓当地消息的昭南市厚生科长笹崎护这么说。

其次是因为被杀害的不是白人，而是亚洲人，这也是不可忽视的情况。如果牺牲者中有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也许不至于这样。这本是我暗中的推测，经向有关人员打听后，才

肯定了这一点。

所谓“昭南宪兵队拷问事件”，那是因为有特务嫌疑而拘捕了英国和澳大利亚人，其中15人被宪兵队拷打致死。为此，宪兵队有21人被起诉，角田春三中佐以下8人判处死刑。

此外，对泰缅铁路虐待俘虏事件也进行了起诉，石田英熊中将等多人判处死刑。从这些例子来看，可以说对“华侨大屠杀事件”的处理，是作了相当多的手脚的。

对审判的实际情况，日本未作详细报导，长长的岁月就那么过去了。

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发布的命令，起草人就是辻政信参谋，许多有关的人都指出了这一点。战后某前辈对辻政信说：

“你连蒋介石母亲的法事都做过，怎么会在新加坡杀害几千个华侨呢？”

因为对方是兄长一样的前辈，所以辻十分不安，辩解说：

“的确没有什么可说。实际上是朝枝参谋起草的，我没有仔细看内容，就那么马马虎虎决定了。”

关于这里提到名字的朝枝参谋，前面已经说到过，是在“台湾研究部”和辻一起工作的朋友，具有豪杰式的作风，这一点与辻相似。因此，即使起草人是朝枝，也不能认为辻的意见没有起作用。辻和朝枝的关系是那样的不可分离，毋宁说受辻的命令起草才是正理。不管怎么说，这只是形式上的问题，辻在前面所作的辩解，说穿了，只能认为是一种掩饰。这里不妨举出事实来予以反驳。

当时负责新加坡河东岸的大西分队审问所，就清清楚楚地出现了辻参谋，是左翼队长横田昌隆宪兵中佐领来的。分队长大西觉中尉报告说：到目前为止已经检举了嫌疑犯70人。这时，辻怒容满面地骂道：“怎么这么磨磨蹭蹭，不能再提高一下效率吗。我想把新加坡的人口减少一半。就按这个想法，再加把劲！”

据说是这么胡骂了一顿之后才走的。这是西村少佐（当时为中尉）自己的证言。

说什么“想把人口减少一半”，这是多么傲慢的言词，说明企图要进行大屠杀。这不是开玩笑，而是辻的真心，以下事实可以证明：

右翼队长城朝龙宪兵中佐（当时为少佐）是反对清洗华侨的急先锋，可是表面上又没法违抗命令。他在笔记《血路历程》中这么写道：

“好吧，既然如此，我就变成狮子身上的小虫，从内部来推翻它！”我这样下定决心。而且照这么去做。

首先做的一件事是：集中在新加坡停车场前面广场上的难民……不知有几千几万。辻参谋不时来这里巡视，他给管辖那里的负责人久松宪兵中尉下命令，说：“给我干掉！”，于是，久松中尉来我这里听取指示。我指示说：“这是残忍的辻政信想干的事。他无非是军里的一个幕僚嘛，有什么权力来命令你们，立即把那些居民解散！”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指示，成千上万条命得救了。辻在屠杀华侨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从这两个例子就可以想像出。

河村中将在书信中说：给昭南警备司令部增派了林忠彦参谋，这是辻政信作战主任为了联络派去的。辻和林都是以急进闻名的，清洗实施纲要是由林草拟下达给宪兵队的。从派遣参谋的这种人事关系，也可以感觉出其中设有巧妙的圈套。

城中佐说：

“所谓军司令官的清洗命令，究竟是不是正式的，我至今仍在怀疑。”

“当宪兵本部只有两个人在场的情况下，大石队长明确地说：‘据说对华侨的清洗要坚决执行，要清洗10万人。’这显然是与辻参谋商量好了的。”

“然而，新加坡的秩序已经恢复，怎么也找不出非采取那种残忍手段不可的理由来。作为宪兵，因为有军里的清洗命令，只好服从，但没有一个人高兴那么做。”

接着，朝枝中佐明确而坦率地回答说：“那全是辻的责任。”

临到辻的直接下属作战参谋国武辉人中佐说话时，他选好词句这么说：“辻脑子好使唤，转动一下就改变了主意，而且在感情上对人的好恶十分突出。我和他面对面谈过，可辻说，即使部队参谋能做到，大本营参谋也做不到。占领新加坡之后，也许因为忙于拟定转移作战的计划，清洗华侨的事根本没有告诉我。战后接受了英军的审查，我清楚地说明了那种情况，对方才承认的。”

当时蓄八字胡子的情报主任参谋杉田一次大佐（当时为中佐），战后担任过自卫队参谋联席会议主席，说话的声音依然富有朝气。他说：

“有关清洗华侨的议案和实施，作为参谋部，根本没有召开过会议。全都是由特定参谋秘密进行的。如果召开会议

的话，那种胡来的清洗是做不出来的。”

“我听说发出了应该肃清敌性华侨的命令。作为司令官，尽管预想到会有若干牺牲，但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大的牺牲。”

“英国11万人已经被关押在樟宜监狱里，武器已被收缴。而且市内也很平静。即使师团要转移到苏门答腊等地去，也只需1个月时间进行准备，就算采取治安对策，也没有必要急急忙忙地搞清洗。”

“英军俘虏一发现华侨尸体，就喧闹开来，我们这才知道这件事。但根本不知道山下军司令官和辻参谋之间有什么样的商议。”

“很难想像他们是仿效纳粹杀害犹太人的做法。也许因为在中国大陆杀过人才想到这么做的。”

副参谋长真奈木敬信中将（当时为少将）是高级幕僚中唯一残存下来的，他的记忆力非常之强：

“我因为兼任军政部长，所以去找昭南市长大达茂雄商量，他感叹说：‘我现在为埋葬尸体忙得不可开交。打上岸来的尸体每天有十几具，多的时间有四、五十具，真令人头痛。你从窗口往下看吧，上百个华侨排成队，诉说自己的家属没有回来。’我这才知道华侨大屠杀的事实。”

“英国的非战斗人员拘留在市内，山下军司令官交代说，‘他们象是被盛气凌人的参谋折磨了一阵子，参谋长，或者副参谋长，要不要去看一下。’大概是占领之后的21日吧，我去了，听取了英国人的诉苦，配给婴儿吃的牛奶，就在那个时候。顺便去检查所转了转，是为了了解实情。但从来没有和辻参谋同在一起。”

“司令官的命令是以文件发出的，即使发给了河村警备

司令官，内容也很简单。就是要他确保昭南的治安。也许因为兼任军政部长，下达这种命令和起草这种命令，我全然没有过问。看来，是派往警备司令部的辻参谋在独断专行。”

“辻看得上的只有山下军司令官，而且这只是表面。至于铃木参谋长等人，有时他会毫无顾虑当面就骂，更何况高级参谋池谷半二郎大佐之类，就别想揭穿辻的秘密了。在陆军中，辻是下克上的代表人物，在参谋部里，他任意为所欲为。这就是发生事件的原因。”

这里谈到的下克上的观念，使人想起在诺门坎战争中，辻在关东军参谋部独断专横的情况。打了败仗依然控制参谋部的，就是辻政信。凭着马来亚作战的胜利，其骄傲和独裁到了何种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从上面的采访可以清楚看出，辻把大部分幕僚置于脑后，断然对华侨进行清洗。连最高首脑都当成了傀儡，其他人对辻大屠杀的阴谋就更加无从知晓。

归纳河村三郎中将的日记和遗书的《登上十三级台阶》一书，是由辻援助出版的。辻在书的序文中写道：

“在执行扫荡敌性华侨的命令中，河村少将采取的处理方法过于人情味了，甚至可以说是温吞，水这就是当时军司令部的气氛。尽管如此，战败后，作为山下将军死后的最高负责人，走上绞首台时，不知将军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加了重点的一句意味深长。尽管说是军司令部的气氛，但知道实情的，除了辻之外，也就是朝枝和林两人了。也许是辻巧妙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这里可以看出，河村司令官有的地方是受辻的压制和操纵的。这么说来，必须送上榨宜绞首台的，不仅是河村，真正的犯人应该是辻政信其人！

第13章 巴丹半岛的伪造命令

1942年2月15日，山下奉文中将的第25军占领了新加坡，可是，菲律宾战线却并不顺利。1月2日，尽管占领了首都马尼拉，但美军大部分潜入了巴丹半岛，战争变得不容乐观。派往菲律宾的第14军，司令官是本间雅晴中将，参谋长是前田正实中将。

然而，在巴丹追击战即将开始的1月2日夜里，南方军下达了主力第48师团转往印尼作战的命令。尽管是大本营最初的计划，但根据情况，在兵力运用上是没法采纳的。顶替的第65旅团（旅团长奈良晃中将），作为战斗部队，在编制和装备上都是不完善的。

第14军对命令没有提出异议，遵照执行。尽管追击战很快有停下来的迹象，但对本间中将作为军司令官应有的见识来说，却是一块试金石。

巴丹半岛的面积长51公里，宽26公里，西部和南部多悬崖，从海上难以接近。内陆有桑巴勒斯山与热带丛林构成了天然的要害阵地。麦克阿瑟看准了这一点，采取了撤退战术。兵员也比预料的多得多。就算没有充分进行情报活动，也不容第14军首脑对此进行辩解。

在这之前的2月8日，第14军在圣费尔南多的作战指挥所召开了幕僚会议，讨论的议案分为两个，甲案为依然继续进攻，乙案为调整态势，等待增援的兵力到达后，再图后策。本间司令官决心采用乙案，请求大本营指示。

此时，大本营也知道巴丹半岛的阵地构筑比预想的要坚固，所以理解本间采取的方案。就这样准备第二次向巴丹发起总攻击。没想到2月20日，前田参谋长突然降职去西部军司令部工作。而作战主任参谋牧达夫中佐也被降职到了军政部。两人都是被怀疑为妨碍战争的进展和过于干预军政。

这完全是对军司令官不信任的表现。3月1日，前田的后任、台湾军参谋长和知鹰二少将到任。可是，第14军仍然存在难题，是以攻克巴丹半岛为主要目标，还是在此之前先攻克米沙鄢群岛和棉兰老岛。两种主张争论十分激烈。最后使南方军和本营都卷入其中，本间十分为难。好在南方作战进展顺利，随着舰船和兵力有了富裕，同时攻击就有了可能，问题自然得到了解决。总之，对第25军的山下和第23军的今村均等来说，几乎看不到来自上层的干预了。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根本在于本间具有美英式的教养和理智。因为东条英机、富永恭次、或藤章、田中新一、服部卓四郎等武断派占居了军部的主流，理性派遭到了白眼。

第二次总攻击始于4月3日早晨，总共有300门火炮，雨点般集中向萨马特山袭击。与此相呼应，在东部战线，第21师团的永野支队、第4师团、第65旅团一齐开始南进；在西部战线，第16师团展开了佯动作战。

经过五天从空中和陆地的炮击轰炸和白刃突击，以坚固自豪的美菲军阵地，慢慢丧失了战斗意志。巴丹半岛的总指挥金少将于4月9日投降。接着在西南部一带，用了三天进行扫荡作战，前后12天就完成了对巴丹半岛的占领，比最初预定的一个月缩短了三分之二的的时间。通过封锁，使美军自行崩溃的做法，也收到了很大的效果。

然而，对第14军来说，还有两个麻烦的问题。第一是攻克科雷希多要塞。这是浮在离巴丹半岛南端4公里的海上的小岛，利用山岩构筑了纵横交错的地下战壕，号称“东亚的直布罗陀”所以攻克决非易事。第二是如何使用美菲的投降兵。其数量很大，以日军的补给能力是没法补给的。轰动世界的所谓“巴丹死亡行军”就是一种有计划的杀害行动。这种做法是从投降的第二天4月10日开始的。

战后出现多种解释，认为这大都是造谣。第14军的和知参谋长等人也这么说：

巴丹半岛的美菲军俘虏有5万人，其他一般市民与军队一起逃进巴丹半岛的约有2~3万人，共计有近8万名俘虏。由于从1月到4月的大致3个半月时间内，一直躲藏在巴丹半岛的山里，所以都染上了疟疾等病，必须让他们撤到后方去。因为军队还有攻克科雷希多岛的任务。

俘虏从第一线徒步向圣费尔南多转移。护送的日本兵也一起走路，俘虏只背一个水壶，他们却要背着背包，扛着枪走。整个行程约60多公里，走了4~5天，所以是老牛拉破车似的行车。因为疲劳已极。（中略）

接下去的作战，就是准备攻克科雷希多岛。同样缺乏车辆，这是实情。我反复说，决没有虐待他们。如果把这次看作死亡行军，那么，可以向同样担负死亡行军任务的日本兵打听，让他们回忆一下当时的辛劳。

（朝云新闻社编 战史丛书《攻克菲律宾作战》）
那么，“巴丹死亡行军”是不是彻头彻尾的误解呢？当

然不能那么说。如果说根本没有产生那种误解的念头，那就是慌言。

参加进攻巴丹半岛的步兵第141联队长今井武夫大佐（后为少将）说：

上午11点左右（4月10日），从兵团司令部突然打来直拨电话，把我叫到了话筒跟前。既然是特别指名要联队长听电话，肯定有什么要事……打来电话的是兵团高级参谋松永（梅一）中佐。由于所谈内容出乎意外和十分重要，使我一时怀疑自己的耳朵。对方说：

“巴丹半岛的美菲军高级指挥官金少将，昨天（9日）中午提出率部投降，但日军还没有全面认可。这样，投降的美菲军还没有正式被承认为俘虏。因此，大本营传下命令，各部队手中的美菲军俘虏应一律枪毙。望你部遵照执行！”

战斗中的命令，不管情况如何，必须绝对服从，这是军队严格的纪律。然而，兵团的这一命令，作为人，无论如何难以听从，而且做为常识，从普通的正义感出发，也难以考虑。

这时，一句古语从我头脑里闪过：“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处在自己有不可逃避责任的立场上，感到很为难，但很快便横下心来答道：

“此命令事关重大，一般难以考虑，因此，光凭口头命令难以执行，请改为正式的书面命令下达。”说完放下了电话筒。

我立即命令，解除部队手中所有俘虏的武装，让他们沿马尼拉街道自由北上，就这样全部释放了

……此时，我想兵团也许不会下达这种非同寻常的书面命令，即使万一下达了这种命令，到时部队手中已经没有一个俘虏了，也就保护了多数俘虏的生命。我是这么考虑过的。最后终于没有得到书面命令。

（今井武夫著《回忆中日战争》）

尽管战场上把死当作日常的营生，但说要杀掉所有投降的人，这种命令不能不令人吃惊。而且作为大本营的命令，听到的人肯定会不知所措。据说，个别部队实际上作了处置。如果命令全面执行的话，那个悲剧就远非新加坡屠杀华侨可比了。

那么，号称大本营的命令实际上是不是发下来了呢？那又是通过哪个统帅发下来的呢？今井大佐接着说：

据战后查明的情况，大本营并没有下达这种不合理又残酷的命令。据松永参谋说，象是从大本营派出指导作战的辻参谋回来口头传达的。在某部队里，就有人指挥参军的台湾高山族人，杀害了许多美菲军军官。虽说战场不同寻常，但这种异常的兴奋心理产生的行动，确实使人不寒而栗。

当然，战后在马尼拉抗美军审判战犯的法庭上，这一问题也作为审理的对象，增加了军司令官本间中将的罪行，听后难免使人产生恻隐之情。对发出那道命令的越权行为，却被捂起来没有追究，令人极为愤慨！

谈到辻参谋的登场，不能不给人以一种血淋淋的印象。收到与此相同的命令的，还有第10独立守备队司令官生田寅雄少将，他证实了今井大佐所说的话。

生田兵团的高级副官神保信彦中佐来自去军司令部，

“查明军里的这道命令没有报告本间军司令官”，从而当作伪造命令而未予理采。

还有，在逮捕奎松总统时代的财政部长、有才干的青年政治家马努埃尔·罗哈斯（后来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时，也对军司令官的处置命令申述了意见，从而救了一命。

1966年12月16日，东京十二频道播送了这一情况，神保中佐说明了真相：

神保：我申述了意见。指示说判处罗哈斯死刑的命令延期，再与军政人员共同合作予以取消。因此，我很高兴，说要从那里回马尼拉饭店去，就出来了。这一来，和知参谋长从楼上咚咚地下来……

这是真正的真相（笑）。这当中活着的人还有许多。另外，也有当时下达了死刑命令的人。这是为了年轻人才说出真正的事实……和知从楼上咚咚地下来，走进副参谋长的房间，说：“你们，发出了罗哈斯的死刑命令吗？”……

主持：是对年轻的参谋们。

神保：是，听说了。这一来，大家说：“绝对不干那种事。”他说：“上次军里（川口兵团）的参谋杀害了阿巴特·桑托斯，当时本间司令官就很生气。”接着又说：“没有下达过随便自作主张的命令。”

和知参谋长愣了一阵，招呼说，“神保，神保，到房间里来一下。”他说：“把刚才的命令拿出来。”我把书面命令给他看了。这一来，大家说：“已经照那么办了。”

主持：年轻的参谋们没有想到实物就在那里。

神保：是的。因为没有想到神保会飞到马尼拉来。

（学艺书林编《证言我的昭和史》）

就是说，事关重大的书面命令是在司令官和参谋长不知道的时候发出的。这里提到的“副参谋长的房间”，是处理菲律宾高官军政事项的地方。因为这事是由副参谋长林少将负责的。即将卸任的本间军司令官没有权威，如果和知参谋长也不知道的话，那就可以认为是副参谋长在独断专行。

这书面命令，当然很奇怪，可是，如果想到林少将和辻参谋是肝胆相照的好友，就不能不认为很有这种可能。

即使如此，那么有问题的辻参谋是什么时候出现在菲律宾的呢？马来亚作战告一段落的1942年3月，他很快被召回大本营。这与其说是承认马来亚作战有功，不如说是出于与服部作战科长之间的默契。

从过去的战力班长，这回荣升为真正的作战班长。因为是借南进的推动力任命的，所以处在沉醉于初战胜利的状况下，其得意的表现是可以想像的。

进入3月以后，第16军1日在爪哇岛东部和西部登陆；第15军8日占领了仰光；第二天9日，第16军占领了万隆。荷印军全部投降。12日，占领了北部苏门答腊，爪哇岛的英澳军8000人投降。真是一片捷报频传的好光景。

杉山参谋总长偕同服部作战科长等出发视察南方是3月21日。巴丹半岛第二次总攻开始的4月3日，总长一行飞抵马尼拉；当天夜里在马尼拉饭店停留一晚。总长的心情颇为不快，因为与视察过的新加坡的紧张局势相对照，马尼拉的状况显得太松弛了。

山下在新加坡通过屠杀华侨，实行了恐怖的军事政策；

而本间在马尼拉对菲律宾人，却采取了亲善政策。这种不同的情景就呈现在眼前。在总长看来，自然认为本间的军事政策软弱无力。他指示林义秀军政部长说：“妨碍日本执行军政的首魁，要杀！”这就表明了对本间做法的批评。

总长于4日在巴丹半岛底端的奥拉尼作战指挥所，听取了本间的情况报告，当天离开了马尼拉，在上海会见了中国派遣军板垣总参谋长，8日回到了东京。

在此之前，为了作战联络，从大本营派往菲律宾去的，有辻政信和濑岛龙三少佐参谋。到达马尼拉是在3月27日前后。可是辻参谋从马尼拉与总长同行回家时，中途在台湾降落。

然而，巴丹半岛美菲军一投降，根据总长的电令，辻参谋又返回马尼拉。前面谈到的枪杀投降者的命令，即使看作是从大本营派出的辻参谋发出的，其中也没有时间上的不一致。在胆量之大这一点上，敢于假借大本营的名义发出伪造命令的，只能认为就是辻参谋。

在诺门坎，就曾假借军司令官的名义拍出伪造电报。而这次内容之可怕，是远非上次可比的。内容也好，越权也罢，都是军队创设以来空前绝后的举动。而这种恶劣做法造成统帅上的混乱，也不能不令人吃惊。

在这个时候，又发出了与枪杀命令不无关系的“桑托斯处刑命令”。1942年4月11日占领了米沙鄢群岛中的宿务岛的川口支队（司令官川口清健少将），抓住了霍塞·阿巴特·桑托斯，桑托斯曾担任过奎松政府的财政部长兼农业部长，还占据过最高法院院长的要职。

川口少将得知麦克阿瑟和奎松一起逃离科雷希多岛，把米沙鄢群岛的管理交给了桑托斯，于是想让桑托斯参与日本

的军政，并按这个想法与马尼拉的军司令部取得联系。可是，军部再次回电，命令“在当地与家属一并处刑”。

事已如此，川口少将只好死了心，5月1日，处决了桑托斯。唯独陪同的20岁的儿子得救，被保护起来。战后，在审判战犯时，川口、和知与林军政部长之间，在法庭上展开了真正的殊死斗争。

在1949年8月4日的法庭上，和知中将作了证，现抄录如下：

那个命令我不赞成，可林怎么的也要和本间对证，这是因为4月10日以后，本间对林说，必须给桑托斯以厉害，尽管林说是根据大本营的要求。

然而，之所以事前没有与本间说，就盖上了我的印，是因为考虑到如先给我看，林和本间之间就好商量，也使第14军司令部在团结和感情上不致闹笑话。因此才盖上印的。

（林义秀著《日本武士道的末路》）

对此，林军政部长反驳如下：

作战科的处刑主任犬冢参谋（名惠亮，大尉，作战助理）也说，第一次的处刑命令是4月11日夜里由我起草，12日早晨发出的。这岂不是你瞒着本间，于12日早晨发出了桑托斯的处刑命令么！

对此，你说佐方（名繁木，大佐，军政部总务部长）于4月18日带着桑托斯的处刑命令来到了巴丹。不管怎么作为菲律宾检察官的走狗采取行动，也该说得更合乎道理吧？

（同上）

如果在事件发生的当时也好说，如今已经事过4年了，

真相已被埋没，又有什么办法呢。

当时，在马尼拉附近的卢巴奥军营收容所，目睹了这场争吵的门松正一大佐还活着。他一度因另一事件要送上绞首台的，但后来冤案大白，因而无罪释放。作为第三者，能以清醒的目光看到这一情况，是为数极少的。他所说的话引人注目：

本来，桑托斯事件是菲律宾的内政事务，川口少将抓住了他，暗中与林军政部长联系，请求就如何处置作出指示。当时，林少将也对是否加以处刑，还是该灵活处理，有些迟疑难定。

这时，突然飞来一个人，对林连斥责带激励，终于使他下定了处刑的决心。此人就是杉山参谋长的随行参谋、正在视察巴丹半岛作战的辻政信大佐(原文如此)。其中还有另外的原因，林与辻是莫逆之交，林在台湾研究部时，就和辻一起工作，是作为南洋方面的先驱者，彼此得到了承认的志同道合者。

辻以必须顺从自己的那股气势鼓动林，这一来，原来性情温顺，而又缺乏坚定信念的林，也就同意了辻的处刑意见。这里存有祸根。

一天，我为了处理不在参谋部期间的工作，回到了马尼拉的司令部。林让我在桑托斯的处刑命令上签字，我没有仔细看就盲目地盖了印……还让我代盖了军司令官的印章……当然，我并没有更好地听听以往的过程……

我深知和知参谋长那种豪放磊落的性格，因此，了解他当时是出于完全信任同期的林而盲目盖印

的。尽管事到今天，林是那道处刑命令的实际责任者，但他却向检察官提出：“那是因为参谋长作为军司令官代理发出的处刑命令，我并不知道，所以没有责任。”

（门松正一著《绞首刑》）

1951年作出了判决，林义秀为无期徒刑，川口为有期徒刑6年。1953年川口被释放，有幸踏上了故国的土地。通过这一事件，也可看出辻参谋不同寻常的言行，留下了黑黑的影子。

战争结束时，东部宪兵队司令官大谷敬二郎大佐这么写道：

他（辻参谋）在台湾得到巴丹陷落的消息，连忙乘飞机来到了马尼拉，接着以大本营参谋的名义，劝当时的军参谋长和知中将把巴丹的俘虏全部杀掉。当然，和知中将对这种鲁莽的建议是不会听从的。

他又向第16师团长森冈中将提出了同样的劝告。森冈中将也是有良知的人，即使把这作为大本营参谋的意见，也没有听取。然而，辻参谋却进一步赶到第一线，作了同样的劝告。因此，紧接着在美菲军投降之后，象是杀害了部分俘虏。

（大谷敬二郎著《战争罪犯》）

上述伪造命令，在这里进一步得到了证实。

辻参谋是大本营派往菲律宾的。从他的著作中却看不到这方面言行的一鳞半爪。看上去写得滴水不漏。战后，他写的著作为数不少，但对自己不利的场面和事件讳莫如深，不去涉及。巴丹战场上的言行，令人再次想到了这一点。

第14章 指示攻克莫尔兹比港

美军在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尔卡纳尔岛和图拉吉岛登陆，是1942年8月7日，那是一次奇袭。然而，这次奇袭并非不可避免，跟中途岛海战一样，是日本海军的漫不经心和麻痹大意造成的。

本来，最初在瓜达尔卡纳尔登陆的日本海军，第4舰队派遣的设营队于7月1日和6日已经两次登上该岛，人员有2571名，另外还有海军陆战队247名。目的是为了建设飞机场，8月5日第一期工程完成，修成了长800米、宽60米的跑道。

尽管如此，后来还是停工了，原因是打算建设海军进攻新喀里多尼亚岛、斐济和萨摩亚群岛（F·S作战）所需的基地，而且该地处在拉包尔第11航空舰队的战斗机直飞的正前方。

日本方面估计在珍珠港遭到奇袭的美国海军，要治好了创伤转手反击，最早也要到1943年以后。因此，即使在瓜达尔卡纳尔登陆，也不能认为是真正的反攻。

对此，美军又是怎么打算的呢？华盛顿的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金元帅在旧金山开始与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切斯特·尼米兹元帅会谈是7月4日，他们商定于8月1日开始进行“望楼作战”。

其第一号任务是夺回被日本海军占领的图拉吉岛，攻占圣克鲁斯群岛。没想到第二天5日夜里，飞来了一纸密码电

报。那是从珍珠港的海波局（战斗情报班，专门破译日本海军的密码）打来的，内容为日本海军已在瓜达尔卡纳尔登陆，目的是为了修建飞机场。两位上将对此十分惊慌，连忙改变“望楼作战”的第一号任务。

停止攻占圣克鲁斯群岛，改为把攻克瓜达尔卡纳尔提上日程。因为他们早就知道飞行基地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尼米兹的太平洋海战史》这么写道：

“开始登陆的预定日期D日，定为8月7日，必须在日本修成飞机场之前予以占领。谁最先用之于作战，就有可能取得胜利。”这是多么可怕的洞察力！

瓜达尔卡纳尔岛成为美军的作战目标，就是根据这种情势判断作出的。作战开始的日期推迟了一周，那一天就是在瓜达尔卡纳尔登陆的8月7日。美军首脑的决断多么周密。

与此相比，日本的对策如何呢？从拉包尔的第一线到大本营，都缺乏准确的判断。当天，参谋本部作战科的井本熊男中佐在与军令部联络时说：

海军5月3日占领图拉吉岛，6月底起开始在瓜岛修建飞机场的事，已经听说了。这些地点在什么地方，是听取了说明之后才知道的。

太平洋的作战任务是由海军承担的，所以参谋本部没有表示出任何关心。可是，面对新的情况，自然感到即使作为陆军，也必须考虑采取某种对策。要向太平洋派出陆军兵力，必须郑重行事。

我立即回到参谋本部，把情况报告了科里和上司。谁也不知道图拉吉和瓜岛在什么地方。尽管大家对美军眼下已经登陆感到意外，但根本没有人把它当作一件大事。

（井本熊男著《作战日记写成的东亚战史》）

可叹陆军认识不足，但有必要知道陆海军之间，并没有保持紧密的联系。这是因为占领了莫尔兹比后，陆海军的关心毋宁说转向了东部新几内亚。不管怎么说，这就是对美军认识不足的根源。

然而，莫尔兹比港是同盟军在东部新几内亚的据点，西南太平洋方面的同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大将掌握了这里，构成了对我拉包尔基地的威胁。

珊瑚海海战的主要作战是在5月8日，以航空母舰为主力的第一次日美作战，是弗兰克·弗莱彻提督对井上成美的作战。尽管双方势均力敌，胜负各半，日军却未能把紧要的运输船团用来进攻莫尔兹比。为了挽回这种战略上的失败，大本营把希望寄托在越过斯坦列山脉的陆地正面进攻上。第17军司令官百武晴吉中将于7月18日下达命令：

“迅速在布纳附近登陆，沿布纳科科达公路急进，攻占莫尔兹比及附近机场！”

在下达这一命令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就是辻政信中佐。他是大本营派遣的陆军作战班长，携带着攻克莫尔兹比的命令书。7月15日到达棉兰老岛的达沃，把11日刚下达的“大陆令第六五七号”交给了百武军司令官。内容为：“第17军司令官在协同海军确保攻占莫尔兹比的同时，应及时平定东部新几内亚的其他要地。”

另外，他没有进行作战研究，就口头指示立即实施占领莫尔兹比的正式作战。

这里所说的作战研究，其任务为：“第17军司令官应就沿英领新几内亚北岸，从陆路攻占莫尔兹比的作战，迅速协同当地海军进行研究。为此，使用一部分兵力协同海军及时

占颌曼巴勒河沿岸地区，应尽快把研究成果报告参谋总长。”
(简称为11号作战)

莫尔兹比的攻克战，不用说是以这一研究结果为前提的。因此，在第17军对从作战研究到正式作战的突变，并非不抱怀疑，只是因为有大本营得力参谋的直接口头指示，而没有提出异议的余地。前面提到的百武军司令官下达的命令里，就存在这种原委。

然而，不久也就弄清辻中佐的指示显得多么独断专行。大本营陆军作战科长服部卓四郎大佐于7月25日给第17军发出督促电，其中称：

“望报告第17军对莫尔兹比攻克战的研究结果。”对此，已经向拉包尔开进的百武军司令官也为之吃惊。他曾经考虑把辻中佐从拉包尔赶出，可不知为什么没有断然实行。

那么，大本营采取了什么对策呢？当时，对作战科战力班长高山信武中佐的追问，服部大佐是这么回答的：

我也想了许多，感到很不好办。部长（田中作战部长）也提醒说，事关大本营的威信。我对部长说：

“也许第17军的研究需要相当多的时日，从整个情势来看，在需要速战速决的现状下，令人感到是发挥了他特有的当机立断的主动积极精神，才拿出这一独断之举的。新几内亚方面的事，东京并没有断定决不可行。我认为这个时候只有交给辻来判断。”

部长也同意了。这是辻的事。考虑到马来亚作战时他工作的积极性，也许他是想使这次作战获得成功。

（高山信武著《服部卓四郎和辻政信》）

服部的热情安排何等的周到。如此非法，居然没有作任何追究，反而予以追认。不管服部也好，田中也罢，因为是与辻同是积极主动精神的好朋友，所以组成了三人合唱。可是，从统帅的观点来看，应该说是不能忽视的越轨指示。

在辻政信著的《瓜达尔卡纳尔》一书中，详细记述了在达沃和拉包尔与第17军司令部的接触，可有关“11号作战”，却一行字都没有提。

然而，对新几内亚北岸布纳的侦察，却写得很详细。7月26日早晨，从拉包尔出发的驱逐舰“朝风”号，载着前去进行物资补给联络的陆军士兵约30名，辻中佐也混在其中。敌人来袭是在第二天黄昏。

眼看布纳已经可闻其声，辻却在中甲板上，头部（右耳上方）遭到机枪射击，倒了下去。辻把这一情景作了充满悲壮的描述。可奇怪的是，在乘坐的陆海军官兵180余人中，负伤的却只有辻中佐一人。

这是极不走运，还是出于恃勇蛮干，光从这一行动来看，似乎属于后者。反正这次负伤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他没有踏上布纳一步，就仓皇返回了拉包尔，没有听从入院的规劝，于7月29日回国了。

他在参谋本部的出差报告中写下了如此的结论：

一、敌人的反攻不容轻视，战场上空敌我空军兵力是3：1，尽管我军勉强在第一线全力展开，敌人似乎仍悠然自得地保持着纵深的兵力。

二、如果不把海军在当地的兵力增3、4倍，莫尔兹比的作战就应延期（重点为引用者所加）

（辻政信著《瓜达尔卡纳尔》）

可以看出，一涉及最前线的气氛，就显得多么胆怯。

尽管如此，“应该延期”的主张和把“11号作战”搁置一边之间的矛盾，又该怎么结合起来呢？更何况莫尔兹比港的攻克战，与瓜达尔卡纳尔一样，出现了一副悲惨的地狱图，而且是陆军在太平洋作战中首先吃了败仗。围绕“11号作战”的辻中佐的独断专行，其产生的影响之大，是没法估计的。

第15章 盲目冒进的瓜岛作战

日美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战斗，迎来了重大的局面。8月，一木清直大佐指挥的第一次进攻，9月，川口清健少将指挥的第二次进攻，均告失败。

瓜岛位于距拉包尔东南方1,020公里，东西长137公里，南北长45公里，面积约等于房总半岛。最高的山脉2,400米，东西走向，平原全都向北部扩展。从北部隆加岬往东5公里，深4公里，是椰子林平原，其他，就是被丛林覆盖的险峻瘴疠之地。

企图挽回战局的大本营，把在爪哇待机的第2师团和在苏门答腊的第38师团编入第17军。除参谋长之外，参谋一下子增加到11名。进而参谋长一职由宫崎周一少将替代二见秋三郎少将，高级参谋由小沼治夫大佐替代松本傅中佐。特别令人瞩目的变动是，大本营派参谋辻政信中佐登场。

辻参谋是应首相兼陆相东条的请求被派往瓜岛的。辻把与东条的问答记述如下，

“作为陆相，这么说是过分的，但我总觉得这方面（东南太平洋）的作战不容乐观，我很担心。你去向总长说说，能不能尽早到当地去指导作战……从拉沃尔不管往南还是往西，都是岛屿连着岛屿，但是不知为什么，却没有机场相连。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将失去制空权和制海权。为什么不连接

起来呢……”他脸色深沉地说。

“真不愧是东条君，尽管兼任总理和陆相，工作繁忙，却道破了未来的战况。细心作笔记，善于学习的东条君，在此期间，也许认识到了作为航空总监的新战略。”我心里这么想，随后说，“您的担心我完全理解……我并非不愿意到前线去，而是认为不如让我乘意大利飞机去罗马和柏林联系……因为战争的前途除了德苏和平、日中和平以外，没有别的出路……”忽然，他发出了咆哮声，比预想的还要严厉。

“不要说废话！你是大本营的作战班长，好好地在地作战，这是你的任务。看你说了些什么……”

（辻政信著《瓜达尔卡纳尔》）

杉山参谋长从辻那里听到这个情况之后说：“是吗？大臣很担心！我自己的确也很担心。你刚从战场上回来。实在过意不去，不过还是去吧……”

就这样决定派遣辻到瓜岛去。

陆相当即把参谋本部部员叫来，亲自授与重大使命。从命令体系来看，可以说是没有先例的。而辻提出到罗马、柏林去进行联系，这也可以说没有先例。对重视程序和统帅权的帝国陆军来说，这种手续是不合乎常识的。

反正通过问答，可以看出两人深厚的人情关系。不，甚至令人感到比这还要亲密。杉山唯唯诺诺地听从东条的要求，这也许与两者势力不同有关。

不管怎样，辻和东条这种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辻头一次在参谋本部工作时，科长是东条，

任命他为士官学校的中队长的也是东条。辻在关东军当参谋时，东条是宪兵司令官，也是参谋长。

由于这种经历而有了亲密感，那是很自然的。可是，光凭这一点也是不可想像的，肯定还会有其他关系。作为“二·二六事件”序幕的士官学校事件，可以说是东条和辻的奇缘造成的。通过“二·二六事件”，辻显示出了比任何人都强的才能。他甚至这么说：“通过这次事件，分清了过去的是非，从被告的立场回到了原告的立场。”接着，他从水户的第2联队重返关东军当参谋。

当时，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官东条，深入内地，将在满的革新派军官一网打尽，为亲如兄弟的永田铁山报了仇。他从关东军参谋长提升为陆军次官、大臣，也与平定“二·二六事件”的功绩有很大关系。

在大量处理奋起的军官的同时，也放逐了皇道派幕僚，或把他们赶出核心部门。其中自然包括真崎、荒木两大将，还有与此有关的柳川平助、小畑敏四郎、铃木率道、山下奉文等人。不仅如此，被称为清军派的建川美次，桥本欣五郎，也被卷入整军的风暴之中。

之所以能如此广泛地进行镇压，那是因为皇族为后盾。

27日，晋谒天皇时，天皇反复说，暴徒不听军队统帅部的命令，朕将亲自出动。接着又于28日说，朕亲自率领近卫师团去现场。当时考虑会有诸多危险，随即进行劝阻。

当时，陛下声泪俱下，说，传话下去，应尽快予以镇压。确实十分悲痛！

（本庄繁著《本庄日记》）

这是侍从武官本庄繁大将的日记，从简洁的描绘中可以看出感人的情景。奋起的军官被称之为暴徒，可见天皇怒气非同寻常。正因为统帅权的根本掌握在天皇手中，任何人都无法制止。

就这样，在扫除皇道派的同时，统制派和反皇道派的幕僚发迹了。东条、杉山能走上发迹的大道，不外是被认定为对平定“二·二六事件”有功。事件之后，担任陆相的寺内寿一大将、任次官的梅津美治郎中将也同样如此。从此以后，帝国陆军把与“二·二六事件”有多大牵连，作为考核人员和确定忠诚的标准。

然而，“二·二六事件”的序幕，不是别的，就是士官学校事件。而士官学校事件与辻的存在又不能分开。这样，统制派幕僚与辻就构成了受恩之缘。而东条和辻的这种缘分，似乎更为深厚。

杉山虽说是间接关系，但也有同样的缘分。辻之所以大肆说：“我们才是走在最前头的清除皇道派的英雄”，原因在这里。应该知道，大本营的派遣参谋辻中佐，之所以抖威风，就因为有这么一种背景和人缘。

辻中佐再次出现在拉包尔第17军司令部是1942年9月25日。这是自负伤后离开拉包尔的第57天。在此期间，战云弥漫的拉包尔的局势，完全变了样。第17军因为有攻克瓜达尔卡纳尔和新几内亚两个任务，显得更加焦虑。

司令部只剩下官崎参谋长和两名参谋，百武军司令官亲自进入瓜达尔卡纳尔。在拉包尔召开的陆海军联席会议上，对如何运送以第2师团为主力的兵员、武器和粮食，大家议论纷纷。

陆军打算用大船团运送，要求舰艇护航。海军方面主张用驱逐舰和机动艇运送。双方互不相让，引起了百武司令官的气愤：

“好，如果海军确实力量不够，船团没法护送，那就不用护航，光用陆军的船团运送。为此，军司令部将在船团的最前面。”

尽管他刚强气壮，实际上危险就在眼前。要避免这么做，就只有等待海军让步。出面进行交涉的是辻中佐。他偕同林忠彦参谋、和第8舰队参谋大前敏一中佐一起，飞往多拉克岛。

9月27日，辻在“大和”旗舰上晋见了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大将。辻中佐报告了瓜岛的实际情况和百武司令官要夺回该岛的悲壮决心。

当时山本大将说：

海军疏忽大意，作战不力，把陆军留在被占领的瓜岛上，不能继续补养，让其饿死，此事实实在抱歉。好吧，山本接受你的要求。如果有必要，即使把“大和”舰停靠在瓜岛，也一定要按陆军的要求掩护船团运输。

唯有一事请转告百武君，希望看在山本的面子上，不要乘坐运送船去，而要乘坐驱逐舰安全登陆，出色地进行指挥。

（辻政信著《瓜达尔卡纳尔》）

由于山本大将的决断，难题得以解决。辻以感激的心情，在书中记述了这一幕。

辻被山本大将陶醉了。他极力赞扬说：“这样的将军在陆军里究竟有几个？我甚至想当个海军参谋在这位元帅的手下战死。说整个海军，不，整个日本的命运担在这个身高五尺

的小个子一人身上，不是没有缘故的。”

不管怎么说，奇袭珍珠港，他是成功了。但是，不用说中途岛海战大败，就是珊瑚海海战和第一次所罗门海战，尽管因为部下不力，却没法给予很高的评价。

与山本大将相对抗的美太平洋舰队司令长官尼米兹元帅，并没有老呆在夏威夷，在辻中佐拜访山本大将的9月27日，他经过新喀里多尼亚岛的努美阿，亲自踏上了瓜岛的土地。

当时，平静的海面无边无际，飞机在亨达森机场降落，他亲自听取地面部队总指挥官A·阿切尔·班迪克利佛特海军少将作第一线情况报告，慰问了伤病员，还向勇敢的官兵授与勋章。士气之高是不言而喻的。

瓜岛争夺战，美军实际是在太平洋舰队司令长官的指挥下，由海军进行的。这一点也与日军相同。残酷的战斗尽管在丛林里进行，但主战场还是在周围的海上。具体说来，能否确保兵战补给线，这是胜败的关键。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日军与美军一样，是由海军进行决战。只是日本海军的将官，没有一个人踏上瓜岛的土地。

如果山本大将确实说了“丢下陆军，不能继续补给，让其饿死，实在抱歉。”那倒是他的心里话，说明他在反省。对山本大将的崇拜，应该恰如其分。这表明辻中佐是趋炎附势之徒。

10月9日，第17军的幕僚们乘黑夜在瓜岛西海岸的塔萨弗伦克登陆，其中除小沼高级参谋外，还有大本营派遣的辻和杉田一次两位参谋。第2师团长丸山政男中将、参谋长玉置温和大佐等，已于10月3日登上瓜岛。

9日，第二次进攻失败的川口清健少将也投入了新的兵力，参加第2师团的进攻。当时，指导这个师团作战的是辻

中佐。右翼部队指挥是川口少将，他为了夺回亨德森机场，向南方丛林进击。有名的罢免川口事件，就是在这紧迫的战斗中发生的。辻政信的《瓜达尔卡纳尔》一书有如此记载：

以22日深夜为期的夜袭命令，终于下达了。分解开来扛在肩上的联队的大炮，好不容易才架设在第一线，做好了协助夜袭的准备。

下午3时许，K少将突然来电话，说：“第一线的进攻准备不充分，今夜根本无法夜袭，请推迟到明天。”

把预定21日夜袭的日期推迟，也是K少将的意见。今夜进行夜袭的命令，已下达给整个师团，可就在即将实施之前，又要告吹。就是这么一个带紧迫性的电话。

温和的师团参谋长玉置大佐带着愤怒的声音，拿话筒的右手在发抖。在旁听着的丸山师团长，白发都象要倒竖起来，他替代参谋长说：

“K少将，请马上到师团司令部报到。眼下把右翼部队的指挥交给东海林大佐。”一副温和慈善样子的丸山师团长，也忍无可忍了。

田村大队发起第一次总攻击，深入敌阵，正要占领整个机场时，K少将没有用支队主力前来支援，在丛林中失去时机，把部下扔在瓜岛，只身回到拉包尔报告战况，如此等等，使师团长、军司令官都对这位少将失去了信任感。

本该解除军职，但出自军司令官的慈悲之心，再给他一次机会，让他雪耻一战，所以才让他听从丸山师团长的指挥的。

朽木终归是朽木，大敌当前被剥夺了指挥权的少将，自那以后，师团司令部的人谁也不去理他。他只好在丛林中孤芳自赏。

“K少将”就是川口少将。文中充满了辛辣的漫骂。究竟有没有辻参谋指出的那种事实，让我们从川口少将的手记《瓜达尔卡纳尔战斗记实》中摘出重点部分来看看吧。

关于田村大队事件，他是这么记述的：

“辻的手记写道，这个时候，作为支队长的我，应该亲自站在最前头，扩大田村支队的战果。但很遗憾，田村大队的这一情况我是回大队之后才听到的。即使当时听到了，也如上面所说的，我连一个兵的预备队都没有。”

这既不是掩饰，也不是遁词。在当时情况已经明朗的今天，这是鲜而易见的。再看看关于“只身回到拉包尔战况报告”的说法：

我屡次对舟艇机动队提出意见，还有转到马达尼科河左岸以来，作战上意见的分歧等，都引起军司令官极大不赞。然而，正是因为想到是为了国家，才陈述自己的想法的，所以只好忍着。

对下一次战斗，我准备了充分的粮食弹药，因此，请求不要象上次那么着急，希望能以11月3日明治节为期开始进攻。而且没有地图，也很难办，所以请求多摄取航空照片，把战场附近的情况印发下去。

另外，对辻的手记使我很抱歉。他在手记中轻轻地写道：不知为什么，我任意来到了拉包尔。可正如上面说过的那样，这是军里的命令召来的。

（川口清健著《瓜达尔卡纳尔战斗记实》）

田村大队事件也罢，只身回到拉包尔也罢，与当时的情况一对照，就知道全都是辻参谋的中伤。川口少将接着写道：

我的右翼部队在左翼部队后面行进。一天，在行军时，传令兵带来了军里发来的4张航空照片，是最近刚摄制的以敌机场为中心的照片。我看后很吃惊。我在9月12日、13日发起进攻时，南边没有任何类似的阵地，而眼前的照片，却清清楚楚地显示出一种非常坚固的工事。

我们原打算从其正面发起攻击，这么一来，不就如同向铜墙铁壁扔鸡蛋一样，显然是不用打就会败下阵来。我很恼火，心想必须避开这个阵地，从远处敌人左侧背后迂回进攻。

当然，能迂回还是应该迂回。虽然带有危险，但远比正面进攻好。可难办的是无法报告师团长。正当我感到为难时，完成了对丸山部队指导的辻参谋，正好站在叉路口（这里是左右两翼部队的分界处）等着。

真是用人之时碰上了帮手。我很高兴，就站在那里谈了起来。我请求说：“由于这个那个的原因，我想向这个方向迂回进攻，请向师团长传达这个意思。”

辻说：“这个想法很好。我知道了，将很好地转告师团长阁下，这该高兴了吧。”他朗笑着极表赞同，答应代为转告。

事情好象是由4张航空照片引起的。川口少将被召到拉包尔第17军司令部时，请求提供照片，这在“手记”中已经看

到了。既然照片上出现了敌人的新阵地，那就“等于向铜墙铁壁打鸡蛋。”

因为已经有战斗经验，所以这个判断无疑是切合实际的。避开正面进攻，从东边迂回冲向敌人左侧背后，这一想法就包含了这个理由。这不光是川口少将一个人的想法。

当时，在拉包尔的宫崎参谋长也说：“敌人在隆加机场南侧加强防备的情况，从航空照片上看得非常清楚，所以进攻阵地的准备工作不能有漏洞。”他把这个意见和照片一起转告了情报参谋山内丰秋少佐。

19日夜里，山内参谋在瓜岛登陆，那是在第2师团已经开始行动之后。虽然是难得的照片，但赶不上新的作战行动。川口少将在路上意外遇上辻参谋，赶紧说出了自己的判断，委托他转告丸山师团长。

对方是称作“作战之神”的大本营派遣参谋，而师团长也是被看作有能耐的实力人物。在辻参谋的斡旋下，希望自己的想法得到承认，这并不奇怪。

《川口手记》继续说：

尽管师团没有作任何表示，但由于得到辻参谋的理解，我就更加打算在当夜从侧背去迂回进攻敌人，让士兵好好休息。这时，师团司令部的通讯兵来敷设电话线。接着，让我接电话，我一听电话，对方是参谋长玉置大佐。他说：

“听辻参谋说，右翼部队要迂回到敌人侧背去，不过，还是请按原定计划从正面攻击。”为此，我说：“跟你说！从正面攻击，我没有把握取胜。希望得到师团长的批准。因为辻君答应了，所以我已按这个打算下了命令，要部下为迂回作战彻

底作好准备……”

过了不久，电话又来了。还是玉置参谋长。

“我传达师团长的命令，免去阁下右翼部队长的职务，由东海林大佐接任。请阁下到师团司令部来。”

我大吃一惊。今晚我可要挥舞河内守本行的名牌军刀，率先杀入敌阵。尽管生死不明，但要打起精神，和第3大队长一起，负起9月失败的责任。没想到由于辻参谋负约，被阻止了。啊！我没有发挥任何才能，这一来，作为军人的生命也就结束了。

话语里充满了断肠之痛。与辻政信的《瓜达尔卡纳尔》一书相对照，迫使丸山师团长罢免川口的理由，就变得完全不同了。对在迂回作战上意见对立的川口少将，辻参谋举出的理由，是川口打来了恫吓的电话，说：“由于第一线的进攻准备不充分，今夜根本无法夜袭，请延迟到明天。”

在登陆瓜岛时，围绕舟艇机动的事，与海军发生了纠葛的就是川口少将，他向上级申述了好些意见，被召回拉包尔第17军司令部，也是要陈述这些意见。

有人认为，正因为是有高知县人血统的少将，才显出这种“硬汉子劲儿”的。所谓“硬汉子劲儿”，那是表现高知县民性格的方言，具有反抗、刚愎倔强和性情乖僻等意思。

但是，把瓜达尔卡纳尔的作战，单纯归之于这种性格，未免太不合适了。情报不足，地形险要，机动能力低劣等，尽是难办的事。当然，首先应该指出是战略战术的拙劣。

另一个原因是，在以第2师团为主力的总攻击中，与海军之间应该有时间的规定和约束。然而，从战线的实际情况来看，要遵守制约是极为困难的。当初规定总攻的日期是10

月21日，之所以顺延到22日、23日、24日，决非只是因为川口少将迟迟没有作好准备。

那须弓雄少将率领的左翼部队，同样也是准备不充分。只不过右翼部队长川口少将提出更改进攻日期，这一点有所不同罢了。怎能归之于懦弱或“硬汉子劲儿”呢！

为提高战斗效果而改变计划，这是指挥官应尽的任务。甚至还要有非同寻常的勇气。

然而，在权势者辻参谋的眼里，也许申述意见本身就是不恰当的，因为作战计划原本就是由辻参谋等人起草的。川口少将的意见，即使有不足之处，也并非不能接受。他装着采纳川口少将的意见，就是一种表演。不管怎么说，在即将短兵相接之际，把第一线部队长撤职，只能说是一种粗暴的行为。

任命为右翼部队长的步兵第230联队长东海林俊成大佐，是刚从第38师团调来的人。他在战后的回忆中说：

23日傍晚，第2师团玉置参谋长打来电话，询问战术上的问题：“当师团以左翼为重点进行攻击时，右翼部队怎么办？”我回答说：“右翼部队可把重点放在左翼。”

玉置参谋长接着说：“那好！就免去川口少将的右翼部队长，任命东海林大佐为右翼部队长。”我推辞说：“在即将进攻之前，这是违反武士道的，而且有碍健康。”

玉置参谋长说：“命令，命令！”就挂断了电话。正好这时，川口少将来了，他非常激动。

（朝云新闻社编战史丛书《南太平洋陆军作战（2）》）

这说明免职的原因是由于申述了迂回作战的意见。比参谋所说的延期夜袭等等，只不过是混淆核心问题的说法。

但是《瓜达尔卡纳尔》一书根本没有提及重要的迂回作战。为什么要加以隐瞒呢。当时军战斗司令部对罢免川口并不知晓，而是以师团长、参谋长的决断行事的。那么，是不是光凭师团首脑的决断呢？有没有促使师团首脑罢免川口的“影子人物”呢？通过比的诽谤和川口的解释，就可以认定是比参谋自己跳了出来。

当然，对比参谋来说，也有必须隐瞒的原因。那就是为了师团长的面子，也为了不使自己成为办事拙劣的人。实际上，“影子人物”才是罢免川口的罪魁祸首。

这里需要有使罢免合法化的名义。那就是田村大队一事和只身返回拉包尔、延迟夜袭等等，这些假象掩盖了罢免川口的真相，把对迂回作战的申述从记录中抹掉了。

有趣的是在罢免川口的同时，美军也更换了指挥官。10月18日，南太平洋战线司令官罗伯特·哥穆勒中将顶替了威廉·蒙斯中将。

“他保有智慧，作为军人，又大胆无敌，无以伦比，是能够估计危险深处的人物。”尼米兹元帅这样赞赏说。这员猛将被人送了个“猛牛”的外号。这次指挥官更换，使瓜岛的美军官兵为之振奋。

“我们患了疟疾，用手脚从战壕中爬了出来。接下去的一瞬间，我们象孩子一样一边哇哇欢呼，一边到处乱跑。”这是一个士兵的回忆。这次人事更动自然是根据尼米兹大将的决断进行的，是任何人都能接受的人地相宜的更动。

在更动的三天前，尼米兹元帅说明了当时的情况：“现在我们尚未控制瓜达尔卡纳尔方面的海域，局势并不是没有

指望，但也确实存在危机。”从这话就可看出时机是否合适。

日美双方指挥官的级别和情况虽说有所不同，但川口少将被更换，显得多么阴郁和烦闷。大敌当前，右翼部队长被罢免，并没有因此而振奋士气，反而在进攻中以惨重的失败告终。这应该说是很自然的。

另一方面，那须少将率领的左翼部队，在24日和25日两天的进攻中，损失了以那须少将为首的联队长、大队长、中队长等大部分人员，部队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从这一结局就可看出，作战本身显得多么盲目莽撞！主张迂回作战的川口少将，其焦虑是可想而知的。

第16章 没有人承担战败的责任

匆匆赶来参加第2师团总攻的辻参谋，是充满自信、从容不迫的。10月2日，从拉包尔打来的电报，就能看出这一点：

“第17军和联合舰队同心协力，极好！据我的经验，这是大东亚战争开始以来的头一次。第17军的兵力很充足，所以不必过早变更我军兵力配置。战局虽然变化多端，但不用担心。”

前面提到了船团护航的事，辻也许因为能说服山本大将而感到很高兴。尽管如此，在硝烟弥漫的拉包尔产生这种感觉，不是过于乐观了么？

这种乐观究竟从何而来？辻从东京出发时，与作战科的战力班班长高山信武中佐有过交谈：

“现在一木支队已全军覆灭，川口支队还在苦战中，尽管投入第2师团的兵力是不得已的，但万一第2师团不成功，那就不必非坚持争夺瓜岛到底不可，而是放弃它，把决战的战场放在后方我军主要防御阵地上。”

“什么！你是说要放弃瓜岛，想退却？作为大本营的参谋，说这种没出息的话，是要干什么！更何况预言第2师团的作战会失败，真是岂有此理？”

“我并不是想说没出息的话，也不是预言第2师团的攻势会失败，而是想假设一下。对不起，我

改正。我只是在想，应该如何最终取得胜利。”

“别说那种大话。打仗要有时机。气势对士兵很重要。现在是如何抓住战机。眼下如果把瓜岛让给敌人，等于把气势送给了敌人。重要的是不要光是被数量和形势困住，要抱定必胜的信念，咬住敌人。我精锐皇军所向无敌，毫不畏惧。忠告你！作为参谋，绝对不能示弱，绝对不要说退却之类的话。”

（高山信武著《服部卓四郎和辻政信》）

一眼就可看出这是多么不讲道理的话。“抱定必胜的信念”、“绝对不能示弱”的话，只能算说得过去；隐瞒战略战术的道理，也是万不得已。预言第2师团的作战会失败，之所以确实被言中了，那是因为恰如其分地指出了弱点。

战力班班长的意见，出自从大处、高处的洞察，在拉包尔基地的第17军司令部也不是没有悲观论和慎重论。8月29日，川口支队的驱逐舰开始输送时，就向大本营发出了重点如下的电报，

“如果用海军航空兵不能制止瓜岛方面敌人的航空兵力，那么，军部就应考虑采用第二个策略。”

“第二个策略”是什么？虽说是婉转的表达，但可以理解为放弃瓜岛。与辻参谋对调、从拉包尔回国的井本熊男参谋也说：“直接处在作战要冲的第17军司令部认为不容乐观，还把二厂参谋长的判断用来作证。”

正因为作战部积极主动、狂热透顶，田中新一部长等认为：“第17军的精神状态需要改善。”二见参谋长的调动，不用说，其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但是，逞强固执的辻参谋于10月9日到达瓜岛，第二天

就给田中作战部长发出如下电报：

1. 由于敌人从8日起开展攻势，第2师团步兵第4联队，战斗力已经消耗三分之一。
2. 压制机场的攻击和总攻击的开始，显然要大大推迟。
3. 由驱逐舰运送兵力、弹药和粮食，由于敌机阻碍上陆，大致完成了计划的约二分之一。从登陆点到第一线的供给，只能靠夜间用人力完成，好不容易才送到了三分之一左右。
4. 打开以上战局的策略在于排除万难，坚决用运输船团和舰艇强行登陆，眼下正要求海军实施。

（同上）

连了不得的辻参谋似乎也知道瓜岛的战局并不简单。那么，他到底知不知道他所说的“必胜的信念”是有限度和一定条件的呢？

不管怎么说，第2师团以10月24日为期的总攻，以凄惨的失败告终。“第2师团已无力继续进攻。只好迅速去后方集结，以求重振旗鼓。请把部队的备用粮秣赶紧送到前方，有一点也好，眼下大米比弹药更为重要。”辻参谋向第17军司令部发出了如此凄切的电报。接着，又于30日给参谋总长发出如下电报：

务期必成而断然采取行动的第2师团，经过几天的猛攻，官兵损失过半，终于不得不招致失败。一切责任全在指挥作战的我，轻视敌人火力，至今仍未改变对野战阵地的看法。真是罪该万死。

第17军的参谋半数患疟疾，无法活动，最好免去我参谋本部部员之职，立即任命我为第17军参

谋。

（辻政信著《瓜达尔卡纳尔》）

尽管是秘密发给军司令官的，但也象把他的独断专横描绘在画上一样。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说了诸如“罪该万死”之类言过其实的话，但也就是为了溜到第17军去当参谋。这只能认为是为了遮盖而作的试探性辞呈。

这并非没有更透彻的见解。他从东京出发时，参谋总长给他的训令是：

“9月18日从东京出发，预定前往第17军出差6周左右，担任第17军和大本营的联络，同时协助第17军进行作战。”

如果说从9月18日起的六周时间，等于到了10月底。有趣的是发报日期刚好和这段时间相吻合。这是单纯的偶然巧合吗？装作提出辞呈，实际上是催促返回东京。从他在大本营保有的人缘和实力来看，是可以这么推测。

11月3日，大本营回电称：“辻参谋转调第17军的事未获批准，为了报告战况，可先行回国。”这使人感到推测十分准确。

同一天，辻参谋的直接上司、作战科长服部卓四郎大佐，出现在瓜岛的第17军司令部。

服部和辻是诺门坎战争以来的老搭档。

“我们感慨无量，紧紧地握住了手，默默无言，热泪流到了两人洁白的手和象黑乌鸦的爪子一样的手上。”辻这样说。这里没有夸张。踏上现场的服部大佐看到了什么呢？他给大本营发电称：

“在下昨日到达，在其后的激战中，海军飞机一次也没有来支援，制空权完全在敌人手中。正如上次电文所述，为了加强航空作战，绝对需要增加陆军航空部队。

“丸山兵团作为下一次作战的兵力，几乎心中无底，除佐野兵团外，另外还有一个兵团直接参战，为此，有必要准备1个兵团作为大本营的后续部队。”

这完全是陷入了泥潭才提出的请求。

服部大佐离开瓜岛是11月5日，经拉包尔、特鲁克，11日回到东京。但根据《瓜达尔卡纳尔战记》，他向东条陆相所作的战况报告的要点如下：

（一）敌人同时从地面和空中发动进攻，我们则全然无力。（二）士气处于麻痹状态，更要考虑的是卫生问题，晒不到太阳，发高烧、痢疾、营养失调，第2师团的战斗力下降到了只剩四分之一。（三）粮食十分不足，即使运来，也送不到第一线的最前方。（四）军司令官健在，他虽然说“要干”，但掌握不了第一线的实情。

结论是：“除了投入既定的地面兵力，务必在一个月之内，在布卡、肖特兰、埃斯佩兰斯修建机场，必须从陆军里抽出两个战斗机战队、1个轻轰炸机队。下一次进攻定在1月底。”

情况已不容许修建机场，提出这种看法，只能令人吃惊。而且依然要求不断投入兵力。处在战略、战术核心地位的作战科长，其视察报告简直是敷衍了事，毫无洞察力。

然而，作战科内并不是没有不同看法。战力班班长高山中佐申述了个人的意见：“在丧失航空母舰主力的今天，陆海军基地航空部队不管如何努力，要从距离拉包尔约1千公里的瓜岛上空进行制空掩护，只能使人感到犹如用晒竿去敲打星星一样。必须迅速在拉包尔周围调整好我方防御线，至少要在陆海军基地航空部队的势力圈内和敌人展开决战。”

对此，服部大佐的回答是：

你说的我明白。我在瓜岛滞留期间也曾一度这样下过决心。但后来改变了想法。第2师团确实在苦战之中。伤亡很多，幸存者也很衰弱。战斗力损失了一大半。然而，即使万一放弃瓜岛，又将如何处理在瓜岛的官兵和伤亡者呢？

这些人员的撤退遣送，不是比夺回瓜岛的作战还要难吗？据当地的情报，我方虽然很艰苦，但敌方似乎也在相当艰苦地进行作战。这一点我已经考虑过了。

我们吃苦的时候，敌人也在吃苦。谁能经得起艰苦，就能取得最后胜利。应该树立胜利的信心，战斗到底。

（高山信武著《服部卓四郎和辻政信》）

从这里可以看出争论的基调是“必胜的信心”。这种基调来自何处？服部大佐接着说：

我和辻君现地一起谈论过，他始终很气盛，说吃紧就是机会。现在敌人确信必胜，正在不断冒进。这正是歼灭敌人的时机。

如果日军的反击使敌人放弃瓜岛从而获得成功，那么，敌人就会丧失斗志。我同意辻君的意见。

我并不是反对你的意见，而是现在我们需要坚持。打起精神来干吧。是辻参谋自鸣得意的“必胜的信念”，拖住了作战科长。有人批评说，“那是停在辻的电线杆上的蝉”，指的就是服部。看来并非完全离谱。

《瓜达尔卡纳尔》一书有如下的记述。

11月7日，当战局好不容易出现了稳定趋势时，又收到参谋总长的第二个电报：“为了报告对整个战况的透视，辻中佐应排除万难，暂先速归。”电报的真正意思是一目了然。

几天前作战科长服部大佐亲自视察了战场，刚刚回京，充分地申述了军队的实际情况和对整个战况的看法。尽管如此，紧接其后发出要求速归的命令。真正的用意在于那片“不能见死不救”的父母之心。

辻参谋似乎看出第二个电报包含了参谋总长的父母之心。但是，在辻回国前的11日，服部大佐先行回京，第二天向总长汇报了出差情况。因此，总长的电报是在听取汇报之前发出的，与辻参谋想到的并不吻合。

总之，理解为“不能见死不救”，说明辻是充满了信心的，或是为了掩饰回京而施放的烟幕，以致不知不觉写过了头。接下去是这样写的：

“几千将士作为战争失败的牺牲者被遗弃在这个孤岛上。其直接责任者是我。确实是我有罪。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我怎能置军司令部于不顾，把几千名伤病员扔在丛林里，一个人回来呢。”

尽管如此，但自责“直接的责任者是我”之类的话，这不是蔑视军司令官和师团长么！

好也罢，坏也好，事实上，辻参谋个人的行动是不难想象的。更何况他是独自把“必胜的信念”作为指导思想的，这在前面已经谈到了。”“必胜的信念”露出破绽也为期不远了。

从11月12日开始，为期4天的第三次所罗门海战，充分

暴露了日本海军的脆弱。尽管是随同运输船团进行作战而爆发的海战，但损失了以战舰“比睿”号和“雾岛”号为首的多艘舰艇和全部运输船，日军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14日，11艘运输船（7千吨级）中的6艘被击沉，1艘不能航行。船上的部队约5千人，幸而被8艘驱逐舰救出。

第二天天未亮，其余的4艘搁浅在塔萨弗伦克海岸，士兵强行登陆，但顶不住美军的炮击。只有两千名士兵上岸，运输船被烧，搬上岸的只不过是1500袋（4天的量）大米，260箱野炮和山炮弹药。虽然得到第38师团增援和补充供给是令人欣慰的，但还是遭到了惨不忍睹的失败。第17军东山再起的计划也只能是画饼充饥。

11月10日以来，一直在拉包尔滞留的辻参谋，应该在现场亲自得知了第三次所罗门海战的惨状。他15日离开拉包尔，24日回国，第二天在参谋本部作了报告，语气十分深沉。笔记式的记录，需要判读。现从《真田穰一郎少将日记》中抄录一部分：

首先作为作战班长，要表示谢罪。拉包尔和瓜达尔卡纳尔距离很远，比辻中佐参加过的巴丹、马来亚、汉口、诺门坎的任何一次战斗都要激烈。连怎么把饭盛来，都要竭尽全力。两个月期间内，士兵见不到太阳。按理本月22日以前应有大米，但到23日还没有看到。按估计到的消耗，即使不进行战争，呆上两个月也要减少三分之一的兵力。疟疾、痢疾患者、军旗两面、露骨荒野者数千。所谓不惜付出多大牺牲的心情，就是军司令部人员的心情……

另一方面，围绕瓜岛对船舶征用的争议，在政府和统帅部之间开始露出苗头。进入12月份以来，这个问题就白热化。

了，致使向东条首相口吐狂言的田中作战部长，于7月被罢免。后任为绫部桔树少将。一周之后作战科长也由真田穰一郎大佐接替服部大佐。

用积极主动精神支撑着瓜岛的现状，也是有限度的。这反映在部长、科长的变动上。撤出瓜岛是12月31日的御前会议决定的。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有其微妙的过程。据井本中佐回忆说：

“勇猛的辻参谋所在的第2师团，在进攻不成之后，他于11月12日，从瓜岛发出的电报；11月20日，又回来报告情况。其中就包含了对夺回瓜岛已经死心的真正想法，只是直接说出来的话有所节制。也许认为如果直率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担心会被上司认为是‘软弱’无能吧。”

主张撤退的意见表面化，是在12月25日，新作战科长真田大佐从拉包尔回京之后。但在瓜岛，无数战死病死的人已经遍及战场。野战高炮第38大队队长、瓜岛防空部队总指挥官中村榛三中佐所著《激战》一书，如此记述牺牲了的部下的心事：

现在我很高兴为国捐躯，这本来是男子汉平生的愿望，没有可悔恨的。可是，这究竟是一场什么战争呢？这是一场完全超越战争常识，世上不应该有的悲惨的战争。

既然这种无理的战争还要继续下去，那就肯定在什么地方出了很大的错误，有所失算。希望能够明察，也希望尽力不让这种悲惨的事重复出现，别让人凄惨地死去。这是我们临死前唯一的愿望。

为疟疾发高烧所困扰，因饥饿而痛苦，在炮击打断手脚的活地狱里，他们在如此痛切地倾诉。

瓜岛作战不仅是所罗门海上一个岛屿的争夺战，重要的在于陆海空全部军事力量全面对抗。而战败的意义之所以重大，因为这是太平洋攻防的分界线。从这次失败开始，日军就无法再在太平洋得势了。

第8方面军参谋井本熊男中佐，当时在拉包尔整理了《关于瓜岛作战的若干意见》，最后是这样收尾的：

在大本营内有相当多的人认为，从瓜岛撤退是错误的，应该不惜玉碎杀入敌阵。持这种看法的，既有陆军，也有海军。他们说：“因为养成了撤退的毛病，后来一作战就胆怯，没有斗争到底的气魄。”

总之，这是极不负责任和不知羞耻的言辞。在瓜岛作战中，必须深刻反省，痛感自己负有责任的，应该是当时的大本营。他们计划、指导这次作战，既无洞察力，眼光又短浅，而且不能体察第一线的实情和苦心。许多人都是如此（我也是其中之一）。

（摘自《不能让瓜岛的事重现》）

1943年2月1日、4日、7日，三次从瓜岛撤军，却奇迹般地取得了成功。总人数为陆军约9,800人，海军约830人，至少可以说他们得救了。

在瓜岛登陆的第17军，总人数为军官以下31,400人，撤退前离开病人为740人，除去在瓜岛战斗中损失约两万人，其中纯属战死者为5~6千人，剩下的15,000人左右，是因病倒下的，而且令人吃惊的是，都因为饥饿和营养失调。

据《尼米兹的太平洋海战史》记载，美国陆海军士兵约6万人，战死1,600人，负伤4,200人。日美军对比相差之大，

也就显示了失败的真相。另外，日本海军舰艇和飞机损伤之大，也无法与美军相比。

1943年2月从瓜岛撤退后，辻中佐从作战班长转为陆军大学兵学教官。提出的理由是因病疗养。原先的服部作战科长调任东条陆相的秘书官。这倒不一定是降职。另外，被降职到南方军总司令部工作的田中作战部长，也不是因为要负战败的责任。有人认为他向首相口吐狂言，实际上是为推卸责任而在演戏。

尽管开战以来大本营作战部的“三人合唱组”被更换了，但都不是追究在瓜岛的责任。海军也同样如此，这么惨重的失败却没有一个人负责。从陆海军的情况来看，这种军纪松懈的现象，只能让人对日军产生疑惑。

第17章 打入重庆的演技

1942年11月下旬，从瓜达尔卡纳尔回来的辻政信中佐，在生病疗养之后，于第二年1943年2月调到陆军大学任教官，接着晋升为大佐。当年8月14日，荣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第三科科长，负责后勤和政务。

当时，司令部的阵容是，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总参谋长松井太久郎中将、副总参谋长唐川安夫和落合甚九郎两位少将，汪精卫政府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中将，大使谷正之。

过去的15年，他在第四科任职期间，曾为东亚联盟运动奔走过，有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中将作后盾。与当时相比，现在这个阵容对辻来说，当然有所不足。

汪主席秘密接待他。他去公馆拜访，是到任后的第四个晚上。虽然通过东亚联盟的构想，精神上有过联系，但彼此见面是头一次。而且又是礼仪上的会谈。对总司令部的阵容，主席表示不满。

他们挥笔在纸上进行笔谈。汪写出了总司令官板垣大将、总参谋长石原中将、大使矶谷中将，还有阿部大将、军事顾问影佐中将等的名字。希望以这个阵容谋求与重庆政府的和平，然后引退。

但事关重大，就连辻也难以决定。辻写道：“唯一剩下一条路，阁下可直接会见东条首相，由你们两人作出政治解决。”

汪主席采纳了这个建议，决心会见东条首相。但前景暗

淡。板垣大将于1941年7月调任朝鲜军司令官。至于石原中将，同年3月改成了预备役。而且曾在东亚联盟运动的指导下，就已把东条政权作为敌国。

汪主席不是不知道这一情况，但他竟敢向东条首相诉说，那是很令人费解的。

辻君，非常遗憾。与首相和有关阁僚就各种问题商谈了约两个小时之久，我提出希望只同东条君进行笔谈。

当即得到了同意。在首相官邸的日本式房间里谈了两、三个小时。当谈到那件事时，他突然不高兴，说“关于日本陆军的人事，请你务必少管。”

我很遗憾。感到和这种人没法再谈下去。一切都是命运……

（辻政信著《亚细亚同感》）

然而，对东条首相来说，那也许是强人所难。如果辻是有良知的人，在汪主席提出那件事时，就该尽早忠告。这种看法也许太肤浅。说不定辻正好想借汪主席的嘴，实现自己的愿望。

人事问题似乎确实没有泄露出去，《畑俊六日志》也没有涉及到，但对汪主席的情况作了如下记述：

总之，作为主席，意在就和平问题试探日本政府的意向。对于和平工作，主席尽管有无限的焦虑，但相比之下，更想尽早访问日本。因为和平对作为履行国府政务的主席，是相当大的收获。

另外，关于改订条约，也曾得到撤兵的许诺。而此次改订，不管与重庆的全面和平成立的时期如何，都应付诸实施。因为主席已作出如此相当圆满

的许诺，所以主席此次访日，应该说获得了意外的好结果，因而喜形于色。

好歹向司令官作了一个装模作样的报告。不管怎么说，通过这次访日，可以看出汪主席多么信任辻大佐。

然而，从中国派遣军的统帅和程序来看，还留下了重大的问题。因为不用说军事顾问柴山中将，就连总司令部首脑，都被汪主席视同笨蛋一般。

三笠宫崇仁殿下当时兼任第三科参谋。辻在《亚细亚同感》一书中写道：

有一天，殿下拿来像册，其中收藏了几张蒋介石先生故乡的风景照。说“多么想奉献在蒋先生母亲的坟上……”这也许是神意，是圣旨。便回答说：“我来想想办法。”

大佐参拜蒋介石母亲的灵堂，想借此作为举行日中阵亡者联合慰灵祭的开端。11月24日，在中国佛教中心宁波举行了共同慰灵祭，接着于25日，在蒋介石的故乡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的寺院，举行了蒋母的法事，还在坟地上举行了墓前祭。

过去在满州为张作霖举行葬礼，获得了好评。这次可以说是采取了同样的方法。只是这一回与正在交战的重庆军的统帅有关。辻也许是想谋求感情上的融合。反正这种想法太天真了。重庆军所处的立场并不那么简单。

当然，也不能认为他不了解这种情势。他敢于采取做法事的方法，目的在于显露拿手好戏。蒋介石对此也有所闻，从而在战后大大加以利用。

畑总司令官可能看出了辻的这种企图。但从《畑俊六日记》中找不到记述有关蒋母祭祀的片言只语。

辻自我表现的手法是数不清的，其中最突出的要数亲自打进重庆的工作。

1943年年底的某一天，顿宫宽医生突然来到军司令部。他是上海福民医院院长，在30年期间，为中国人治病倾注了精力。陈诚在他还是中佐的时候，就得到他的照应。重庆班子里的其他巨头人物，都多少接受过他的恩惠，没有不感谢他的。

他是笃厚的老学者，是位仁医。他既不施计策，也不要手腕，除了治病救人，别无其他念头。最近有人来联络说：“重庆的某要人要他赶紧前去。”他正为此不知所措。

“看怎么办好，将和您商量。不知有什么要事。他只要求保证安全。”福民医院院长带来了完全预想不到的福音。真是天不弃我！

“此事再好不过。我当你的助手，给你拿药箱，陪你前去，请尽早做好准备。”（中略）

其后约一个月时间里，为了与重庆方面的联络人商量，进行了具体的准备。

（辻政信著《亚细亚同感》）

辻认为不应失去这个好机会，向总司令部说明了事情的原委，要求与大本营联系。但大本营对顿宫的为人和以往的秘密联系持否定态度。军司令官只是批示：“因为禁止作重庆的工作，所以你进京，只能以个人的立场向东条陆相汇报。”辻在《亚细亚同感》一书对此有所记载。

1944年2月11日，辻乘飞机去东京，在首相官邸的日本式房间里，会见了东条首相，请求准许打入重庆。这原本与畑军司令官的意向背道而驰。

以我这种身份决定和平条件，当然不可能。只是想挺身赴重庆，弄清对方的真意之后，根据所得结果，再回来陪同阁下前去。

国家的命运，应由首相直接会见蒋介石来决定。最坏的情况，也许会把我拘留。那时，就抛开以往对重庆的幻想，专心与南京合伙，立即向重庆进攻。

（同上）

这里没有提到和平谈判的方针和条件。只是隐隐约约地看到他想打入重庆的那种胆略，从而获得大家的喝彩。东条首相也答应说“好吧，试试看。”真象是哄小孩一样。

这并非因为东条和辻之间有亲密的感情。东条首相得到杉山参谋总长同意后，甚至把这个想法上奏了天皇。只有陆军次官富永恭次中将传话说：“必须把主管重庆工作的主任柴山中将传来，听取他的意见。果断实施的日期以后再作指示，请暂时等待时机。”这使辻稍感不安。

自不待言，被大本营召回的柴山中将，把辻打入重庆的事看成了鲁莽之举，加以反对。中将回到南京，由总司令部给陆相、总长打了电报。

“柴山中将回京后，即向汪主席弄清真意，主席表示反对，总军认为可停止辻的工作。”

难得的打入重庆工作，可悲地失败了。1944年2月22日的《畑俊六日志》把这一幕作了如下的记述：

重庆方面驻上海的某间谍，来到驻上海的项营处，说过先来一趟重庆，看看情况如何再定的话。辻大佐通过某人打听到这件事，很信任项营，打算作项营的随从，打入重庆探听情况。重庆方面有个

叫郭光庭的掇客也参加过来，事情进展十分顺利。

驻上海间谍希望项营把辻大佐作为随员带入重庆，不知重庆方面意下如何？重庆方面对此表示认可，途中也可予以保护。对此，辻越发得意洋洋，无意中在与此并无联系的缪斌处取得了联系。

当月9日，辻越发得意洋洋，来到我处征求同意。我回答说，光是这些条款难以同意。辻说，那就暂且作罢。但又作为小道消息，说上京时报告了大本营，并得到了认可。答应对此不会有异议。辻是为联系与兵站有关的事，10日进京的。

（主要目的不在于兵站的事，而是为了这一工作。1月上旬又提到与项营的事时，辻说向三笠宫殿下谈到了此事，殿下对此很有同感。）

由于辻进京，大本营命令柴山中将紧急进京。记得柴山大概是在11日进京的。东条首相征求他对此事的意见，柴山坚决反对，但回答说，是否执行，完全取决于首相的决心，我等待这一决心。正如首相与参谋总长商谈过同意等待时机一样。

首相、总长曾一度被辻所打动，如果本来就没有信心，那就因为是柴山的意见才打消了那个念头。辻在回来的报告中提到，如果汪主席能够谅解，就应实行。但柴山的报告，只提到应等待时机实行，没有说到汪主席的谅解之类的话。

（据说辻昨天擅自会见主席，秘密商谈此事。这样做很难说是妥当的。）

《日志》的这些记事，内容是真实的，和以感情影响读者的辻的记录截然不同。这就象照妖镜一样，照出了辻的言行

和邪术。倒也怪有意思！

那么，汪主席对重庆工作的看法又是怎么猜测的呢？从下面提到的他与柴山中将的谈话就看清楚了。虽然这是汪企图抢头功的工作，但实际上只不过是理想主义者的狂态罢了，2月23日的《畑俊六日志》证明了这一点。

柴山中将回来后，很快就和主席面谈了汪这方面的工作，主席对首相说的目前不是时机的看法，也表示同意。日本如果认为现在与重庆谈判尚有余地，那是错误的。据我方所得的重庆方面的情报：重庆正为当前的国际形势所困惑，毋宁说希望日本失败。英美为了与苏联对抗，毕竟顾不了远东。而中国为了自立更生，日本反而成了它的障碍，所以希望日本失败的气氛很强烈，汪大佐即使去了，也会蹈赫斯的覆辙，何况赫斯还是副总理，而汪只是总军的一个科长。

柴山中将还说，按照汪的希望，给蒋介石带去了书信，如果东条首相写信给蒋，那么自己也应该给蒋写信。

这样一来，汪不仅在畑大将等总军首脑面前，就是在汪主席那里，也失去了面子。这只能说是自作自受。汪在《亚细亚同感》一书中写道：“1944年2月，是尝试最后决心的唯一机会，阻止这么做的是一群与中国有关的人，也是自己无能，没有和他们取得妥协。”

是不是“唯一的机会”，很值得怀疑，但说“自己无能”，这应该说确实如此。

预定以1944年5月为期，决定军队不再干预政治、经济。

但骤然间，上海经济界发生了混乱。随着物价暴涨，物资紧缺，大使馆已无法收拾。这个问题的原委，5月11日的《畑俊六日志》有所记述：

由于大使馆无能，收购大米的事未能如愿。军队不得不直接干预。我方商界、大使馆、经济顾问，阳奉阴违，向东京散布种种谣言，致使大本营认识不足。经济顾问在职期间，发生了青木、石渡之流造成的不愉快事件。

动不动就指责军队过火，东条也为这些人的言论所打动，为此，正如大本营希望的那样，军队不再干与，从5月开始，军队全部撤出，并通知了大使馆……

过了一年的6月18日的《日志》是这么记述的：

次官（富永）来电，用的是从未有过的极其郑重的语气。这一点显然意味着所谓要从经济方面撤出，就是不要干预储备券问题和振兴华中的内部事务，也就是说跟以往一样，作为后盾，要给大东亚省和国府方面以强有力的支援。

可是，极据这两天来的形势，大米问题非常严重，加以处在青黄不接时期，大米的储备量少。军队外出虽有所获，但没有起死回生的妙策。这种时候，只能慎重行事。

这显然修改了前面所说的话，恳切要求派遣军给予协助。担任后勤和政务的第三科科长辻大佐，对此又持什么态度呢？

胜负确实在此一举。本来应该老老实实改掉乖僻，收剑入鞘。可是生来有爱争吵的毛病，没法温

顺地服从别人。于是亲自起草了如下内容的电文：

“收到大臣来电。军队按来电精神支援大使馆实施计划。已经到了今天这个状态，应把失信于中国民众的外务官僚推到前面去遂行道义政策，可惜已无信心。不如说，希望在这个时候，大本营要促使废除大东亚省，让大使馆在纯外交范围内进行活动，采取把一切事务都委任给军部，推行一元化领导的彻底对策。”

把这个意思的电文交到参谋长手中。参谋长没有轻易盖章，只是说：“喂，东京已经让步了，能不能稍加润色，改写得缓和一些，再行发出。”

（辻政信著《十五对一》）

一看就知道草拟电报的人是谁。他坚持原文照发。这和过去在诺门坎对抗大本营的态度非常相似。这种下克上的作法，并没有就此收场。

7月3日，陆军省来电，“任命辻大佐为33军参谋”。第33军是在战云密布的缅甸北部紧急编组的军团。他作为被视为异端分子的第三科科长，倒也十分相称。但只在位11个月就结束了这一职务。

第18章 缅甸战线的无赖之徒

1944年7月10日，辻政信大佐到达座落在缅甸明妙的第33军司令部。英帕尔作战以惨重的失败告终。7月5日，缅甸方面军命令牟田日中将的第15军停止作战。缅甸战线孕育着凄惨和紧张，处于崩溃的前夜。

作为军的高级参谋，眼下还有白崎嘉明大佐在位。自不待言，辻大佐因此而没有被聘为参谋。军司令官本多政材中将说：“原以为你是中佐，那就在白崎手下当作战主任。”尽管如此，辻倒也没有什么不满。

从中国派遣军调出来，这就是大本营所作的人事惩罚。说他死了心，也未免太早。辻参谋不是那种就此气馁的人。相反，他如鱼得水，立即奔赴前线，来回视察。

盟军的作战目的是打通从印度往云南的雷多公路。日军进行新的作战与之对抗。是选择通过布索谷地的密支那战线，还是通过昆明去云南方向，这是第33军面临的问题。

辻参谋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他主张：“回过头来考虑原来的打算，作战的重点当然在云南的正面，必须下决心牺牲布康方面。”就这样权威似的定了下来。从而改变了横穿莫冈、加迈地区的计划，以拉孟、腾越方面为主，与云南远征军对抗。

这被称为“断作战”。接着于7月25日，军司令部从明妙北移到新威，这也是根据辻参谋的强硬建议定的。

尽管日军以泣鬼神的姿态英勇作战，但“断作战”并没有

使战局好转。8月初，从密支那撤退，进入9月后，拉孟守备队于10日，腾越守备队于12日相继玉碎。

尽管如此，云南远征军也是反复总攻了6次才达到这一步的。从蒋介石总统9月9日向全军颁布的以下训电，也可看出苦战的程度。

“我将士必须以这次完成命令、直到日军松山守备队（拉孟守备队）和密支那守备队孤军奋战到最后一兵一卒的战斗为典范。”

第33军高兴地监听了这个训电。这促使本多军司令官为此给蒋介石写了亲笔信。这是在司令部从芒市撤退时发出的：

“本人奉职于缅甸北部战场，与阁下的精锐部队作战半年，在此期间，亲眼目睹阁下的将士在各地英勇奋战。我站在同是东方人的立场，特致以衷心的祝贺。由于战略上的需要，特将芒市奉还。在此谨向麾下7万阵亡英灵，致以衷心的哀悼。”

书信是用日文写的。同一封信里还有辻参谋的亲笔信。

我只不过是一介参谋。没有直接向蒋主席写信的资格，但在南京工作期间，曾作为三笠宫殿下和畑之帅的代理人，把祀奉蒋母时的8张照片保存在篮子底下，在这激烈的战场上，已处在不知何时了此一身的境地。

据说主席很有孝心。值此撤离芒市之际，谨奉上这些照片，请人转交主席。

（辻政信著《十五对一》）

书信的日期是11月19日，是写给在昆明的云南远征军司令官卫立煌上将的，由被释放的日军俘虏恩义章中尉送交。

给正在流血激战中的敌军将领写亲笔信，再想想寄信人

的立场，这种亲笔信多么超越常规，这是无需多言的。

然而，辻参谋却自我吹嘘说：“面对敌军将领的奖状，尽管我在战斗，却也爱上了敌人。不断赞扬敌人，这是在近代战争中发挥战国时代的武士道精神。”这种显示欲望和护身之策真是了不起。在军司令官的亲笔信里附信，对辻参谋这智深谋远虑，我只有感到惊讶。

他的真正目的在于奉送照片，即使被敌军将领看作献媚讨好，也无可奈何。这也可以说是在南京时代，为与重庆和谈而奔走留下的后遗症。尽管如此，“一介参谋”居然如此大胆。这在整个陆军中也许没有第二个。

“断作战”从一开始就是顽抗到底的作战。敌我战力相差很大，已经无计可施。尽管牺牲了可以瞑目，但在牺牲之前必须坚持战斗。这里对军首脑不负责任的做法必须追究。

就在那种情况下，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木村兵太郎中将于1945年2月13日，在方面军战斗司令部，把个人奖状授预了辻参谋。

在1944年7月以后的新作战期间，作为帷幄参谋刻意补佐长官，以奇策纵横、勇猛果敢，击退众敌，十分有利于整个作战。

特别在作战处于重大转机时，经常以身作则，站在战斗的要害处，亲自进行指导，打开僵局，不屈不挠地完成重任。

总之，大佐的崇高人格和尽忠至诚之心，迸发出了激昂的斗志和勇猛的精神，诚为全军幕僚的楷模。

授予阵亡者个人的奖状很多，但授予幸存者却很少。但

从字面来看，其中列举的功勋，显得多么抽象。

看看个人奖章的实例，说的都很具体，详细地记载了其人的战斗经过和功绩。而辻参谋只是参加了帷幄策划，也许难以表达得那么具体。不过，即使限于“奇策纵横、勇猛果敢”之词，也必须作为其长处加以承认。

辻参谋曾一度加以拒绝，但最后还是接受了。

“使人感到真象是独自盗取在（断作战）中送命的几千英灵的功绩。甚至感到象是勉强去抢似的。”辻如此作了追述。总之，他自己感到羞愧。

奖状没有通过他的直属上司第33军司令官，而是方面军直接授予的。反正这珍贵的奖状，不久便被撕掉烧毁了。

随着云南正面的败退，缅甸中部的战局也在吃紧。败逃的第15军和处于优势的英印军打了起来。从第33军中抽出第18师团，并派辻参谋前去增援。这是方面军田中新一参谋长的指示，辻参谋也表示同意。

辻参谋回到锡波的第33军司令部，得到了山本参谋长的同意，但本多军司令官怎么也不答应。

“你得到奖状遭到全体军官的忌妒。如果我是第15军司令官，就会表示拒绝。因为如果仗打好了，就说是辻干的，仗打坏了，则是军司令官的责任。不管怎么说，我不同意你去。”

其中夹杂着两人对奖状的看法。从辻参谋来说，因为获得了奖状，所以希望勇敢地挺身前往激战之地。而从本多军司令官来说，作为直属上司，很想把人留在身边，更多地加以使用。

本多军司令官的话是在这种对立中添油加醋：“你获得个人奖状，遭到全体军官的忌妒。”这话触痛了辻参谋的神

经。之所以把难得的奖状，用自己的手使之变成灰烬，暗中就存在这种情况。

辻的不服，并非到此为止。他把自己的印章、红印泥全摆在自己房间前的桌子上，贴上“谁用得着，谁随便盖。”的字条，这是用盖印示威，向军司令官表示抗议。

对此，军司令官只好认输，勉强同意辻参谋的请求。就这样，第18师团和辻参谋于2月25日调到了第15军。在25天的短时间内，他又回到了原来的位子上。

这与在马来亚战线强迫改变作战计划，使军司令官和幕僚大蹙眉头，手法是相同的。山下军司令官叹气说：“是个刚强自负的小才。”可在这里，同样使本多军司令官为之恼火。

幕僚的任务究竟是什么，1932年陆军大学编纂的“统帅参考”是这么说的：

“幕僚的根本任务是从各种压迫中解放将帅的精神，确保其意志独立自由，协助其充分发挥将帅的能力，完善其将德，从而发扬统帅的权威。”（大桥武夫解说《统帅纲领》）

与这一任务相对照，在对军司令官的态度上，奖状上说的“全军幕僚的楷模”，不是相距甚远么！

尽管有这种性格上的缺陷，但仅就其勇猛果敢而言，在实践中还是发挥了长处的。只是其残忍和强暴，在缅甸战线上依然没有减弱。

原缅甸方面军参谋金富与志二少佐，战败后在西贡接受美军审查时，曾被追问过辻政信这名战犯。最后那位检察官告诉他说：“你也许知道，但你要包庇战友，这是可以想象的。然而，有一位将军这么说：即使对战犯的搜捕被切断，

辻所犯的人道上的罪行，也应该永远追查下去。”

这里所说的“人道上的罪行”指的是什么呢？

片仓衷少将从士官学校事件以来，就与辻交情非浅。他在缅甸任第33军参谋长，在明妙的病床上与到任的辻参谋曾见过面，1944年7月16日，离开明妙经仰光回到东京。

他在任1年另3个月，对缅甸战线的情况很了解，在谈到辻参谋时，他是这么说的：

“辻在临近结束战争的缅甸战线上，曾经说过：为了培养凌驾在敌人之上的勇气，要以英国士兵的生肉供食用。

（中略）不管在怎么恶斗的战场，既然是参谋，那就不仅自己，连让他人这么做，作为人，我也是不能饶恕的。”（片仓衷著《侍大将现场消失》）

随军记者也传出芒市有这种谣传，但是从片仓少将这样的人嘴里说出来，那就严重了。为了编写此稿，我会见了片仓少将，想证实上述谈话的可靠性。对此，他的答复是这样：

在第33军司令部，照看我的关本少尉，战争一结束，就在越南兵站医院剖腹自杀了，我才知道他是怕被追问辻想试吃人肉的事而自杀的。

与辻在同一个司令部工作的参谋N少佐（名字保密）战后来看我，详细地谈起了这件事，所以不会有错。

我想起在关东军的时候，他说不准吃匪贼的胆，否则，连司令官都要追究责任。如此言行不一，我只有感到吃惊。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的残暴行径也是惊人的，但好象没有试吃人肉的事例。纳粹的罪行是超越人的界线的，

甚至可以说，那是由机械的人干的。

相比之下，残杀华侨，试吃人肉，与其说是有组织的，不如说是特殊人的野蛮行径，其与人性的关系是发人深思的。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纳粹的残暴行径中看不到的残忍，却在辻身上散发出了强烈的臭气。当然，这与正常的精神和感觉完全无缘。在这种精神的延续线上，可以看到以下三个强制自杀的例子。

1944年7月12日前后，本多军司令官发来密电：“水上少将应死守密支那。”电文是“水上少将”，不是“水上部队”。水上少将就是密支那守备队长水上源藏少将（死后晋升中将）。

少将对此的回电是：

- 一、谨受领军的命令；
- 二、守备队将誓死确保密支那。

此时，少将的心头似乎已经闪现出某种决心。在他身边的中尉军医丸山丰的手记，抓住了他此刻轻微的心里活动。

眼看临近战死，不知是南方军总司令官，还是更高的上级，发来了密码电报：

贵司令官特晋两级军阶。

在水上少将这一光荣的背后，阁下可以看出有一种令人寒心的用意。阁下的心中已斩钉截铁地下了决心。他看后微微一笑，说：“来了一个奇特的祭典。”两天后，又来了电报：

今后将以军神称呼贵司令官。

这里可以看出称作军神而采取的手段。阁下又

一次微微地苦笑，说：“送来了奇特的悼辞！”却没有说名誉和武人的夙愿之类令人败兴的话。这就是我们所信赖的阁下。

（丸山丰著《月白之路》）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给“水上少将”的电文起草人，就是辻参谋。据第33军参谋野口省己少佐回忆：

“这是后来辻大佐自己说的。他说，诺门坎事件时，就曾为处理从战场上逃脱的士兵而感到为难。只要命令“水上少将应该死守”，严谨的少将就会了解军部的用意，从而尽力去达成目的。万一到了最后关头出现逃脱者，也可把这些人看成没有违反命令。”

然而，即使水上少将作为守备队长，也没有理由命令他个人死守。这只能说是一反常态。

更令人吃惊的是“特晋两级军阶”和“以军神称呼”等的电报，即使战后进行调查，也没有找到正式记录，发电人也不明确。至于“军神”之类的话，与其说是恶作剧，倒不如说意思的幼稚。也许是“断作战”起草人的责任感，产生出一种负罪意识。

发电报的地点因为是在芳顿，看来可能是辻参谋任意发出的。在诺门坎事件时，他就有假借军司令官的名义拍电报的前科。

7月25日前后，部下丸山房安大佐想出一个主意：与其在密支那市区等待“玉碎”，不如渡到伊洛瓦底江东岸去，凭借马雅高地进行作战。

守备队长是水上少将，但指挥实权掌握在丸山大佐手中。少将所辖增援部队的兵力，只有以步兵1个小队，炮兵、工兵各1个中队为基干的一支小部队。而且丸山大佐是第16师

团联队长，水上少将是第56师团的步兵团长，他们都直属第33军。由于有这种情况，所以指挥没法统一。

水上少将之所以对丸山大佐的进言没有大胆提出异议，就因为这些事纠缠在一起。不管怎么说，水上少将一行人决定从市区撤退到达了伊洛瓦底江江心的农他洛岛。当迎来8月4日的朝晖时，在森林里躲避轰炸的水上少将自杀了。这里引用丸山手记中的要点：

阁下背靠一棵笔直耸立的大树，地面上支着轻便帐篷。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旁边有两名勤务兵服侍着，突然听到了枪声。我一时没有想到“又有人自杀”，但紧接的一瞬间，我马上意识到刚才的枪声，正是从阁下那里传来的，于是象被弹出去似的，直向那里奔去。

阁下面朝东北方，就那么坐着，已经是奄奄一息了。从公文纸没被淋湿这点来看，大概那时雨已经停了。纸上用铅笔写着下达的命令，而且画了押：

命令密支那守备队残存的官兵向南方转进。

这是反过来利用“水上少将”的措词，表达了少将的积极意志。第一次上海事变以来，日军只许“玉碎”，决不容许部队在竭尽全力之后投降。光是玉碎也许不能算是武士的道德！总之，如果是注定失败的战斗，应该有一条用一死以拯救众多将士生命的道路。

这不是少将偶尔产生的感伤或是灵机一动。人们早就称他是“云南的乃木^①”，受到官兵的敬慕。这无疑是他人格

注① 乃木系指乃木希典大将，日俄战争中攻占旅顺的指挥官。明治天皇死时，他剖腹自杀殉葬。

发放出的最后光辉。

战后1953年8月7日，从山梨县盐山开往甲府的车中，坐着昔日的辻参谋（众议院议员）。据同行的有贺茂先生（旧日川中学第25届毕业生）回忆，辻在日川高中校园前面说：

“阁下象是被我杀害的，实在抱歉。请按我《十五比一》书中说的，来体察我的心吧！”

据说，辻谈到少将出生的盐田部落，就深深低下头来，双手合十，嘴里说“真是对不起阁下。”从他的眼里，似乎可以看到以军司令官的名义起草“水上少将”电文时内心的矛盾。

其次是水上少将的副官堀江屋保中尉，对少将的死也伤透了心。少将的遗骨以及军刀、肩章、手枪等，由8名部下分开带回，堀江屋中尉也是其中之一。少将自杀后一个月内，在热带丛林里经过艰苦跋涉，才到达芒市的第33军司令部。

然而，他却遭到等在那里的辻参谋的斥责，甚至暴力相加。

“你既然是现役军官，但为什么不追随水上阁下自杀！”

这是不理解少将的心情，强迫别人做无意义的自裁。要堀江屋中尉活下去的，是水上少将；而要杀掉他的，却是辻参谋——这里产生了鲜明的对比。这时，手足无措的中尉想要剖腹，但遭到其他军官阻拦而未成。

那么，关于这个中尉，《十五比一》一书中是怎样叙述的呢？

“水上少将的遗骨由5名部下分别保存，连军刀、图囊等也由他们分开存放。他们分成陆路和水路，下决心哪怕只

有一个人，也要平安返回，把遗骨送到。他们多次遭到袭击，好几个人都牺牲了，最后其中的一个副官历经九死一生，终于到达了军司令部。”

这该如何理解水上少将对堀江屋中尉的怜悯之情和堀江屋中尉的实际言行呢？水上少将对中尉的思念是多么深厚。

在八莫附近，有一个全都是从密支那和布康逃脱的士兵中的伤病员组成的健康兵训练所。

辻参谋让堀江屋中尉当他们的队长，派他们前往明知前去必死无疑的云南战场木康。堀江屋中尉于当年11月7日战死。

（野吕邦畅著《死守》）

强迫别人无谓的战死——这只能说是一反常态。

第三是龙陵守备队长小室钟太郎中佐的自杀。1944年9月18日傍晚，他在兵营里剖腹自杀。最后是这般情景：

“你把我的头砍下来。”他对土生副官说，

他只说了这么一句，便快步走到战壕高处的小院里，正襟危坐下来，一副很沉着的姿态。土生大尉想与师团联系，但来不及了。雨静静地在落，黄昏临近了。

他敞开军服白上衣的前襟，反握住军刀，向左腹浅刺进去，然后横着切开。“土生！你在磨蹭什么！”他大声呵斥。土生大尉面对中佐低下了头，就那么向右移了移，站到小室中佐的左侧，举起了自己的军刀。

（品野实著《异域之鬼》）

强迫别人自裁，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残忍的。

拉孟、腾越已经全军覆没，军主力向芒市撤退，光丢下了龙陵守备队。小室中佐尽管接受了以微弱的兵力“坚守”龙陵命令，但他原本是工兵联队长，部下也是拼凑起来的，而且其中还有许多伤病员。

他们终于在惨烈的战斗中支撑不住了。这样下去只有全军覆灭。14日夜，小室中佐终于作出决断，下令放弃龙陵，并开始破坏重要的资材。对此，第56师团参谋永井清雄中佐这么说：“一定是官兵的孤立感变成了有言无言的压力，逼迫小室中佐这么做的。”关于这一点，川道参谋长也劝过中佐。

不久，中佐打消了撤退命令，据说他颇有感慨地对副官说：“我为什么这么软弱呢？”不过，品野实先生这么描述了真相：

从别处传来的撤退情报，使师团和军的参谋们骚然不安，与守备队本部重新取得通讯联系，又遭到大声指责，还使用了“抗命”之类的用语。但“抗命”之类的说法，并没有动摇土生副官（甚五大尉）的心。

守备队虽然稍许作了后退，但还在龙陵。军的命令也不是“死守”，而是“坚守龙陵南方高地一线”。他们遵守了这一命令。

那么，为什么会受到这种训斥呢？……小室中佐派来的联络员到达之前，光是夸大传播了撤退的事实，具体情况并不清楚（关于这一点，小室中佐的处理是欠妥的）。

不管怎么说，事前没有和我们取得联系，这是无视参谋部的权威，应该充分考虑到这种感情上的

愤怒产生出的后果。而当时掌握参谋部的气氛的，就是辻参谋。

（品野实著《异域之鬼》）

当时，土生副官收藏着小室中佐的日记。品野先生接着解释了这一情况：

9月17日 雨 宪兵队 前往芒市之事。

日记一切从略。这一天第33军参谋部作了严厉的训斥。接受军的指令的宪兵队，通过安部参谋传达命令说：“到芒市来一下！”辻参谋也打来电话，用“抗命”、“提交军法会议”等严厉的口吻进行训斥。

收听电话的工兵联队通讯班长根忠夫军曹（长崎县对马严原町人）对土生副官说，他听到辻参谋说：“给我去死！”

只要有自杀的地方，就会有辻参谋的影子。有意思的是，过去在诺门坎事件时赶去打扫战场，了解作战真相的，正是小室中佐。也许辻参谋想把此事掩盖过去。不管怎么说，那种训斥人的做法，是带有感情色彩的。

1945年2月26日，辻参谋前往设在米约沙部落的第15军司令部任职。在第二天的幕僚会议上，主攻点是放在伊洛瓦底江还是放在密铁拉，成为争论的中心。由于辻参谋的主张，改为密铁拉。真是一语定音。军立即将这一方案电告方面军。

然而，方面军的回电是：“密铁拉之敌不足惧。不应因战场的波澜而大喜大忧，贵军应下定决心，为‘盘作战’（即伊洛瓦底江会战）而勇往直前。”第15军对此没有同意。他们不顾方面军的意愿，继续推行既定方针。

这终于打动了方面军首脑，2月28日，田中参谋长也只好按第15军的方案进行指导。自然，13军的这种强硬把戏，没有辻参谋是做不出来的。

尽管作了这种努力，缅甸战局仍然益发吃紧。3月18日以后，连本多第33军司令官也西进去指挥夺回密铁拉的战斗。以此为契机，辻参谋也返回了第33军。所谓“只当了20天的临时工”，指的就是这件事。

要夺回3月3日失陷的密铁拉，决非易事。不仅如此，伊洛瓦底江会战也不得连连败退。从4月23日到27日，以木村军司令官为首的方面军司令部撤出了仰光，在敌人面前开始向毛淡棉逃跑。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辻参谋转到第39军任参谋。5月31日，他是在比林（锡当河口东）收到电令的。然而，这是伴随缅甸战线崩溃而来的调动，没有特别的意义。

给敌军将领写亲笔书信，获得个人奖状以及围绕这事产生的麻烦、食人肉的暴举、各种各样的强迫自裁，如此等等，就是缅甸战线上的这位辻参谋，那个无赖的姿态表露得如此淋漓尽致！

第19章 投降·逃亡·倾诉

1945年6月5日，辻大佐前往曼谷第39军，就任作战主任参谋。到任后，立即加强了作战准备。

目的是为了“加强曼谷周围及内部的防御设施，防范泰国军队的叛乱于未然，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曼谷守备部队面对优势的敌人，孤立无援，至少也要确保战略要地三个月。”到了7月上旬，紧急工程告一段落。

接着于7月15日编成了第18方面军，任命中村明人中将为司令官，辻大佐为高级参谋。辻到曼谷就职不久，来了一名泰国军官。他是阿兹·查林锡尔巴少校，是辻担任士官学校中队长时的学生，现在成了泰军参谋本部的骨干。11年后重逢，双方都很激动。

他还与另外一个人邂逅，这就是泰国的年轻总理阿派旺。阿派旺对日本宪兵跟踪表示愤慨，向中村司令官和山本熊一大使提出抗议。日方接受了抗议，派辻大佐前往道歉。他凭着一张能言善辩的嘴，加深了阿派旺的信赖。

辻大佐还兼任报道部长。那时，作为应召少尉在报道部工作的，是电影导演吉村公三郎。他谈到了临近战败时，8月10日中午的一段插曲：

刚走出军官俱乐部，一个在大使馆和司令部做情报联络工作的青年骑车过来，递给我一份英文的复印件，说：“不好了！刚才收听到旧金山广播的消息，说苏联已经参战，并突破了苏满国境。我急忙

跑进辻参谋的房间，报告了这一情况。大佐一听，大声说道：“什么！这种时候会有这种混账事情？”

（辻参谋也许不以也然，认为苏德战争中，苏联已疲惫到了极点，尽管胜利了，也没法再出兵。）你是被敌人的宣传吓昏了头了吧！胆小鬼，我宰了你！”

说着，伸手就要拔出军刀。我心想挨一刀可不得了，连忙往外跑。随即又在门外喊道：“我先去同盟通讯社查一下。”说着，象逃跑一样跳上了摩托车。

可能听到了摩托车的声音，分社长在同盟通讯社门口迎接了我。他向走上前去的我举起了双手，意思是“都投降了。”似乎刚才的消息已经传到了这里。

我不想挨辻参谋的臭骂，立即用通往司令部的军用电话叫出了参谋：“喂喂，我是吉村少尉。我刚刚在同盟社查过……”我正想往下说，“不用报告了！”对方咔嚓一下挂断了电话。看来，司令部已经收到了通报。

我仍然很生气。回到司令部，便乱敲作战室的门。辻参谋把门只开了一条缝，露出脸来。看到我，便不耐烦地说：“我不是说知道了吗。”声音与刚才截然不同，变得微弱多了。他说完从里面啪地把门关死了。

（吉村公三郎著《这人那人》）

因为是历史性的一瞬间，辻参谋也是心乱如麻。接着传来了准备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消息。辻参谋狼狈到了极点。

在曼谷大使馆负责宣传工作的西野顺治郎先生是这么描述当时情景的：

同盟通讯社海外电发布了这条消息后，11日曼谷各家报纸都对此大加报道，当时曼谷的日本大使馆，根据日泰同盟的精神，在泰国宣传局的协助下，对报道实行了管制，但同意同盟通讯社的电文无需检查，可以登载。

方面军司令部看到11日的晨刊，大为吃惊。参谋辻政信大佐立即驱车前往布隆吉特路的大使馆，大声叫道：“使馆人员中有国贼，交出来！”

他弄清了确实是东京发出的同盟社电之后，又返回来，向南方总军司令部驶去。

（西野顺治郎著《新版 日·泰四百年史》）

当天，他乘飞机飞往西贡，到达已经迁到大叻的南方总军司令部，申述了意见。自不待言，他是反对接受《波茨坦宣言》的。他要求去东京披沥自己的想法。但已决定由作战科长栉田正夫大佐进京。辻大佐被冷淡地拒绝了。

设在西贡的第38军司令所所长林秀澄大佐，一直把辻当作兄长。11日晚10点，他去辻下榻的旅馆拜访。后来大佐向我们谈到了那天夜里辻的神态。

他想去满州指导关东军作战。还坚持自己的主张，说不应该接受《波茨坦宣言》。林大佐说：“因为东京已认识到战力已经到了极限。这话毋宁说为时已晚。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文书，不是一般的外交文书。我认为为了避免遭受更大规模的原子弹攻击，才接受《波茨坦宣言》的。”

当说到原子弹的威力时，他从椅子上滑落下去，敲着地板哭叫：“总军混蛋……连原子弹的原文都没有提到。总军

混蛋！”深夜，在旅馆的一个房间里大哭大叫了好一阵子。

过了一会儿，他死了心，认为不得不接受《波茨坦宣言》。但又问道：“日本投降后，谁是东亚的盟主？”还问：“真的是蒋介石吗？”

“那是当然。不过，您也知道，还有赤色的毛泽东。战争结束之后，蒋必须立即讨伐毛。我们应该援助蒋的反共作战。”林大佐缓了口气又说：“那么，辻君，去重庆吗？”对此，辻爽地答道：“去！”

辻潜入重庆，虽说不是这次谈话决定的，但在迂回曲折之后，最后的结果却如同说的那样。他收回反对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意见，肯定是林大佐说服的结果。两人一直谈到夜里3点。

《波茨坦宣言》由13项条文组成，其中第10项内容如下：

我等无意奴役日本之民族或消灭其国民，但对所有战争罪犯，包括虐待我俘虏者在内，将从严惩处。”

尽管加有重点的部分在报纸上发表，其他部分没有公开。但辻政信之类的高级幕僚是不会不知道的。

看来，反对接受《波茨坦宣言》，并立即奔往南方总军司令部，都与此项有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也可以说他为此而焦虑。

对于回到曼谷的辻参谋，西野顺治郎先生接着这么说：

他以与前几天截然不同的态度出现在大使馆，请求说：“恐怕我将被作为战犯逮捕，我现在想躲在这里，就战后问题与中华民国首脑会晤，所以希望成为大使馆的一员。”

然而，作为大使馆来说，是不能让有军籍的人

突然变为大使馆人员的。（中略）于是劝他去瓦特·利雅普寺（存放日本人骨灰的寺院）出家。

加有重点的部分正好表现出辻的打算，逃亡的方式就这么决定了。关于这一点，当时的军司令官中村明人中将作了有趣的回忆：

那是8月14日早上，花谷参谋长陪辻参谋来到司令官室。参谋长就当前形势判断作了如下报告：

“虽然还没有接到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公报，但现在只有当作既定事实了。如果无条件投降，各地就要解除武装。也许各地都会发生骚乱。

可是，所有的通讯联络都被敌方控制，因此友军的情况一概不明。就象在黑夜里瞎着眼睛工作一样。今后日本军队干什么好，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然而，为了今后日本重新崛起，正确认识战败后的变化，是国家百年大计绝对必要的。

从这一考虑出发，我想让辻参谋，加上若干青年军官，长年潜入地下。已经得到总司令部私下应允，现请司令官裁决。”

让辻参谋潜伏下来这件事，作为军司令官，我虽然是第一次听说，但看来参谋长和辻参谋决心已定，不可动摇。我问参谋长：辻参谋今后的身份怎么办？辻参谋立即说道：“姑且作战死处理吧！”

“所谓战死处理，是不是正式报告大本营？”

“是这样。”“事情很重大。不过，既然总军同意了，如果辻参谋确信可以做到，那就着手实行吧。”

我回答道。

那天夜里，辻参谋起草了给总军和大本营的绝密电报，我签了字——象预定的那样，辻参谋等到任了，他们被作为战死者处理。

（中村明人著《慈悲的司令官》）

从辻参谋知道战败以后的言行，可以轻易地看出逃亡计划是他自己导演的。这里出场的花谷中将在曼谷到任，尽管比辻晚了一个月，但在野蛮和残忍方面却是公认的。

他与辻从关东军第三科以来就有联系，没想到现在却成了参谋长与高级参谋之间的关系。而且辻已经完全驯服了花谷。辻已经显示出了可以压制参谋长和军司令官的那种实力。

另一方面，逃亡计划本身也在稳步而顺利地向前推进。

“日本的投降已是必然的趋势。我已决定从现在起的20年里，潜入泰国去作和尚。所以我想从你们当中选两三个人结伴而行，不知意下如何？”

辻参谋这么说。对方是接受过情报训练的科班出身的见习士官，都是些和尚。自不待言，投降是可耻的，不过来到佛教之地泰国，作为和尚修行，也是有意义的。当中只有一个因家庭情况脱离了大伙，中岛节也等7人全都答应了辻参谋的请求。

僧侣打扮的7名见习士官告别曼谷的方面军司令部，是在天皇宣布投降的8月15日夜。他们心灰意冷，一边望着南十字星，一边沿着电灯已经熄灭的两公里街道快步走去。要去的地方是位于湄南河畔的瓦特·利雅普寺内的日本人骨灰堂。

寺院的正堂在英军的轰炸下烧毁了，僧院和罗汉堂也处于半毁状态。幸而骨灰堂、附属建筑物、仓库等没有受损。

看守寺院的智野藤吉老和尚雇用的中国人两个人住在里面，另外又增加了7名年轻的和尚。

第三天17日佛晓，装成了和尚的辻参谋出现在骨灰堂。穿着黄服的辻参谋，从此改名为青木宪信，正式被称作“和尚”。7名见习士官一副出家弟子打扮。就这样，8人组成的日本留生僧团出现了。

弟子们虽有曹洞宗、净土宗、日莲宗、临济宗等宗派的不同，但都是真正的佛门出身。只有团长身份的和尚是一夜之间伪装的假和尚。这些留学僧是为了逃避缅甸的战火才进入泰国的，名义上是学习泰国佛教，并希望成为日、泰亲善的动力。

实际上，仓库里满满地堆积着可供坚持10年以上的粮食和燃料。不用说，这是军队补给的。这活生生地反映了辻参谋准备的多么周密和牢靠。这也是因为他有所期待，认为在佛教地泰国，如果是僧侣，就可以生活在安全圈里。

9月2日，英军司令官伊万斯少将到达曼谷。就在此前后，泰国人对日本侨民的态度开始恶化。因此，方面军首脑担心辻的情况，劝他返回军队。9月9日，中村军司令官甚至亲自访问了骨灰堂。然而，辻却不想回去。

另外，参谋胁坂一雄少佐等人，也两次前往骨灰堂，告诉他留在泰国有危险。第二次去时，方面军派出了最后一架飞机，劝他逃到比较安全的印度支那半岛去。因为此时传来了难得的情报。

东南军最高司令官蒙巴顿元帅明言：“挖地三尺也要找到辻参谋！”当时，辻和尚的弟子之一福泽孝（现名秦慧孝）回顾当初时说：

“听到蒙巴顿作了指示的消息后，我们感到周围有危险，

想到了当初在新加坡屠杀华侨的责任，而辻却总是辩解说：
‘那是把别人应负的责任，强加到我的身上！’”

辻和尚比谁都切身感到有成为战犯的危险。进入10月后，英军的管束更加严格了。21日，一道要辻参谋立即来自首的命令，送到方面军司令部。

进而到了29日，又有情报透露出来，说是对僧侣也不例外，要进行审查。冷不防可能就会被软禁。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辻是这样描述当时的心境的：

当我决心听天由命，孤注一掷，把自己扔向死神跟前时，昨天以来的苦闷宛如雨过天晴一般消失了，真象是看到了永恒的月亮一样。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得出结论：要闯进斯利温街的重庆蓝衣社本部去。

（辻政信著《潜行三千里》）

这虽说可以看成是他潜行冒险的顶峰，但也应该看到这是为逃避英军的逮捕和追究，而采取的最后一招。这不是死，而是一直在为了生存作挣扎。

辻知道不能作为僧侣留在泰国，那一瞬间，他表露出的姿态与原来要求“希望成为大使馆的一员”的打算是一致的。可以说，无论辻用什么借口，怎样花言巧语，真相都暴露出来了。极端地说，这是他害怕作为战犯被处刑，所以才很快逃离司令部的。

在缅甸南部辛兹威阿盆地的包围战中，步兵第112联队遭到惨败。为追究责任，联队长棚桥真作大佐不久被解职。臭名昭著的花谷中将是第55师团长，是其直属下司。

然而，大佐并没有去申诉，就那么回国去了。因为他心中认定对花谷在战斗中的指挥和命令，愤懑是没有用的，只

有向大本营诉说真相。

然而，他的期待还是落空了。

“东条把我叫去，狠狠训斥了我一顿。他不听我说话。辻政信在旁边，净说些不懂的话，所以我和他大吵一架。”

（《战死》）棚桥大佐流着泪对长子泰志说。

当时，东条兼任参谋总长。辻是大佐，是中国派遣军第三科科长，象是碰巧进京。军御虽说都是大佐，但棚桥是陆军士官学校第28期，对36期的辻来说是老前辈。受到狐假虎威的辻的指责，心中的悔恨是可想而知的。

棚桥的不满就在这里。战场上有这么一幕。

棚桥联队长争吵了一阵，便加强了语气，不客气地说：

“联队的现状您们也看到了。如果说棚桥的作法不周到，没有战斗意志，那我随时可以剖腹。”

电话挂断之后，棚桥联队长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说我是胆小鬼，要我剖腹。尽管说了如果再攻击，只有全军覆灭，师团却根本不予理睬。命令联队全都战死，要联队长自杀。如果在这里把全体人员都杀了，师团怎么办！师团好象是发疯了。”

（高木俊朗著《战死》）

战后1946年2月13日，棚桥接到盟国占领军总司令部传票后，在熊本市郊的黑石神社，以出色的剖腹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国破山河碎 生命何处存

父母生此身 愿作武士行

这首辞世之歌，促使人缅怀军人的胸襟！

那么，指责棚桥的辻怎么样？不仅没有自杀，反而拼命

想活下去。作为军人，到底是谁应该受到指责呢？

尽管如此，并不是说唯有死好。不过，仅就辻政信而言，这种一般的理论是没有用的。因为他强迫别人自杀，却强调自己的武勇。如此之类的话，说来说去，最后只有引向自杀，别无其他选择。

然而，蒋介石的军队并不是能使人放心的对手，只是和英军相比，还没有追究他的责任。辻只身闯进蓝衣社有何可说呢？在那里，他见到了成主任、郭科长等首脑人物。可以想象，他肯定是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主要是笔谈），口若悬河地在大吹大擂。

自不待言，他在自报姓名和经历的同时，强调自己推进过东亚联盟运动，谋求日中间的和平与建设；说明在中国派遣军任职时，曾为蒋主席的高堂举行过慰灵祭。还说自己与掌握蓝衣社的戴笠将军，也有间接的关系。

当然，这些未必都是谎言。不过，想得到昨天的敌人的怜悯，或罗列有恩于人的功绩，作为日本军人，不会感到后悔吗？令人吃惊的是，这与他平素的豪言壮语，矛盾实在太大了。

“我想去重庆会见戴笠将军和蒋主席，迈出日中合作的第一步。如果做不到，请立即逮捕我，交给英军司令官。我不是爱惜生命才脱逃的。”

辻写下了自己说出的这一结论。有一个比喻叫“前门拒虎，后门进狼”，说的是如受到老虎的威胁，就依靠狼的慈悲。前一段的日中合作云云，就是最得意的借口。可到了这个时候，也不过是他描绘的梦幻罢了。

恬不知耻地胡吹，充分显示了辻是怎样的人品。听他胡吹的蓝衣社干部，是不满30岁的青年，是在远离中国本土的异地他乡进行工作的一帮活动家。说到蒋介石，说到戴笠，

那可是真正的天上人。这岂不是又给辻提供了机会么！

辻逃出曼谷的计划，总算得到了蓝衣社的理解。脱逃准备的很仓促，但为了周密起见，竟装作青木宪信的和尚已经自杀。为此，他给泰国宗教局长、警察局长写了如下的遗书：

在困难的国际环境中，承蒙泰国各位人士长期特别关照，不胜感激。由于战败的命运，往后会怎样处置，已完全失去了信心。我已衰老，净给贵国的各位添烦，却不能发挥任何作用，深感内疚。

我决意将此身投入湄南河的圣水中，在佛道中求得永生，为推动泰日亲善效力于地下。唯愿留下的同僚日僧和7名弟子能代替我的生命，继续得到您们赐予的帮助。

我深知以僧人身份投水，会给贵国造成各种麻烦。为此，我奉还僧衣和僧籍（证明书），还俗于来世。衷心祈望贵国繁荣昌盛。 10月28日夜

日僧 青木宪信

伪造遗书，意尽无余。所谓无隙可乘，指的就是这回事。除此之外，他还给智野老僧和7名弟子留下了遗书。

这天晚上，在伪装日僧青木从布达约特哈桥上投水自杀的同时，在马哈达特寺，弟子们取出遗书，逼真地在灵前守夜。自不待言，内心是在祈求脱逃成功。

和尚立即从骨灰堂消声匿迹了。在蓝衣社的安排下，他转移到了郊外一所隐蔽的房子里。在那里呆了3天，11月1日早上乘火车离开曼谷车站。他身穿南方华侨服装，头戴白色盔形帽，架着有色眼镜，手提一只皮箱，立即变成了游客的模样。

护送他的是两位蓝衣社的青年，其中一人是扮成泰军的宪兵少尉。凭着演戏的化装和麻俐的手法，总算乘上了火车。尽管在挤沙丁鱼似的车厢里，但仍然闪着警惕的目光。

在邻近越南国境的小镇乌汶停了一宿。在湄公河渡口，全靠那位假宪兵的安排，得以平安通过。载着一行人的圆木舟，终于到了对岸。这里是法国的殖民地，所以监视没有那么严。他们沉浸在总算逃出了险境的喜悦之中。

然而，对此一无所知的英军，直到日本兵全部离开泰国的那天，仍在继续检查。特别是在搜身时，由于辻在缅甸负过伤，因此对上臂是否有伤痕，据说检查特别彻底。

辻乘公共汽车一路颠簸前往万象，接着又沿湄公河而下到达他曲，从那里乘汽车经沙湾拿吉、顺化，最后到达河内，从河内乘飞机到中国昆明，稍作停留后，终于到了重庆。那是1946年3月19日。

辻政信在曼谷闯进蓝衣社时说了些什么？他说：“我想去重庆会见戴笠将军和蒋主席，开拓日中合作的第一步。”当然，他是抱着极大希望的。不过，他这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

戴笠将军因3月24日飞机事故，在南京的医院抢救，但抢救无效。戴笠作为军统局长，控制了蓝衣社，是蒋介石的心腹。戴笠死后，辻曾要求会见蒋介石，但始终没有实现。后来，他用文书的形式提出了建议，其要点大致如下：

天皇陛下圣心正如太阳。有时乌云会遮住其光泽，有时月影会侵蚀其形状(日蚀)，然而，爱好和平，遵从道义，怜悯万民万物的圣心，是永远不变的。

我们军人，或性情暴躁，或受功名心的驱使，或一时由于情感上的激愤，而做出错事。这种违背

圣心的行为真是罪该万死。战败的一切责任，理所当然应由我们来承担。

我前后在战场上驰骋了8年，是不折不扣的战犯。在此期间，前后受伤7次，全身挨了大小30多块弹片，从眼看必死无疑一直活到了今天。此次，在中国同人拼命帮助下，我逃出了处在英军重围之中的曼谷，终于实现了多年来的夙愿，到达了重庆。冒昧地说，此行并非我个人微薄之力，而是根据神的指引，赋予我使命，前来直接面见委员长阁下，陈述天皇陛下的圣心，以便迈出中日百年友好合作第一步。

（辻政信著《潜行三千里》）

说什么转达天皇陛下的圣心，肩负中日百年合作的使命，那么，辻政信当时到底站在怎样的立场上？对一名从曼谷的第18方面军逃出的高级参谋来说，这也许不是他能够承担的课题。

然而，一般都认为辻多少有些自负。他与石原莞尔体系有关，为东亚联盟运动作过贡献；通过缪斌和张先生，与戴笠有间接的联系；在蒋介石的故里，为蒋母举行过慰灵祭；从缅甸前线，给蒋委员长送过照片。

辻政信认为自己的意愿肯定会得到理解。因此，他们是不会不搭救飞入怀中的可怜的小鸟的。建议书中充满了这种倾诉。反正，这不外是掩饰自己脱逃的借口，是一份倾诉书。

接着，他又表示了写血书的决心，但蒋介石却断然不予接见。也许因为蒋介石从他的行言中，感觉到他过于夜郎自大。

1946年7月1日，蒋政权还都南京时，辻也被送往南京。

接着，写上交给他的—份任命书：

“令辻政信在国防部第二厅办公 部长白崇禧”

对此，辻有如下的感慨：

好象是从军统局系统把我交换到国防部的。打败仗的日本军人，正式作为职员进入中国国防部，也许我是第一个。我钻进戒备森严的大门。在黄埔路的原中央军官学校旧址，国防部合并了战时的军政部、军令部等机构，刚刚开始工作。

第二厅是搞情报工作，这并非我的专长，但外国人是不可可能进入第三厅（作战厅）的。想到东亚的前途，今天以我对日本无用的有罪之身，暂时报答友邦的恩义，也许不是徒劳的。

（同上）

加重点的部分，不仅没有痛心之感，反而说得洋洋自得。享受昨天还是敌人的俸禄——好象一点廉耻之心、一点后悔之念都没有。这种苟且偷生和自欺欺人的做法，只能令人哑然失笑。这不正符合精神学医生说的：“演技性人格障碍”么！

1950年6月，辻自著《潜行三千里》一书初版发行。贯穿这部畅销书始终的是什么呢？通篇都在说自己胆大心细。这种智慧和演技，也许会刺激读者的冒险心。

然而，其背后却隐匿着本应具有的遁词和诡辩。对了解辻政信的品性来说，这方面倒是令人很感兴趣。

第20章 免除战犯罪

辻政信谎称北京大学教授，乘遣送船踏上佐世保的土地，是1948年5月27日。这里不同于中国大陆，英军的追查和监视极为严格。他不得不跟在泰国一样，再次潜入地下。

辻为何回到这种状况的日本？在国防部辞职时，他对第二厅的侯中将说：“过去的两年里，我拼命工作，提建议，结果没有起任何作用。我之所以决心回国，是因为认识到面对大局的崩溃，个人是无所作为的。”

这并非谎言，确实是他的真心话。当年4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收复了延安，5月1日，中共中央从容地提出，准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辻所说的“大局的崩溃”，意味着他对蒋介石政权的前途失去了信心。

如果说留在中国有危险，那么回日本也有危险。既然到哪里都有危险，那就不如回去。在日本，既有战友，也有同人，他认为只要发挥天生的勇敢和细心，总会有办法的。

吉田茂首相的心腹辰巳荣一陆军中将说道：

“昭和23年（1948年）土居、辻两人秘密回国时，我正在驻日美军司令部工作，所以得到威洛比将军的谅解，以两人帮助美军收集情报为条件，得到美军的庇护。”土居明夫著（《一名军人的忧国生涯》）

辰巳和土居明夫中将是推心置腹的朋友，而辻大概是通过服部大佐这条线所起的作用。

服部当时就任第一复员局资料整理部长，深得盟军总部第二部威洛比少将的信任。

然而，服部在战争结束时，是中国派遣军11军13师团步兵65联队联队长，于1946年5月复员，比部队提前1个月踏上日本的土地。这是由于当时第一复员局复员科长荒尾兴功大佐和其下属高山信武大佐等的特殊关照。

因为在上海的第13军参谋长土居明夫中将，深得国民政府军汤恩伯将军的信任。汤与土居中将取得联系，要他让服部秘密回国。

对荒尾大佐来说，服部在仙台地方幼年学校比他高一个年级，高山大佐却是仙台地方幼年学校的晚辈。荒尾任作战科长时，高山作为部下，相处甚好。高山大佐作为旭化成工业的顾问，依然健在，他是这么谈到这一原委的：

战时，服部大佐曾两次就任作战科长和东条首相的秘书等要职。与作战部长田中新一、作战班长辻政信三人，是开战的推动力。这一点，首先担心会被追究。

但更让人忧虑的，是对杜立德的空袭发出通牒一事。1942年4月18日，美空军机动队对日本本土进行了第一次空袭。参谋本部立即寻求对策。

“凡作为美国航空兵，做出暴虐无道之事者，将按军法从速论处。”辻作战班长起草了这个内容的通牒。陆军省的干部在上面盖了章。这份通牒以陆军次官、参谋次长的名义下发本土各个部队。后来在本土遭到空袭时，就是依据这份通牒处置美军飞行员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此事最让人忧虑。

与服部同船回国的第3师团长辰巳荣一中将也说：

在福冈上陆时，日方同行的部队长等被集中起来，接受美军有关人员的各种调查询问。那时，美军军官认定服部就在其中。其口气令人担心他可能会定为战犯。所以，我庇护着服部，不让他在美国军面前露面。

就这样，服部隐匿行踪，回到了老家山形。

（高山信武著《服部卓四郎和辻政信》）

服部就这样逃脱了虎口。当年11月，他又作为第一复员局史实调查部长，再度活跃起来。他在战争中的经历是非常宝贵的。关于这一点，驻日美军军事顾问团团长布朗克·阿瓦尔斯基上校是这么说：

日本投降后，象他这种地位的军人，不是被整肃，就是遭到更严厉的惩处。服部大佐也许沾了他能力的光，被选进总司令部，安排在复员局工作。

他和他的同僚免于解除公职的原因，是因为占领军当局清楚地知道，不借助于帝国陆海军有能力军官的帮助，解散日本军队、复原军人的大事，是不可能成功地完成的。

（读卖新闻战后史班编《日本再军备》）

不久，盟军总部计划以麦克阿瑟为中心编纂太平洋战史，服部兼任民间情报局的工作负责编辑这部战史。

同时兼任民间情报局和总部情报局局长的是查尔斯·A·威洛比少将。他重视服部，有与其把他打成战犯，不如利用他为美军工作的胆略。于是，在威洛比的要求下，组成了情报网“服部机关”和私人性的“服部小组”，成了旧日军的中心。

当警察预备队诞生时，甚至还想让服部作为这支文职部队的最高总监，因遭到吉田首相和旧内务省官僚的反对而未能实现。

服部病死于1960年4月30日，到这一天为止，服部和辻的搭档一直没有散伙。他们虽有性格和方法的不同，但都是日本重整军备的先锋。辻潜伏在日本的1年半期间，服部庇护他，向他伸出援助之手。而且，服部和辻这一搭档，战败后仍然保持旧军队的主流。应该说这是惊人的事实。

辻被解除定为战犯，那是1950年元旦。他是在老家奥多摩靠近瀑布的隐居处，得知这一消息的。曾被英军定为死刑战犯的人，现在又将去向何处？

说起来，服部也受到了非同寻常的庇护，但不能忽视其背后存在盟军总部占领政策的转换。这年元旦，广播里播送了麦克阿瑟的新年祝辞，印象最深的是他强调了日本的自卫权。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接着在12月7日，他的对手蒋介石总统从四川省省会成都逃到了台北。

在此期间，12月4日，美东北亚局长发表声明，宣称日本占领政策进入第三阶段，日本准备接受媾和条约。这说明美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对给蒋政权撑腰已经心灰意冷。

第二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盟军总部从摧毁军国主义转而把日本推上重整军备的道路。这一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就是采取解除辻政信战犯罪名的措施。

重见阳光的辻，没有袖手旁观。他准备发表正等着公开的手记。由于在潜行过程中已经有所准备，所以写起来并不费劲儿。最初的发表，是在《星期天每日》上连载《潜行三

千里》。

单行本以1950年4月发行的《十五比一——缅甸死战》为开端，6月5日发行《潜行三千里》、8月20日发行《诺门坎》、8月25日发行《瓜达尔卡纳尔》、12月23日发行《亚细亚同感》、1952年2月发行《新加坡》等等。

以战记为主的这些书，是生活在战时和战后动荡时期的体验记录，这是新闻界没有开垦的处女地，因此引起了沉浸在虚脱感之中的国民的关心。特别是《潜行三千里》，多次再版，以其实在的趣味性和刺激性吸引了读者。

他具有军人少有的笔力，所以不能认为是偶然的产物。他过去勤于读书，就是期待着这一天。

在辻的影响下，沉沦下去的战败军人的能量，一下子喷发出来。最典型的是1952年8月16日，在金泽市兼六园内的长谷川宅邸遗址广场进行的时局演讲会。

这是《石川新闻》组织的活动。在炎热的阳光下，聚集了3万狂热的听众。辻以“亚洲的黎明”为题，振振有词地讲了长达两个半小时。这对辻的一生来说，真可谓最美好的时刻。

他在那里大声嚎叫什么呢？他一边讲述《潜行三千里》的内容，一边强调在即将到来的美苏大战中应保持中立自卫，他最后说：

这次的美苏大战，不是为了日本，也不是为了亚洲。亚洲各国应心连心，不做美苏的走狗。

斯大林也好，杜鲁门也好，他们都是战犯。只是因为我们的败仗，就给我们打上侵略者的烙印，这一点，我们应该认真思考，要用那位大呼全体战犯无罪的印度法官帕尔的精神，作为民族合作

的精神。

把斯大林和杜鲁门称作战犯的，是过去的石原莞尔将军。而辻却效仿石原，打算给自己发放战犯免罪符，这不能不说是地地道道的鼓动者。从这点来看，演说中的下面一节也是意味深长的。

我脱下军装，作为和尚潜伏下来的主要动机，就是因为与在这次的战争中，盟军想要把我们的同僚、前辈和许多部下当作战犯杀掉有关。

那时，我真想说，所有战争犯罪都是辻干的。不知一个人的生命到底能坚持到那一天。还是彻底潜伏下来进行战斗吧！

如果在最坏的情况下被捕，我就不作任何申辩，尽量多承担各种罪名，然后走上绞首台。我怀着这样的心情，在16日凌晨，趁天未亮，从营房里逃了出来。

他在这里说的，归根到底只是说明了结果。从曼谷逃亡出来的过程，不难看出他是在人身安全得到保障时才这么强硬的。毋宁说由于他不在，前辈、同僚、部下当中，才有许多人变成了牺牲品的。

兼六园演说过后不到半个月，8月28日，众议院突然宣布解散。辻立即表明要竞选议员，在9月10日的演说会上，他是这么阐述其动机的：

“从金泽和各地传来消息，说我当时的讲演是法西斯，是希特勒。为了否认暴力、否定法西斯，我毅然决心参加竞选。”

尽管口齿十分伶俐，这话还是够厉害的。

因为兼六园演说之后，《北国新闻》的记者问他，你不

是要出马参加下次大选吗？对此，他却答道：“我根本没有想过参加选举。”第二天的晨报以两段标题，对此作了突出报道。

面对这一报道，他不得不想法捏造竞选的动机，他使用的计谋还不止如此。尽管兼六园的时局演说本身就是对自己的否定，但演说已经成了竞选的前哨战，所以不能有半点疏忽。

田边新之大佐去世田谷辻家里访问时，一个不认识的男子正在不停地劝辻进入众议院，后来才知道，那个不认识的男子就是木村武雄。他当时不是议员，而是在事隔多年之后，吉田内阁突然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时才当选的。

田边认为：辻不适合搞政治，是彻头彻尾的门外汉。

“你是什么人，我不了解，但不要不负责任地鼓动辻君。”田边这么劝阻木村。冷场了一阵之后，他又对辻说：“你没有政治家的素质。如果是为了沽名钓誉，还是适可而止！”

由于同期生之间相处甚好，他毅然把话说了出来。辻不会有反感，当场老老实实地听着。但在几天之后，辻给田边家打电话说：

“我还是决定参加众议院选举。我明天去金泽，在兼六园作时政演说。”

田边感到措手不及，只好劝辻从政治学的第一页学起，利用议席去教育青年。不管怎么说，辻是在决定参加竞选之后前往兼六园作讲演的。

使人再次认识到他所说的竞选动机，多么充满了诡辩，他充当候选人的演技，又是多么高超。

这种闪电战在选举中也奏了效。他打的是自卫中立的旗号，石川县第一区在金泽市以南，有9名候选人，是比一般

高三倍的激战区。然而，没有政党背景的无党派候选人辻政信，却以94900票的最高票数当选。

他超过第二位的自由党候选人坂田英一23000票。第三位是改进党的武部英治，接下去是继续当选的右派社会党冈良一。真是刮起了一阵辻旋风。

对这位踏上国会议事堂红绒毯的原参谋，有各种各样的传闻。当他生气的时候，就会冲着从金泽选区来京的几名陈情者喝道：“我宰了你们！”在议员会馆的辻房间里，桌上依然架着一把日本刀。

一天，我作为政治记者，走过议员会馆他的房间。当时的房间与现在的西洋式房间不同，约有8铺席大小，是木板地，只有桌子和沙发。而那些大人物议员，几乎都有另外的办公室。

会见时，他显得很慌忙，根本沉不下心来。门口有一张帆布床。他指着说：“现在的国际情势是敌机随时都有可能来袭击，所以我经常睡在那上面，每天保持野战的态势。”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他作说明的情景。我又一次认识到，他尽管脱下了军服，但作战参谋的意识并没有改变。而且我认为，对于辻来说，太平洋战争并没有结束。

1953年3月4日，《读卖新闻》晚刊社会版上有这么一则报道。这则报道用了四行多字的标题，与《我因辻原参谋而蒙受不白之冤》小标题相并列，登载了“最近获释的桑托斯事件中的战犯川口原中将可与对质”的报导。

自不待言，辻的心情是不平静的。被判处6年徒刑的川口清健原少将，于1953年3月10日获释，踏上了故国的土地。在神奈川县逗子町新宿的寓所里，夫人胜子和一儿一女正等着他。战后激剧动荡的社会，要使川口的心情恢复正

常，需要一定的时间。

我走访从石川县第一区选出的社会党冈良一议员，是在这一年接近年底的时候。他反复说川口之所以卷入了桑托斯事件，完全是因为辻的指令。他说瓜岛的右翼部队长被罢免，也是辻参谋的诡计。

辻发表了瓜岛战记，其中竟对川口恶语笔伐。川口说为了澄清事实的真相，希望一定与辻对质。

冈议员虽对此表示理解，无奈自己与辻是同一选区的竞争对手。不想以此作为恶意宣传的把柄。对于川口的言行，也只能慎重对待。

他想出一个办法，把在金泽的伊藤丰树介绍给了川口。伊藤是主持国防恳谈会的干才。他答应了川口的请求，并与辻取得了联系。

1955年1月18日下午2时，对质演说会在金泽市广坂街的町村会馆举行。由于是原部队长和参谋之间非同寻常的对质，连场外都挤满了听众。站在讲坛上的原部队长，对处理桑托斯事件、瓜岛战记中的诽谤，作了咄咄逼人的驳斥。

对此，辻的舌锋也毫不留情。他说：处决桑托斯本不是参谋的权限；关于瓜岛战记，也不想认错。

前年10月，《文艺春秋》登载的川口原少将著《瓜达尔卡纳尔之战真相》一文，有理有据地对辻进行了反驳，全文结束时说：“口头和书面都说负有责任，但在行动上却无任何表现，真是人世多滑头！”

当然，在讲坛上不能这么说。更何况是对质演说。由于是面对听众，所以提出要点需要有技巧。此外，诸如会场设在辻的地盘上；川口又因耳朵有伤，听力困难等等，对川口来说，都是决定性的不利因素。

实际上，在进入实质性对质之前，胜负就已经定局了。演说会在听众的怒骂声中乱纷纷地解散了。40天之后，鸠山内阁举行大选，辻作为日本民主党候选人出马，从上一位的第二位又跃居榜首。川口原少将的意图反而实得其反。

其后，川口原少将仍对此切齿扼腕。1960年底，他因肝癌住进了东京中野区的工会医院。1961年2月3日，辻政信写了慰问信，全文如下：

敬启者 闻您因病入院，特此慰问，衷心祈望您早日康复。10年前，我也因病在九死中求得一生。

阁下的信念和贵体必将恢复如前，愿您再创奇迹。

因我无德，给您添了种种麻烦，请予宽容。求神佑您驱除顽敌，战胜病魔。

我一边看这封信，一边想到了诺门坎事件中的须见新一郎联队长和战后问及勤务兵所作的答复。

猛一看似乎是在道歉，其实未必如此。这并非诚心的歉意，只不过是文过饰非的辩解而已。家属怕病人激动，没有把信给他看。

3个半月后，6月16日，川口原少将怀着满腔的愤恨离开了人世，享年68岁。

1954年11月，日本民主党成立，辻以无党派的身份加入该党。当时，我曾与政调会会长松村谦三先生同行，在他的家乡富山县福光町住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几名记者在旅馆的火炉旁，围着松村先生畅谈。客厅里出现了辻的身影，他跪在远处的廊下，双手着

地，行了最敬礼。穿着睡衣，正在松快的我们，一时疑惑不解。我们体会到了恫吓和恭敬——这种两者相互对立的精神构成的反常现象。

1955年11月15日，根据保守党的合同，结成了自由民主党，迁投身在大政党之中，但作为政治家，他并未得到好评。鸠山、石桥、岸、池田内阁相续更替，但根本没有让他入阁之意，人们对他评价奇特，他又缺乏协调的人际关系。

1958年5月，岸内岸选举，对辻来说，虽是第4次作候选人，却是以前所未有的最低票数当选。在众议院里的前途，他自己比谁都看得更清楚。他之所以把目光转向一年后的第5次参议院选举，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在气息不投的岸和佐藤控制的自民党里，他已无可依恋了。在6月召开的特别国会上，他在预算委员会上咬住岸首相不放：“你所在的选区山口县第二选区，法定选举费用是652,200日元，你能明确地说，仅靠这点费用就行了吗？”

对此，堂堂的岸首相也无法回答，只是低头不语。此外，召开通常国会那天的议员总会上，他作为反主流派的斗士，追究了与公选总裁有关的收买党员事件。他的追究达到了目的，第二年1959年4月30日，决定将有关者开除出党。5月7日，他以无党派的身份成了参议院全国选区的候选人。

当时，与总理、总裁和臭名昭著的人物为敌进行战斗的辻政信，突然赢得了人心。6月2日开票结果，他大获全胜。获得了683,000多张选票，得票率居全国选区第三位。

第21章 为何潜入老挝

现任参议院议员辻政信原大佐失踪以来，不知不觉已过了25年。了不得的辻，今天不至于还活着——这是人们普遍的看法。因为如果活到今天，他也有83岁了，而且一直杳无音讯。

然而，生存之说在其故乡友人之中，仍没有消失。如果说有象《义经传》^①里那种期待和盼望，也充其量不过如此。这就是说，生存之说也好，死亡之说也好，都缺乏关键的目击者和物证。然而，失踪之谜依然存在。

辻的家乡已经为他建立了铜像，地点在石川县江沼郡山中町字谷奥町的旧东谷奥村村公所前。揭幕式于1979年1月13日举行，至今已有7年，但并不广为人知。

当时，报纸曾在角上登了消息，也许因为只是地方版，地点也过于偏僻，所以没有引起更多人的注意。从山中温泉沿柏油山路往东走8公里，或乘15分钟的车就可到达。

铜像高2.4米，是青铜铸的立像，底座高2.2米，为万成花岗石，身穿晨礼服，右手上举，指向前方，一副正在演说的样子。精悍的表情和张开的双肩，宛如活人一般。

这是金泽美术工艺大学的石田康夫副教授（日展审查员）制作的。

当地有志之士发起成立赞助会，筹集了修建资金1千万

注① 幕府时代以源义经的生涯为中心写成的一部军事故事。

日元。发起书的内容大致是：

“……我们仰慕辻君，无意中产生了为他修建铜像的愿望，接着又想把辻君召回到铜像上来……”

辻当年在名古屋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写了篇作文《我的心愿》，从中引用了这样一段：

“四周重山叠嶂，因而道路并不平坦。想出境外，必须依靠矫健的双脚。如此环境终于使我意气刚健，身体强壮。终于以军人之大抱负授我。”

今天，唯有道路变成了柏油铺装的坦途，四周依然象昔日一样“重山叠嶂”。沿路前行，可以听到溪水的声音。这种景象一定也是一如昔日。

这种靠烧炭为生的偏僻山村，却出现了使国内外为之骚动的人物。当地想修建一座铜像，这种热情是可以理解的。

这里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有志之士是如何理解辻的生死的。笔者认为，恐怕他们也认定辻已经死了，所以才着手修建铜像的。但似乎又象是在主观臆断。

当地农协的有关者这么说：

“铜像并不是因为先生死了才修建的。我们相信先生还活着。生死与修建铜像并不存在什么关系。”

回答出乎意料。不过，人活着就立铜像，这是少有的。即使纵观战前、战后、著名的政治家、军人活着的时候立铜像，也是罕见的。

战后，1958年9月23日，高松市的栗林公园里，建立了政治家三木武吉的铜像；1960年10月12日，盛冈市的盛冈八幡宫院子里，修建了米内光政海军大将的铜像；1963年5月12日，松山市内的石手寺内，重建了秋山真之海军中将的铜像。

最近，1981年9月23日，在东京北丸公园，为吉田茂原首相立了铜像。全都是仪表堂堂的立像，但没有一座是本人活着的时候修建的。

辻的铜像揭幕的当天，赞助会的川原长吉会长说：“先生一定还活在东南亚的某个地方。”这就是说，铜像是本人活着的时候修建的。如果说这是修建铜像的理由，倒也未尝不可。不过请人制作铜像，却是1978年初夏的事。

目送辻失踪的赤坂胜美，从万象回国，是在当年9月5日，从他口里传出辻被枪杀的消息，在报纸上登出是9月9日以后。由于这一发言受到普遍的重视，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长的话也就不是立铜像的唯一理由了。

与亚洲有关的知名人士去向不明，这种走进了迷宫一般的事，还有下面几起。其一是1967年3月26日发生的旅居泰国曼谷的美国实业家詹姆斯·特姆逊失踪事件。他突然在马来西亚中部高原的别墅失踪。

当时61岁的特姆逊，是一位做领带绸生意的亿万富翁，但先前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因此，在他失踪时，就有人私下传闻，推测他可能不是失踪。

另一起是1979年10月7日，在巴黎消声匿迹的南朝鲜中央情报局（KCIA）原局长金炯旭的失踪事件。金炯旭于11月1日只身从亡命地美国乘飞机到达巴黎。但他失踪是在一周之后。

当时，他除了在美国国会就南朝鲜政府收买贯美国议员一事作证外，正在编写弹劾当时的朴政权的回忆录。因此，可能被当成了首谋。同样成了一个谜。

这两件事有趣的共同点，是主人公都是谍报活动的老手。而且失踪的过程又都带有国际背景。

辻政信的失踪也有不少与这两件事相似的要素。如果说到辻作为陆军参谋的经历，比之于金炯旭和特姆逊的谍报生涯，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从日本到老挝的足迹，既富有国际性，又充满了神秘色彩。

关于辻的失踪，有大量的情报和猜测在流传。但现在还没有发现带决定性的证据。情报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种说法：

- (一)、在老挝内地被监禁判处；
- (二)、已被曾指名他为战犯的英国谍报机关干掉；
- (三)、已作为有害人物被美国或法国的谍报机关干掉；
- (四)、被杀死或病死在中国。

不妨从中选择几则情报分析一下。赤坂胜美是目送辻潜入老挝的人。他当时是东京银行万象分行的雇员。他对老挝内地消息非常灵通，是为数不多的日本人之一，本身又曾经是巴特察^①的干部。

他在法属印支的菜市迎来了日本战败，曾和宇都宫步兵第86联队通讯中队的同事一起，脱离日军，前往老挝。第二年6月，他作为自由老挝军（后来的巴特察军）的军官，一边负责训练新兵，一边参加抗法斗争。

赤坂在辻失踪两年后，改行当了日本驻万象大使馆的当地助理员。1978年9月5日，他突然回到日本。这是因为老挝政府发布了驱逐外国人员的命令，只是一直没有明说。回国后不久，他对新闻记者这么说：

到去年为止，我也一直相信辻先生还活着。但去年年底，从朋友那里听说，先生被杀害了，被埋

注① ，老挝爱国战线党的前身；

在查尔平原的某地。既有在场的人，也听说了埋葬的地点，当然不会有错。

可是，这是谁干的，为什么要这么干。因为现在政府中有相关的人在，所以不便说出，但先生已经死了，这一点是事实。

（《东京新闻》 1978年9月9日）

这就是说，辻在老挝东北部的查尔平原某处被杀害了。谈话没有涉及“是谁、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具体内容。又过了大约一个月之后，他这么回答共同通讯社记者的采访：

去年夏天，我在老挝解放军里曾教过辻的一位旧部下，他从查尔平原回到了万象。因为从辻先生失踪以来，我一直在追查消息，所以我马上向他打听。

那位部下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1962年1月到4月前后，上级命令包括我在内的三个人，枪杀了辻先生。不知因为什么罪要枪杀他。尸体由其他士兵埋在查尔平原的某处。”

他还说：“在这之后，我虽然到那附近去过，但没有一个居民，树木又很茂盛，不知埋在哪里。”为此，赤坂委托他挖出尸体，并说明将提供经费。

（《静冈新闻》 1978年10月13日）

尽管情况已相当具体了，但“旧部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并不清楚。赤坂本人也要求他提供某种物证。但仅就这些情况，只能说还没有脱离传闻的范围。

可充当活证人的那位“旧部下”，约定第二年12月再来万象。可是，还未等到那一天，赤坂便接到了要他离开老挝

的强制性命令。由于如此反复不走运，结果使好不容易得到的情报蒙上了阴影。

然而，从万象发来的新闻报道，与此情报有关，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补充，那就是1979年4月13日《朝日新闻》发布的伴野特派记者的专电：

万象有一个曾为辻议员在坎开过俘虏生活时当过翻译，并想帮助他“脱逃”的中国人，叫杨光宇（35岁）。当时，他作为贡勒中立派军队的随军摄影记者，在坎开的中立派军队司令部工作。

现在，杨在万象经营照相馆和酱油厂，他回顾9年前的情景时说：“那是老早的事了，记忆也许有错……记得我第一次见到辻君，是1961年6月初。”

他开头这么说。下面是正文中的精彩部分：

一天，辻议员小声对我说：

“帮我逃到万象去，一定报答你。我保证你一辈子的生活。如果想办实业，我出钱；如果想去日本，我照顾你。决不扯谎！就这么定了。这就是日本武士道！”

姓杨的青年在想，只要选好时机，“脱逃”并非不可能。虽说有监视，可这是辛加蓬司令官自己家里的一间房子。如果使用中立派军队的军车，总能到达万象。

然而，战局对右派军队有利，现在好象不能马上就走。不管怎么说，辻议员说定的事，还是有魅力的。考虑了一周之后，他悄悄地说：“现在不行，请等待时机。”

“拜托了。”辻议员说着，紧紧握住了姓杨的青年的手。

文中出现的辛加蓬司令官，是当时巴特察军第二军区司令官。报导又称：

与辻议员的这种交往持续了20天左右。6月底，姓杨的青年接到富马殿下的命令：“到北京去留学，研修摄影技术6个月。”

“辻君，我将奉命去北京。”面对辛加蓬司令官的审问不为所动的辻议员，听了这话，脸色唰地一下就变了。

“在我回来前请等我6个月。我一定帮您逃走。”姓杨的青年这么说。辻议员只是点头。

这里所说的脱逃一事，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是无法说出来的。从这一点来看，我认为这一情报是很可信的。姓杨的青年回到坎开是8个月之后的1962年3月。专电最后这么说：

坎开没有辻议员的身影。我问辛加蓬司令官。回答说：“辻逃走了。”我又问关系不错的坎开巴特察士兵，他们说姓杨的青年去北京之后，过了约有一个月，辻就不见了。

“后来，我在中立派军队里一直呆到1965年。辻君的行踪始终不明。依我看，他改换装束，是被当作间谍嫌疑犯的决定因素。他是被秘密处决的。”说完，杨的脸也有些红了。

尽管情报的来源有“随军摄影记者”和赤坂所说的“旧部下”的差别，但都出现了辛加蓬司令官，遇难地点也都是查尔平原。虽有不清楚的地方，但令人感到已经相当接近真相了。

当然，这些情报并不是没有疑问。辻的遇难地点真的可以断定是查尔平原吗？与此相反的情报还有几份。其一，外电流传着这样的消息：“6月份前后，滞留在川圪的辻议员，制定了经河内前往北京的计划，并搭上了苏联飞机。”

这些情报中值得注意的是，仅仅是经过河内，目的地却是中共的北京。然而，从辻要求会见北越胡志明主席的口气来看，并没有顺利地接受。不管怎么说，进入河内也好，会见胡主席也好，这些情报来源于官方还是来源于私人，都无从查找。

相反，中国方面的情报却不断传来。其中之一是参议院社会党议员千叶信带来的情报。下面引用的是刊登在1962年2月20日《内外时报》上的消息。

据千叶先生说，他在北京向作为原驻日大使、长期呆在日本的谢南光先生提出申请：“日本相信辻先生很可能潜入中国。我作为辻先生同僚议员，想调查这一情况。”谢先生在一周之内帮我向各方面打听了情况，回答是没有来中国。

当时，谢先生还补充说：“中国方面根据辻先生前次来访时的言行，对他没有好感，而且从辻先生的思想来看，也不可能入境。说句多余的话，中国方面听到了一种谣传，说辻在即将进入共产圈国家之前，在北越被美军以对自由国家有害的名义枪杀了。”

千叶议员作为访华使团的成员，于1962年1月1日到达北京。1月5日，他是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举行的会议上，委托谢南光先生进行调查的。

回答共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是说没有进入中国。第二层是说从其思想来看，不可能入境。而且中共对辻没有好感。

谢南光回答的第三层意思是：“有一个消息纯属谣传，说辻在即将进入共产圈国家之前……在北越被美军枪杀了。”对此，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于1962年4月17日答复当时外相小坂善太郎说：“调查的结果，根本不存在被美军枪杀的事实。”

调查到这里，一个意外的情报传到了我的耳里，很值得一听。那是刚进入1982年不久，担任某综合商社管理职务的I氏（本人希望隐去姓名）传来的万象的情报。

“在查尔平原被捕的辻早就死了。是被巴特寮杀死的。”

1980年8月底，当时老挝驻河内大使作出的最初答复也是如此。大使曾是巴特寮军队的干部，他还作证说：

“不是上级的决定，而是根据一位地区长官的裁决处死的。从治安上说，这种处置是必然的。但后来下命令说，这种处置要得到上级的准许。”

带来这一情报的，是在万象大陆饭店前面大街上经营杂货店的一位泰籍华人。I氏叫他“老殷”，年龄在60岁左右，曾任川圻的中国人协会理事长，是1976年出现在万象的右派系统的实业家。

由于受相好的I氏委托，1980年8月底，“老殷”在家中私下里向来万象的大使打听。据说当时大使不解地问他：

“现在你还打听这个干什么？”

据I氏说：汉语中没有“辻”这个汉字，所以印象很深，人是不会搞错的。

“我还抱有一线希望，认为他一定在某个地方还活着。”

这个消息使我绝望了。也许是这个原因，记得当时我还问辻被害地点，但现在想不起来了。” I氏淡淡地说。

I氏知道这一情报已经一年多了，由于不可思议的机缘，他偶然向我作了透露。我是在采访的过程中意外与I氏邂逅的。正因为如此，这个从未发表过的新情报，使我感到心里一阵骚动。I氏今天虽然在东京工作，但他在万象呆的时间很长，为人、观点都是可信的。

此外，在万象的“老殷”，还有与他关系密切的大使等人。通过这些途径得来的情报，使人感到并非捕风捉影，可靠性都是很大的。

这里使我想起前面看到的《朝日新闻》的专电。辛加蓬司令官回答杨摄影记者的提问时说：“辻逃跑了。”

摄影记者把这话理解为“被秘密处决了”，但没有其他证据。这么说来，“辻逃跑了”这句话，就不能单纯认定是托辞。不仅如此，老挝大使的证言，也骤然引起了轰动。

更为重要的是，处决不是上级决定的。这也是逃跑之说的重要证据。从辻请求杨摄影记者帮忙也可看出，他一直企图逃跑。

这一来，就构成了这样的推理：辻从坎开的辛加蓬将军的监禁下逃脱出来，在查尔平原的某处被捕，然后被一位地区长官判处死刑。

还有一则凑数的报道。《产经新闻》的野田特派员在坎开的家中访问了苏发努冯殿下，当时问道：“我想辻先生在这里会见过您。”对此，苏发努冯殿下是这样回答的：

殿下脸上浮着微笑，说话闪烁其辞。我又问了一次，还是如此。也没法猜测。“您没有否定，是

否可以推测您与他见过面。”仍然是无言的微笑。连秘书都有些胆怯。“我建议你去问富马殿下，我不知道。”

好歹问出了这么一句话。

（野田卫著《辻政信还活着》）

那是1962年7月3日，辻从坎开失踪，已经过去一年左右了。

苏发努冯殿下（现任大总统）是辛加蓬司令官的顶头上司，所以不会不知道辻的命运。“令人害怕的回答”，就是由此而来的。

不管怎么说，杨摄影记者和I氏的情报，尽管其来源各有不同，但也值得注意。详细过程不得而知，总的情况却是一致的。

如果将各种证词串联起来，那么，隐匿在上述两则情报中的真相，也许可以说是定局了。辻在查尔平原，被巴特寮的一位地区长官当作间谍处死了，时间是1961年7月底或8月间。这就是从情报中得出的结论。唯一不能确定的，是作为物证的遗体 and 遇难地点。遗憾的是，在老挝今日的国情下，要确定下来，障碍似乎是很大的。

不管怎么说，情况证据和间接证据告诉我们，上述结论具有高于一切的可靠性。

既然得出了这个结论，那么，我们怎样评价辻的死呢？如果是“谋杀”，似乎缺乏政治理由。因为尽管辻是议员，但不属于任何政党，而且离权力中心也很远。

此外，如果考虑到作为战犯的旧怨，那早已成为陈年旧帐了。那么，是不是可以称作“奇祸”呢？这又太缺乏意外情况。辻潜入的时候，老挝还孕藏着内战的危机。这一点任

何有关人士都是清楚的。

驻曼谷的大江晃大使竭力阻止他去老挝，万象的别府节弥大使也拒绝帮助他。

他们采取的态度是：“对方是国会议员，我们没法制止。但他的事也与大使馆无关。”

尽管如此，他还是要进入老挝，其危险是显而易见的。何况辻是个头脑顽固、听不进别人意见的人。曼谷大使馆的原书记官伊藤知可是防卫厅的一等陆佐，在陆军大学时代与辻是师生关系，他也说：曾经陪辻到过万象，对辻的要求感到很为难。

辻与大使馆和东京银行商量之后，完全委托赤坂先生从中斡旋。

“我想会见胡志明主席，劝他停止在越南与老挝进行军事活动。这是我一生中最后的事业。请一定帮助我，为了亚洲的团结。”

辻虽然满腔热情相托，可进入巴特寮控制的地区是相当危险的。赤坂诉说了实情，表示拒绝。

你难道不理解我的心情？说什么危险、危险，可我是拼着命才来的！家属的事已经完全没有后顾之忧了。我的寿命也不长，想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日本，这种心情你能够拒绝吗。”辻参谋厉声喝道。

（野田卫著《辻政信还活着》）

这当然不是战时大佐参谋与下士之间的关系。可据说在其气魄和热情的感召下，赤坂最终同意以“个人的身份”帮助他。所谓“暴虎冯河”、“鲁莽冒进”，说的就是这种场合的勇气。

那么，驱使辻这样蛮干的背景是什么呢？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看看他此次东亚之行。

1961年度预算案4月1日在国会通过了。他想抓住这个时机去海外旅游。在交给参议院议长的请假报告里，他提出从4月4日到5月13日的这40天内，去越南、柬埔寨、泰国、老挝、缅甸、香港考察。

这里提到的越南是指当时有外交关系的南越，胡志明的北越没有列入考察计划。出发之际，他会见了当时的池田勇人首相、大平正芳官房长官。是辻要求会见的。

他是想在池田首相与美国新总统约翰·F·肯尼迪会谈时，提供有关老挝的新情报。他也接受了若干饯别礼。首相定于6月19日前往美国，是在辻预定回国之后，因此有充裕的时间。

辻获得的情报或资料是否能赶上会谈，这对池田来说并不是问题。处理基本的外交事务，靠的是外务省的途径。至于饯别礼，当然不是高额巨款，只是分两次提供给他100万日元。

当时负责与辻接触的首相秘书官伊藤昌哉，这么对我说：

辻曾委托我说：南方的飞机不保险，如果出了事，希望照顾我的秘书。还说，我想经老挝去河内，因此打算化装成喇嘛僧前往。

社会上好象传说他是带着池田的重大使命出发的。其实，毋宁说重点在辻君自己的计划。

可以看出，这不是池田打算利用辻，而是辻利用了池田。而且不能忽视这样一件事：他甚至委托别人照顾秘书。如果是那种亲昵关系，倒也未尝不可，更何况是以无法预测

的事故为由，要求照顾秘书。这也许是常理没法解释的，只能认为是出自他相当绝望的心情。

4月4日，到羽田机场送行的，除了家眷、亲戚、秘书，只有林秀澄原陆军大佐。林大佐是辻敬仰的友人，战败时作为第38军参谋就任西贡司令所所长。

辻走上舷梯，频频挥着手。就座之后，又走到舷梯旁招手，前后反复了5次。在返回的车上，大佐甚至问藤力秘书：“老头子今天是怎么搞的？”

战后，这是他第一次只身去海外旅行，而且去的又是危险地区，带有紧张和异常的不安，是可以想像的。使林大佐难以忘怀的，还有另外一件事。临出发时在候机厅里，辻这么耳语道：

我去老挝，连内人都没有告诉。我只是说参议院去东南亚作慰劳旅行，轮到了我……今天早上，内人看到我把松鱼干塞进提包，觉得奇怪。这是在偏僻地方吃的啊！

辻对家人都说谎，可见老挝之行多么阴森可怕。

“老挝的动向带有危险的因素。想去实地看看。”

辻在议员会馆说出了这么一句话。因为在当时看来，老挝内战有可能变成国际性的导火线。林大佐当即表示赞成。

说是要会见1960年8月政变中取得成功的中立派贡勒上尉，想让他停止内战。不过，我认为那种劝说不会有任何效果。左右两派进行的是美苏的代理战争……而且中国和苏联以多大的力量支援左派的巴特寮，这一点要去看。

他说应该去看看巴特寮后方的补给区，补给的地点、路线，因为是战斗力的保证。据说外务省给了

他一份25万分之一的地图，我又复制了一份更为详细的50万分之一的地图交给他。

他从日本出发后，好象说过想会见胡志明主席，但与我商量时，他只字未提河内和胡志明的事。路线并不算太绕，所以他预定从万象出发，考察了查尔平原之后，再去北越的荣市，从那里乘飞机到香港，然后回国。

从林大佐的回忆可以知道，他的主要目标在于侦察查尔平原。但不知他到底要在哪里会见胡志明。

4月4日傍晚，他经香港到达西贡，即与吴庭艳总统会谈，还视察了当地情况。8日到达柬埔寨的金边，向设在此地的北越通商代表部，领取了去该国的介绍信。

虽说不是领事馆，开不出签证，但如果到了河内，就可以会见主席。也就是说，他在旅途上采取了去河内的权宜之计。

从4月10日的4天里，他呆在泰国曼谷，但并没有什么大事。湄南河畔的瓦特利雅普寺，是他战败时与7名见习士官一起隐居的地方。伊藤书记官与他同行，说他当时怀旧之情，难以自制。

他还与战时见过面的阿派旺原总理和陆军士官学校的门生阿图少将等吃过两次饭。据说食欲旺盛，身体很好。

在街上漫步时，他还顺便光顾过佛像店。泰国的佛像大多头部呈三角形，面部和善。偶尔也能找到象不动明王似的表情凶狠的黄铜佛像。

“就要这个，就要这个。”他说着把原价1千泰铢的一尊佛像还到6百泰铢买了下来。他装成和尚从万象出发时，带的就是这尊佛像。前些年，佛像送到赤坂那里，使人为难

的是真假难辨。

他和伊藤书记官一起乘飞机从曼谷出发，是14日上午8时，他小声对前来送行的伊藤夫人说：“谁那么喜欢去老挝这种地方啊！”

语调十分低沉。夫人对我说，当时她嘴里说着“多保重！”心里却实感到“危险！”

然而，去河内并不是他在旅途中一时兴起。这从他在日本就准备了几条珍珠项链也可看出。那是带去献给巴特寮领导人苏发努冯殿下和胡志明主席的特产。

既然是国会议员，为何不堂堂正正地通过仰光——昆明或香港——南宁这条航线进入河内呢？这是一个疑点。

然而，让自己好象清楚地知道其中的困难。

仰光、香港有英国的耳目，昆明、南宁是中共的天下。前者曾将他定为战犯，后者因战后出言不逊而得罪过。作为最后一条路，他才考虑经巴特寮去河内的。赤坂在著作中这么说：

辻先生与日本大使馆（驻老挝大使馆）谈过经老挝去北越的可能性。既然要从与北越没有外交关系的日本进入北越，得不到正式的签证，那就只有采取潜入的方法。

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通过陆地接壤的中国，或是取道老挝。从中国潜入，对辻先生来说，是不可能的。剩下的一条路，那就只有取道与北越有合作关系的巴特寮（老挝爱国战线左派势力）统治区到达河内了。

（赤坂胜美著《赤坂路线—印度支那的游击队长》）

那是辻离开万象前一天（4月20日）的黄昏，大使馆的

K事务官夫妇来宿舍拜访。

K夫人把精心制作的茶装在壶里，带来给他。辻显得很高兴，慢悠悠地品味着香味扑鼻的热茶。

“我已是垂暮之年，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报国之了。我丝毫不担心家里。小儿子考取了东大，对内人，我也并不留恋。”

他不知不觉流露了真情。

（野田卫著《辻政信还活着》）

这种绝望的话，不象是平素的辻说的，是不是面对危险，无意中吐露了心扉呢？实际上，两个儿子，长子已经独立；三个女儿，两个已嫁给良家，没有什么牵肠挂肚的。当时辻虽已年满58岁，但叹息自己“已是垂暮之年”，怎么说也是过于伤感了。

辻即将沿13号公路出发时，身着褐色僧衣摄影留念。对于不喜欢照相的辻来说，这肯定也是稀奇的事。为何身着僧衣，赤坂是这么说明的。

怎样才能安全到达巴特寮地区，并领到从那里前往河内的通行证呢？首先是穿过右派军队和中立派军队的地区，不要引起别人怀疑，接着是取得左派军队的信任。然后让左派领导人同意去河内，并开具证明书。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除了装成僧侣，别无他法。老挝是小乘佛教国，僧侣得到任何人的尊敬，不会被怀疑。我不禁想起，在游击时代，僧侣作为情报来源，在哪里都畅行无阻，发挥了间谍的作用。

（赤坂胜美著《赤坂路线》）

然而，费尽心机想出的苦肉计，到头来还是实得其反。

然而，从他一连串的言行可以看出，这不是不知道进入老挝就是以死为邻。尽管如此，又是什么力量促使他敢于作这种鲁莽的潜行呢？

这就是约定向池田首相提供老挝的情报。另外，就是林大佐寄与的期待。尽管如此，也并非必须赌出生命的约定和期待。

而且到达万象时，他应该切身感受到那是多么的危险。即使改变主意，也许谁也不会诽谤他是懦夫。只是他不想改变主意。

想想这些事情，有人认为进入老挝是他考虑好了的自杀行动。他那种顽固态度使人只能这么去看。然而，熟悉辻性格的人却坚决否定这种自杀行动。甚至有人说正因为如此，才能看出辻之所以是“一条狼”。

这好象是命中注定的，不禁使人想起过去《潜行三千里》的前辙。书中冒险的内容，意在振奋处于占领下的萎靡的人心。这是众所周知的。

当然，辻也有过进退两难的境况。被英军指定为战犯，是处死还是活命，他被逼到了十字路口上。而脱逃之所以有利，是因为有两名响导相随。

相比之下，潜入老挝截然不同，这是只身闯入险区和情况不明的旷野。内战还未平息，老挝语、泰语都是一知半解。这种不同，辻无论如何也是没法承受的。

不，不能光是这么说。我甚至想到，野心和冒险心蒙住了他观察真相的眼睛。反过来说，难道不是对开拓血路，“再做一个梦”的期待有所膨胀，才驱使他前去的么！

何况辻有不死之身的体验和信念。他对伊藤书记官说，回国后要写出新书。他肯定是想把会见胡主席作为全书最精

彩的部分。因为这样，他才不顾情况不同的。

看来，从曼谷到万象的路途，正是《潜行三千里》苦难的开始，也是死里逃生后不知不觉走上道路。说过去的乡愁和未来的奋发，是促使他蛮干的动力，也并不是不可思议。

大阪府下的四条暖神社附近，有一座叫慈眼寺的禅寺。寺中供奉的是在染久松悲恋舞台上闻名的野崎观音，在其公共墓地上也修有辻政信的墓。在由葱绿的饭盛山环抱的山坳里，在盛开的杜鹃花丛中，有一座典雅的殿堂，里面就是在“野崎小曲”中闻名的观音菩萨。

1986年5月的一天——前一天猛烈的暴风雨已经完全平息，白云在来回悠悠地浮荡，真是一个绝好的天气。参拜完观音，我迈步走向殿堂右后方开阔的公共墓地。望着那把山坡分为六段的公共墓地，我一时疑惑不解了。

怎样才能从几百块墓石中找出那一块来呢？但很幸运，从山麓的角上，发现了要找的墓石，我不由得欢呼雀跃起来。墓地宽6尺，纵深7尺，地点很不起眼。

用灰色花岗石雕凿的墓石，有人那么高。正面的墓碑刻着“大灯院殿辉国政信大居士”的戒名，与之并列的墓碑是“松灯院殿贞容千岁大姊”的戒名。大姐的碑文染成了红色，一看便知是千岁遗孀的戒名。

右侧刻着“昭和四十三年七月二十日歿，俗名辻政信”，后面刻着“昭和四十五年七月吉日 嗣子建立”。与墓石并排的右侧立着一座5层塔。我独自低下头来，一边在想：把这里作为叱咤亚洲和太平洋风云的枭雄的墓地，不是有些冷静么？

我甚至产生一种幻想：事到如今，让大佐莫非还会从这里出现。不久，虚无感和寂灭感肃然浸蚀着我的心……

为什么要在这里修建坟墓呢？是不是仿效忠义一生的楠正方^①，才选择四条堰附近的呢？我带着这种疑问，离开公共墓地，回到了殿堂。

正与卖神签的老人说了两、三句话，住持就从里面出来了（后来知道他是尾沈一峰大师）。这位年龄在60岁上下，身体肥硕的住持是这么回答我的提问的：

这座寺院是千岁夫人娘家青木家的菩提寺。青木家就在附近的鸿池新田。因法事西下的辻，偶而也与住持见面，他要求住持道：“大师，我不知什么时候会死，想请您为我起个戒名。”

辻出身于石川县的山中町，邻镇的山代温泉有座菩提寺的专光寺，属净土真宗。而这座慈眼寺属曹洞宗，所以住持没有答应。辻再三恳求：“我喜爱禅宗，不拘泥于派别。”住持才答应下来。据说其后不久，就传出了辻失踪的消息。

应家属的要求，经过审定宣布失踪，是在1968年7月20日。两年之后修建了坟墓。这清楚地证明在往东南亚出发之前，他已作好死的准备。我在惊异的同时，也获得了珍贵的证言。

出发前，托人关怀秘书的前途；羽田机场上的异常言行；以及潜入老挝时，大声喝斥制止他的赤坂；对K事务官夫妻述说心怀，如此等等的准备一死的决心，象连续剧一样，使我的推理得以证实。应该看到，这一切都与要求起戒

注①：即楠木正行（1326—1348），日本南北朝时代的武将，因在四条堰战败，遂与其弟相刺而死。死后封小楠公。

名而决心一死有着直接的联系。

那么，他死的动机到底何在呢？所谓“已是垂暮之年”、“不知什么时候会死”的念头到底因何而起呢？是肉体上衰老了吗？确实，他有胃溃疡，大部分胃被切除。更折磨他的，是留在他体内的战场上的弹片。

也许是因为对处世绝望了。前些年议席从众议院转到参议院，原因在于选区的支持率不稳定。这与天生的狷介性格有关，但与控制自民党的岸信介一派，也是格格不入。这就封死了进入内阁的道路。

此外，好友服部卓四郎的猝死，肯定也是一个打击。前一年的4月30日，服部因心脏病去世。就这样，他走向了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为此而寻求归宿，也就不足为怪了。

尽管这么说，如果认为他只是受厌弃世道的念头驱使，也许过于主观。不难想象，象他那样的人，是决不会躺在床上静静地等死的。怎么对待死，也许让他费尽了心思。换句话说，就是怎样才能死得有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单纯寻找归宿，不如作一场殉职的演出更为重要。勇敢地挺身面对危险，才是最有意义的。如果使命能起到跳板作用，那就再好不过了。

因此，无论使命能否完成，最终目的并不在于此。闯入危险的老挝，这件事本身，目的就达到了一半。他并不是把生命赌在使命上，而是把使命赌在生死上。这就是真相。他所掌握的演技，在此发挥得淋漓尽致！

他的死，充满了神奇色彩，舞台效果没有不足之处；他的死，完全象神秘地消失了一样。死是一件大事，对人来说，根据情况不同，往往是评价一个人的基准。而对军人来说，意义就更加重大了。



CICIR 002502

正因为生前就已经是传奇式的人物，所以他的死，也就更加显得具有传奇性，这是无需论证的。事实上，这已经构成了他整个一生最后而又最大的一次演出——辻政信最明鲜不过地承担了这一角色。